

# 宪政经济学

杰佛瑞·布伦南 詹姆斯 M. 布坎南 著

冯克利 秋风 王代 魏志梅 等译

冯克利 冯兴元 统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字: 01-2002-1423 号**

宪政经济学/布伦南, 布坎南著; 冯克利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14)

ISBN 7-5004-4262-9

I. 宪… II. ①布… ②布… ③冯… III. 宪法—研究  
IV. D91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703 号

责任编辑 王 昊

责任校对 官京蕾 李维花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插 页 4

字 数 38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布坎南的《规则的理由》一书，所讨论的问题是一般政治生活和市场生活赖以发挥作用的规则的功能的本质，这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殚精竭虑著述立说的目的之所在。<sup>〔1〕</sup>他们的观点是，当代经济学似乎陷于解释鸡毛蒜皮的小事，或在细枝末节上过于玩弄数学技巧。这本书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努力实在是走上了歧途，学者们本应更多地研究规则的产生和改善的原因，使日常经济生活的运行尽可能摆脱各种社会困境。换句话说，走出丛林可以有多条道路，对于何为“最佳”道路，我们能发现某种实证和规范理论吗？

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回顾，布伦南和布坎南强调，对规则的考虑，其实不是经济分析的一个新问题。他们指出，在规则的分析 and 选择中运用严格的现代经济学方法，不完全是一种知识创新活动。大体上说，这项工作的基础不是由此书奠定的，如同布坎南的所有其他著作一样，此书是了解他的立宪政治经济学关键内容的一个很好源泉。

当然，这种立场的另一些来源，也包含在这套布坎南作品

---

〔1〕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布伦南和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规则的理由

集<sup>〔1〕</sup>的各篇论文和专著之中。关于制度重要性的基本思想，至少从《同意的计算》开始，一直到布坎南的最新著作，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sup>〔2〕</sup>规则的重要性这一布坎南的基本见解，可以说是他毕生大部分著述的动力所在。对这一见解的强调并使其进入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布坎南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学者。

《规则的理由》的主旨是，围绕这一有关规则的基本思想建立起某种方法论的和分析的基础。也许它是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预示着未来的宪法理论家的研究范围。判定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布坎南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太艰难了。然而，这个问题的固有难度，却映衬出布坎南作为真正的人和学者的气度。为其他终将登上最高峰的人建立一个营地，胜过去爬附近的一座小山。

罗伯特·托利森 (Robert D. Tollison)

密西西比大学

1998 年

---

〔1〕 指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 Buchana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收在这个中译本中的著作，即译自该文集第 10 卷。——译注

〔2〕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前 言

英美法理学强调理性的法则 (the rules of reason)，却大大忽视了规则的理由 (the reason of rules)。我们所参与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博弈，只有根据其规则才能做出经验描述。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参与博弈的人，并不理解或评价这些规则，例如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实行的，它们又是如何被改变的，特别是如何对它们做出规范性的评价。从知识分子到一般社会大众，基本上都是“制度盲” (constitutional illiteracy)。我们怀着既羡慕又妒忌的复杂心情，看着那些聪明的大玩家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现行规则。众人竞相效仿的不是圣贤，而是这些耍小聪明的人。聪明人比比皆是，智慧日益贫乏。

我们的假说由美国人对他们的开国元勋的崇敬所证实。詹姆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及其同侪的过人之处，是他们对政治秩序的规则的理由有着重要的理解力，它根植于他们的立宪文件，即两百年来一直发挥影响的那些“神圣”文本之中。这些开国元勋的智慧和理解力在我们的时代已被严重消解。人们已广泛感受到西方文明秩序的社会—知识—哲学资本的贬值，即使这仅仅是来自直觉。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规则的理由就存在于人们永无休止地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共同生活的愿望之中；在这种生活中不存在持续不断的人人为敌的霍布斯式战争。如何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

## 2 规则的理由

一切社会科学和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受到相对忽视，部分原因是缺少一个清楚界定的答案。当我们认识到人的本性是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人的利益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我们太容易让人陷入绝望了。任何社会似乎都是建立在极端脆弱的基础上。难道人们的生活只能要么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肮脏、野蛮和贫困”，要么是利维坦统治下的“肮脏、野蛮和奴役”？

从古到今，有两条泛泛划定的出路，给学者和公民们带来了希望。其一是人类道德改善的能力。总有一天，人们会变得相互关爱。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在某些方面可以观察到的成功记录令人怀疑，虽然这里我们不想断言这种努力没有价值或没有必要。

摆脱这种“社会困境”的另一条可能的出路，不需要人类在基本道德意识上变得“更好”。这一路径的出发点是，人就是他现实存在的样子，存在着道德上的弱点等等。这种现实由“人性”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字眼儿做出了概括，它限制着可以达到的社会和谐状态。但是，即使在这些限制之下，人们仍然有望通过恰当的规则设计、制定和维护，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秩序；这些规则限制着每个人对他人的行为可以采取的方式。

至少自亚当·斯密以来，规则可以替代道德的观点，即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所熟知。当然，18世纪伟大的知识发现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这个发现是，在合适的规则结构（斯密所使用的术语是“法律和制度”）之下，追求自利的个人也能够促进他人的利益。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社会协作的巨大网络——精妙的、扩展的社会分工系统；如果把它定义为一项合作事业，即使在两百年后仍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既不需要这些参与者理解结构，也不需要他们在行为中提升到一般道德戒律之上。所需要的是一个适当的“宪政背景”（consti-

tutional context) ——一个合适的规则结构，以及落实这些规则的安排。

所有这些曾经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仍然保留着这些原理的痕迹。但是不知何时，经济学家被从字面上定义为“了解市场如何运行”的人，而“运行”<sup>xvii</sup>被理解为个人行为借助制度结构进行的合作。然而，在本世纪之初，职业经济学家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耽迷于预测外生变化（exogenous changes）对市场结果的可观察和可计量的诸多方面（价格、工资率、数量等）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假说或“模型”的逻辑涵义。由于注意力的转变，现代经济学家似乎应有尽有，惟独缺少早期的理解力。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大概只有这种理解力才是他们应当存在的理由。

公共选择理论在对政治过程的研究中，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从这种理论中也可分辨出一种重心的转移。一些当代学者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政治的“纯科学”，它完全类似于市场的“科学”。其目的是提出有关基本参数之特定变化对可观察的政治结果的影响的假说。还有一些公共选择（社会选择）理论家所关注的是为不同政治安排建立模型的分析秘诀。公共选择中的第三种研究路径，即同我们自己的努力关系最为密切的路径，则更多地与“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传统保持一致。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运行，以便使在这些制度（或规则结构）中做出选择时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我们把这项研究计划叫做“立宪政治经济学”，它是我们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的副标题。广义地说，立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是本书的主题。

这项研究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不是新题目。我们两人或是一起或是分别在这个领域四处耕耘，日积月累，希望能把以往的努力凝聚成一种宪政主义的理解力。具体而言，我们已经为分析政治

#### 4 规则的理由

秩序中的规则如何运行、如何选择这些规则、如何建立选择规则的规范性标准，提供了一个起点。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分析规则的基本逻辑，指出应当把规则和制度而非结果作为研究焦点，这些努力尤其反映在 80 年代早期的著作中。我们本来以为这种分析差不多会得到普遍理解，但结果却是它引起了令人诧异的争议。在试图说服学术圈内外的人接受关于制度设计的更为精密而复杂的分析结论时，我们体验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信念，即这一认知难题处于最深层次的精神过程之中。如果没有共同的“宪政主义心态”，没有某种使对话赖以进行的最初的共同基础，任何有关设计的讨论都毫无用处。在开始有关规则选择问题的对话之前，人们必须就规则的理由取得一致。

我们自己是专业经济学家，因此特别惶惑，对于在这一专业中采用宪政主义视角迟疑不决。这个世纪的经济学家颇为关注“市场失灵”，它是在这个世纪中叶一直主宰着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福利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这种对市场失灵的重视扩展到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从事研究的学者，都毫不迟疑地向政府提出有关规范市场、改善宏观管理的详细建议。回顾既往，在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以后，这些学者仍极不愿意把他们的分析工具除了运用于市场外也运用于制度，这未必令人奇怪。他们几乎不关注政治学和政治制度。从他们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中一旦出现了政策建议，他们便不想再做后续分析，以便证明那些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扮演着政治角色的人，大体上会像经济学家的信条所要求的那样采取行动。经济学家不知不觉地陷在一种预设中不能自拔——政治权威机构是由一群道德超人组成的，可以用一种受到恰当约束的社会福利函数去描述他们的行为。少数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曾经初试锋芒，试图给我们的政治中的个人行为模型注入一点实在的现实主义因素，却被斥责为来自意识形态偏见。开明君主的神话似乎有着相当可观的维持能



力，这种现象我们将在第三章做专门考察。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宪政主义视角和非宪政主义视角的差别，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在某种社会秩序中与他人互动的有意识的动物的人的自我认识的差别。我们的兴趣受着我们的预先假设的限制，即必须把人作为道德平等者加以评价。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中，宪政主义者的视角必然是契约论的，这一点将在第二章做集中论述。

xix

本书的讨论可以分为四部分。前四章讨论规则分析的一般性问题。第一章区分了在规则约束下的行为以及规则本身所导致的最终状态或结果。我们试图引入几个彼此独立的理由，用来证明为什么我们对规则的强调是重要的。如前所述，第二章要讨论通常被冠以“契约主义”的立场的规范性含义。我们也已提到，第三章试图理解与宪政主义立场相对立的意见。第四章涉及期内选择与立宪选择之间的区分的方法论维度。这个受到广泛忽视的维度，把我们的工作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特别强调，适用于规则分析的行为假设，可能不同于那些同预测产生于明确界定的规则的后果相关的行为假设。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私人（不同于集体）选择背景下的选择的时间维度。这里要证明，在集体选择背景下，私人将合理地对未来做更为严重的折现——这个事实为集体选择背景下的规则提供了一个突出的理由。第五章是一般的抽象论证，第六章则用三个现代案例深化了这一论证。利用这些案例对“没有规则的政治”的分析，为较早的分析性观点提供了一般性论据。

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的是规则与有着各种解释的“公正”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对公正观做出一种解释，认为公正取决于事先存在着受规则约束的行为。既然公正受到人们的珍爱，如此理解的公正也就为规则提供了一个理由。在第八章，我们要讨论分配公正的问题。讨论的重点是“没有规则的政治”在人们试图

实施一种公正分配标准时所发挥的作用，这不同于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些有关在各种可以想象的“分配”之间的比较的讨论。

第九章是最后一章，它有别于本书的其他讨论。如果我们对实施这个要害问题一言不发，那么我们理应被人指责为过于天真。在民主国家有可能进行宪政变革吗？如果对于规则的理由存在着广泛的无知，这显然不可能。但是，即使具备某种必要的宪政主义智慧，改革又如何能超越既定的私利？在这里，预卜灾祸<sup>xx</sup>的卡桑德拉女神就站在我们身后，但在我们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中所作的全部努力，都在证实着我们的信念：作为正在进行的学术讨论的参与者，说到底还是作为公民，我们能够改善我们的博弈规则。

前面提到，我们在这本书里所做努力的部分动机，来自我们过去的工作所引起的反应——对批评者和赞成者都应有个交代。我们相信，许多反应是建立在一种严重的误解上——他们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意图。我们目前的努力是否成功，只有我们的读者可以判断。在这里只有一点要指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比平常更依赖我们的批评者。在这方面，我们应特别感谢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和科尔曼（Jules Coleman），他们在学术上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非常严肃地看待我们的研究。在我们身边的同事中，李（Dwight Lee）对我们书中论述政治和时间的章节中的观点有所贡献，总是令人精神振奋的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对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最初几稿提供了可贵的评论。凡贝格（Viktor Vanberg）对第一章的评论使我们避免了一些含混不清的表述，米勒（Dennis Mueller）对第七章的评论很有见地。托里森（Robert Tollison）的几个具体意见使我们的整个书稿增色不少。

这本书就像《征税权》和许多篇幅较小的著作一样，是我们两人真正合作的产物。然而，还是有分工的，初稿的责任就做

了划分。布伦南在初稿中的任务是一、四、七、八各章，其余各章，即二、三、五、六、九章，则由布坎南来完成。布坎南所写各章中的一部分内容，最初曾作为演讲稿，提交给 1981 年在犹他州雪鸟市和 1982 年在伦敦牛津召开的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大会。

我们的工作始终受到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直接帮助，以及为研究中心的计划慷慨资助的有关方面的间接帮助。这本书仅仅是一个范围更大的“立宪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受到位于洛杉矶的经济学与教育研究基金会的特别赞助，在此我们谨向其表示感谢。

按照布坎南的一贯做法，我们应该再次感谢蒂尔曼（Betty Tillman）对书稿的统一编纂。她的努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可贵之处；因为这是发生在涉及整个公共选择中心的一项重大活动的起点，而这项活动事实上是由她一人策划推动的。她的超常的奉献精神 and 持久热情，20 多年始终如一，一直令我们感到惊奇，也使我们不断地对她心存感激。

# 目 录

序 言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立宪要求 .....	(1)
一、引言 .....	(1)
二、规则的理由 .....	(3)
三、游戏规则 .....	(6)
四、道路规则 .....	(8)
五、市场秩序的规则 .....	(14)
六、政治秩序的规则 .....	(16)
七、规则的重要性 .....	(18)
第二章 契约主义的视角 .....	(22)
一、引言 .....	(22)
二、非契约主义的宪政主义 .....	(23)
三、作为价值源泉的个人 .....	(24)
四、契约和交换 .....	(26)
五、交换视角的政治学 .....	(28)
六、作为契约理想的一致同意 .....	(31)
七、同意规则、无知之幕及不确定性 .....	(32)
八、结论 .....	(36)

## 2 规则的理由

<b>第三章 仁慈的神话</b> .....	(38)
一、引言 .....	(38)
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	(40)
三、科学、真理和政治 .....	(43)
四、威权主义的命令式 .....	(46)
五、非契约主义范式中多数主义民主 .....	(49)
六、政治的目标 .....	(51)
 <b>第四章 用于立宪主义分析的个人模型</b> .....	(54)
一、导论 .....	(54)
二、政治中的经济人：对称性论证 .....	(56)
三、科学和经验主义的辩护 .....	(58)
四、对不同利益的行为模型的方法论捍卫 .....	(60)
五、社会评价和准风险厌恶 .....	(62)
六、政治中的格雷欣定律 .....	(68)
VII. 总结 .....	(72)
 <b>第五章 时间、诱惑和受约束的未来</b> .....	(77)
前言 .....	(77)
第一部分 个人的私人选择 .....	(78)
(一) 导论 .....	(78)
(二) 终极性的组合商品 $Z$ .....	(78)
(三) 对偏好的偏好 .....	(79)
(四) 过去、现在和未未 .....	(81)
第二部分 个人的公共选择 .....	(84)
(一) 导论 .....	(84)
(二) 拥有历史的社会 .....	(84)
(三) 时间的相互依赖性 .....	(85)

(四) 实例 .....	(87)
(五) 道德规则和/或宪政措施 .....	(89)

## 第六章 无规则的政治 第一部分：时间与无约束的

集体行动 .....	(93)
一、导言 .....	(93)
二、社会贴现率 .....	(94)
三、高征税陷阱 .....	(96)
四、通货膨胀陷阱 .....	(102)
五、公债陷阱 .....	(105)
六、其他例证 .....	(106)
七、结语 .....	(107)

## 第七章 规则与公正 .....

一、导言 .....	(110)
二、公正行为与应得观 .....	(112)
三、公正与信守承诺 .....	(114)
四、规则间的公正 .....	(119)
五、公正的规则，获得同意的规则与公正的行为 .....	(122)
六、结语 .....	(126)

## 第八章 无规则的政治 第二部分：分配公正与分配

政治学 .....	(128)
一、引言 .....	(128)
二、分配公正：传统观点 .....	(129)
三、宪政主义视角和制度影响 .....	(131)
四、不受限制的多数主义的影响 .....	(134)
五、征税规则和多数主义规则下的分配 .....	(138)

#### **4 规则的理由**

六、直接的宪政主义和分配公正 .....	(144)
七、结论 .....	(149)

### **第九章 在民主制度中能否实现宪法革命 .....**

一、引言 .....	(152)
二、帕累托占优的变革与维克塞尔的一致同意 .....	(154)
三、分配限制和对规则的展望 .....	(155)
四、既得权利与分配嫉妒 .....	(159)
五、法制变革和搭便车者 .....	(162)
六、规范的作用 .....	(165)
七、向公民信仰迈进 .....	(168)

全书索引 .....	(172)
------------	-------

## 立宪要求

### 一、引言

经济学家喜欢拿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切入他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因为鲁滨逊面对着一个“经济问题”，他要决定在各种竞争性的用途中如何分配自己的稀缺资源（包括时间）。但是在这种做法中有着某种令人深感不满的因素。借助于这个事例，人们很容易从鲁滨逊的背景滑向“社会”本身也面对“经济问题”的另一个背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分析跳到对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讨论上去。

在这种教学程式中被忽略的东西，是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在社会背景中面临多种选择，在这个背景中，其他人的存在及其行为，以及约束着他们的行为的各种制度，要比自然界的物质约束重要得多。经济学是或应该是一门研究社会中的个体行为的学问。

这种行为未必是下述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个人认识到在直接相互交往的各方的行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在巨大的现代社会里，个人行为可以是完全非人格的行为，就像在理想的竞争性市场模型中那样。在限定的情况下，所有参加者对受外生因素决定的参数做出反应；没有谁对别人发生直接影响。所有当事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后果，无法成为任何参与者的选择



## 2 规则的理由

目标。

在限定的情况下，或在至少有部分行为显然是“社会”行为这种更一般的情形下，协调个人行为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理解相互依存的过程也总是非常关键的。有着相同的动机和能力的相同的个人，在不同的规则集下，在相互作用中会产生出相当不同的总体后果，并对每个参与者的福利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回报与绩效挂钩的背景下是一个样子，在回报采用其他标准的背景下则是另一个样子。至少从18世纪以来，尤其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规则（斯密的字眼儿是“法律和制度”[ laws and institutions ]）对于社会结果的影响，这种关系为脱胎于古典基础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论点提供了基础。

如果规则影响着结果，如果某些结果“优于”其他结果，那么，从规则能够被选择这个意义上说，对规则和制度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就变成了我们关注的合适对象。如果不理解组成一种社会秩序的个人如何相互交往，以及不同的规则对这种交往有何影响，那么，社会的参与者也就不可能对现行规则做出有条理的变革，甚至不可能慎重地行动以维护那些已被证明对社会本身的尚可接受的有效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

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方面有着合作的利益，另一方面有着冲突的前景，我们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建议呢？我们应当摒弃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呢？引导我们相互发生负面影响的“社会秩序规则”——即控制着我们相互交往的制度安排——在哪里？能够加以利用的促进和谐的力量又在哪里？我们应当为维护什么样的规则——和什么样的制度——而奋斗呢？

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称为“立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它体现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精神，这些问题对于他们也具有核心意义）。虽然这些问题在现代话语中受到普遍漠视，但它们

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在彻底的认知分析的真空中，这些问题是不会被提出来的。它们确曾吸引着西方传统中一些最杰出的头脑。然而很不幸，他们积累的大量智慧却被人忽视了。常常被认为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各种答案也只被看作一些意见，有关它们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也是半斤八两。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尚可容忍的分歧范围。但是也存在着一种提出这些问题的程式<sup>5</sup>，以及一种能够为争论设置条件的分析方法。

这些问题本身、提出问题的正确程式以及相关的分析方法，构成了这本书的任务清单。我们在第一章的目的是搭建一个舞台——钉上几个挂钩，以方便此后放置各种衣帽。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要以抽象的语言说明不同的互动类型。我们将指出——仍是从抽象的角度——规则和制度与现有互动关系发生关联的方式。然后，我们将把各种不同的互动关系类型与经常同它们相伴而生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最后，我们将简略讨论一下一般规则，并把由此得出的认识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当然，后者正是我们集中关注的问题。

## 二、规则的理由

这本书的题目是“规则的理由”，我们将渐次讨论许多理由。但是首先必须讨论所有理由中最基本的理由，尽管我们在其他著作中已经对它做过较为细致的阐述。<sup>[1]</sup>我们需要社会规则，是因为如果没有规则，生活就会像霍布斯在300年前告诉我们的那样，“孤独、贫穷、肮脏、残酷和匮乏”。<sup>[2]</sup>只有那些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认为，人们中间存在着“自然和谐”，即使没有任何规则，他们也能消除所有冲突。我们需要共同生活的规则，其简单的理由是，没有规则，我们必会陷入争斗。我们会陷入争斗，是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对象也会是另一个人的所求。规则界定

#### 4 规则的理由

着我们每个人从事自己的活动的私人空间。

说明人际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以及解决这种冲突的潜在手段的最佳方式，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方式之一，大概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请看矩阵 1.1，每个方格中的数字代表  $A$  和  $B$  两个中每一位的正值支付 (positively valued payoffs)；每个方格中左边的数字是  $A$  的支付，右边的数字是  $B$  的支付。注意行和列的先后次序。

$A$	$B$	
	I 6,6	II 0,10
	III 10,0	IV 1,1

矩阵 1.1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只玩一场博弈，在行之间做选择的  $A$  将选择第二行，这与他对于  $B$  将做出何种选择的预测无关。同样，在列之间进行选择的  $B$  将选择第二列。结果各自独立的选择行为产生出一个“解”，即方格 IV。然而，这个支付矩阵说明，如果他们都选择第一行、第一列，以方格 I 作为解，他们的利益将同时增大。然而，除非有某种规则或习俗促使他们采取这个行动，个人理性和最大化行为将必然导致选择 IV 的结果。在这个格局中包含着一个清晰而又简单的信息。处于这个互动过程中的人的共同体，需要一种规则，一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规范，它将阻止个人的行为最终导致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方格 IV 所表示的结果。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若干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 $A$  和  $B$  都不能独自决定社会互动的后果。结果总是出自双方的行为，无论把这一行为描述为无规则情形下<sup>7</sup>的个人预期效用最大化，还是服从着某种规则或习俗。

第二，只要互动结构如同矩阵里描述的那样，即存在着就某种规则或习俗达成协议的潜在可能。也就是说，如同矩阵所示，

“博弈”不需要支付上的对称。所需要的是参与博弈的各方如同矩阵里的数列那样，有一个有序的排列。只要四个方格在 *A* 那里的排列依次是Ⅲ、Ⅰ、Ⅳ、Ⅱ，而 *B* 的排列依次是Ⅱ、Ⅰ、Ⅳ、Ⅲ，那个结果就会出现。因此，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对这些数字按倍数扩大，例如，给 *A* 的支付乘以 100，同时 *B* 的支付不变，这并没有改变互动关系的基本结构。

第三，尽管存在按照愿望达成一般协议的可能性，这个简单例子还是暗示了强制问题的存在。假设 *A* 和 *B* 同意分别选择第一行、第一列，在方格Ⅰ中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如果 *A* 希望 *B* 遵守协议，但是，*A* 自己在选择第二行时会得到更高的支付，只是违反了协议。同样地，如果 *B* 希望 *A* 选择第一行，他自己选择第二列时可以增加好处。因此，任何规则只要受到所有当事人的尊重就可以得到较高的总回报，但规则也是脆弱的，因为一部分乃至全部当事人都会在自己的利益的驱使下受到违反协议的激励。这不是说潜在的违反协议的人是不正常的、非理性的。的确，这个假设几乎与事实完全相反。在缺乏有效的强制办法时，奉行规则而不是背弃它，需要个人坚决摒弃所期盼的效用最大化，至少这个行为命题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就是如此表述的。

囚徒困境的行为模式是高度简化的，但是，我们认为，它的结构依然包含了理解社会秩序的核心问题所需要的大部分要素，即协调有不同动机的人的行为的要素，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模式对所有当事人都是可以容忍的。我们的同事塔洛克很恰当地把他的书名定为《社会的困境》<sup>[3]</sup>，以此暗示类似囚徒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当然，概括地说，这种困境采取了高度复杂的结构形式。当我们的分析推及一个团体中或由政府机构的安排在一个集体中各自活动的许多人，以及包含不同决策层次的许多选项时，<sup>8</sup> 可以被考察的有意义的相互作用背景的数量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然而，在这本书里，我们甚至不打算为这些互动关系的一小部分建立模型。下面我们将把理解一般性的两难困境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种困境意味着对个人、集团和集体行为做出适当限制的规则，从总体上说是可取的。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分离出若干常见的互动关系中的规则的特征，以便着手讨论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规则。

### 三、游戏规则

当我们提到“规则”时，大概与之联系最密切的事物就是“游戏”。讨论一般游戏的规则是很有意义的，例如桥牌这种客厅游戏，或网球和篮球这类体育运动。一切游戏都需要规则，它规定着使游戏得以发生的参数——得到游戏者承认的行为，所使用的器材，解决分歧的办法，确定胜出者的方式，等等。

在讨论一般的游戏时，我们在区分游戏规则本身和这些这种规则下的游戏活动方面没有什么困难。游戏活动是在规则之下发生，但游戏活动本身不构成规则的一部分。规则提供了游戏活动的框架，使许多不同的游戏形式可以在给定的规则之下展开。相反，一次具体的游戏活动是确定的或封闭的。的确，该词的一般用法造成了混乱，当我们说“游戏”时，它既指规则的结构（例如，说“篮球是一种游戏”），也指规则之下的游戏活动（例如，说“湖人队在昨晚的游戏中打败了凯尔特人队”）。

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社会互动关系的规则和这些规则之下发生的行为模式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区分。不过在这里做出区分往往要比在一般游戏中更加困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一般游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然而，在规则与规则下的行为之间的区分，对于所有社会互动关系是普遍有效的。

一般游戏的事例，也有助于我们讨论另一种既相关又独立的区分，即在一定规则下的游戏策略的选择与规则本身的选择之间<sup>9</sup>的区分。一群人玩明着抽扑克牌（先发面向上和面向下牌各一张，然后三次发面向上牌各一次，每次发牌后随作拼赌）。与一个人玩时，尽管都遵守明牌规则，但是在将牌面朝下放表示放弃和继续要牌之间做出的选择，是很不相同的。

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相应区分必须得到强调。有必要对确定规则的过程与规则之下选择具体行动的过程加以区分。但是在社会环境下做出这种区分更困难一些，因为在制约着私人行为的规则与制约着政治人物——他可能参与改变前一种规则的活动——的规则之间存在复杂的依存性。也就是说，参与立法的多数派可能是在规则（政治宪法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之下活动，这些规则限制着他们改变制约私人活动的规则。我们必须用心区分对规则的选择和在规则之下对策略的选择，后一种规则是指可运用于一个明确的决策单位所面对的形势的规则。例如，如果产权规则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烧杂草，当我们某一天决定烧掉一堆杂草时，我们是按规则采取行动。通过立法措施把烧杂草定为非法，等于改变了我们作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所遵守的规则。但是，立法机构在通过这项法规时遵守着它自己的规则，比如简单多数票的规则。把对常见的普通游戏的讨论作为我们的起点，其初步的益处是，从直觉上即可以看出选择的这两个层次。

对于普通游戏中的规则的研究可能在某些方面产生误导。在设计普通游戏时，要让规则下的游戏活动十分有趣。也就是说，这种游戏活动本身是每个潜在参与者的共同目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基本困境，即因为规则可以避免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需要规则的基本困境，对普通游戏的研究中却会变得不那么清楚。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和政治互动关系的环境时，没有必要考虑活动本身的娱乐性，也没有必要针对博弈活动的趣味性目的而规定对个人博弈者的支付。在社会政治的规则中没有必要存在共同的目标。个人被看作有着由他们私人决定的目标，他们自己的生活计划，这些事情不需要与别人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sup>10</sup> 规则的功能在于方便那些愿望千差万别的人们的相互交往。为了讨论这一特点，最好转向另一种逻辑框架。

#### 四、道路规则

道路规则——这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词语的另一用法——在制定或修改时并不以道路使用者的某种具体目的为准则。道路使用者的目的大不相同——商业的、娱乐的或某种综合性的，他们对路线、速度和车辆种类都有不同的要求。道路规则的功能是，允许人们追求他们自己各自独立的行动路线；如果没有这种规则，他们的私人选择就要引起冲突。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道路使用者的各种目标会成为单一的筹码，类似于普通游戏中的“胜出”。

我们还可以看到道路规则的另一特点。一整套规则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使用设施者的技能水平的高低。一整套规则可以是优越的，因为它允许驾驶员无论优劣可以同时利用道路，这个特点在普通游戏里是不存在的。道路规则有一种社会功能，即为所有使用设施的人达到目的提供方便，而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规则也是依照它满足这个标准的能力受到评价。

同样的道理，制约社会和政治互动关系（即人们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的那些规则，归根结底要根据它们促进政治关系中的所有人实现其各自目标的能力加以评价。这种规则允许个人做如下事情吗：在保障每个人的目标涉及相互依

赖的条件下，个人以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别人也享有这样做的平等自由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私人目标。

专注于道路规则这个例子，使我们能够分辨出一个常常受到忽视的特点。规则使每个人对别人的行为有了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所采取的形式是，它告知那些参与互动关系的人们的活动或其边界。

例如，假设有一个发展中小国刚出现汽车，数量也很少。这个国家同时受到法国和英国的影响，所以，早期的道路使用者既有靠左行的驾车者，也有靠右行的驾车者。随着汽车数量的增<sup>11</sup>加，缺乏统一的规则带来了麻烦。两车相遇，每个驾车人独立调整，两人都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何种反应，由此产生一种后果，它类似于霍布斯式丛林（Hobbesian jungle）的生活。此时，所有各方当事人只要采取一种规则，无论是何种规则，即可摆脱困境。

我们用矩阵 1.2 解释这种情形。这里的博弈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博弈，采用规则是为了告知。两方中的每一方都具备了预测另一方行动的能力。根据假设，规则采用靠左行还是靠右行无关紧要，只要规则产生对称行为即可。在这个例子中，政府可以承担起公布规则的角色。然而历史也能做得不错，甚至更好——因为社会习俗常常可以建立起相关的行为规则。

在规则的可预见性内容和随之而来的可实施性问题的相对重要性这个方面，矩阵 1.2 所描述的互动关系不同于矩阵 1.1 中更一般的两难游戏。矩阵 1.2 描述的游戏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博弈；只要采用某种规则，无论什么规则，即可保证得到主要收益，任何游戏者违反规则，相对而言得到的好处甚少。然而，如矩阵所示，违规行为也能得到某种好处，于是就有了强制实施的问题。例如，如果 A 知道 B 总是遵循规则，A 就会发现他个人偶尔不守、



## 10 规则的理由

规则是有好处的。但是，规则一旦付诸实施，违反规则的诱惑不会像更一般的囚徒困境情形那样普遍。

		B 的行为	
		遵守规则（左行或右行）	独立调整
A 的行为	遵守规则（左行或右行）	I 10,10	II 5,11
	独立调整	III 11,5	VI -10,-10

矩阵 1.2

- 12 纯粹的合作博弈（不是这个矩阵描述的那样）不会让违反规则或习惯行为占到任何便宜，也完全不会产生强制实施的问题。这种互动关系的确存在。语言可以被看作符合这个条件。在社会共同体中所有的人都受着激励，用别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说话。存在一种自然的力量来创造共同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对礼俗用语也可以这样说，人们的行为依靠这些东西向别人传达某种意义。

然而，矩阵 1.1 中基本的囚徒困境下的互动关系，或矩阵 1.2 中信息合作下的互动关系，都没有清楚显示出其他一些重要特点。这两个例证都是指在有规则和无规则之间的最后选择。一旦更复杂的游戏活动展开，也就是说，一旦所有各方都认为需要某项规则，便有了第二种选择，即在不同规则之间的选择。考虑以下情形，有可能被采纳的规则之间是有差异的，即使我们保留博弈双方所获得的支付是对称的这一假设。这里的“博弈”其实是矩阵 1.2 的一个“子博弈”。

		B	
		选择靠右行规则	选择靠左行规则
A	选择靠右行规则	10,10	—
	选择靠左行规则	—	—

矩阵 1.3

看看矩阵 1.3，它发生在矩阵 1.2 方格 1 之内。此时双方的选择不是在采用规则和无规则情形下调整个人行动之间的选择。这里的选择是面对不同规则的选择。如矩阵 1.3 所示，“靠右行”优于“靠左行”。在这儿，有无规则是重要的（矩阵 1.2 表明了这一点），但采用什么规则也是重要的。因为游戏者之间在支付上的对称，在给定制度选择之下他们将选择同一规则。<sup>13</sup>

这里描述的互动关系有两点值得着重指出。第一，从历史中产生的表现为“非成文规则”形式的社会习俗，未必产生最令人满意的结果。现代社会分析家（如著名的哈耶克及其追随者）毫不含糊地认为，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因素能产生有效的规则。可是似乎没有证据让我们断言这些因素总能保证选择出最好的规则来。在我们的例子中，“靠左行驶”规则能够出现和流行——特别是如果外生变化改变了一个时期不同规则之下的相对支付时。此后可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进化的压力促使更为优越的规则出现。这种前景警告我们要定期评估各种不同的规则，把规则本身看作可以选择的对象，需要根据它们所导致的社会状态加以变革和改造。这一前景也提醒我们，广义上的“政府”可以承担一项职能，即对新旧规则之间的转换发挥促进作用。这个

意义上的“政府”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经一致同意产生的议会，相关博弈者的总和，或是另一种极端形式，一个偶然出现的独裁国王。在这个例子中收益是对称的，因此担任规则的选择者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对于某些个人、集团或过程来说，被授予选择规则的权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把“左向行驶”改为“右向行驶”未必令人满意，尽管后者在矩阵中是超优的。<sup>[4]</sup>如果规则被认为能够向游戏者提供信息，使游戏者能够预测对手的行动，那么，规则的任何改变将破坏信息。如果每天早晨通过掷骰子来决定规则（“靠左行驶”或“靠右行驶”），也就没有规则可言了。为了功能发挥，规则需要稳定。如果规则不断变化，它所提供的信息将丧失意义。每个游戏者将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将遵守现存规则，即使他自己知道现存规则也没用，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是否知道他知道。如果其他人遵循“过时”的规则还能过得去，每个人就很少受到激励来遵循新规则。

这个讨论说明，宪政主义的视角有着一种天生的保守主义倾向。<sup>14</sup> 仅仅证明如果实现了状态 A，它将“优于”现状，并不足以证明改变现状是合理的。如果“局部”最大值得到实现，它就有可能变成“全局”最大值。

对这个事实的认知，揭示了宪政设计与宪政改革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不存在有效的现行规则的地方，进行宪政设计时，需要做的事情是在产生一组后果的规则与产生另一组后果的规则之间做出选择。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结果的规则也就是人们所偏好的规则。但是，当问题是改变现行规则时，例如在宪政改革的情形下，在可以随意制定规则的情况下导致最受偏爱一组后果的规则，未必就是超优规则。

这一论证可以强化社会进化论者对建构主义激情的厌恶。只要存在着稳定的、尚可容忍的规则，一个共同体不试图实行变革

或许更好。然而，承认这一主张并不足以让我们相信，对现存规则的直接改革从来不可能令人满意。这一论证只是提醒我们，有必要关注用来修改现存规则的程序，尤其是要确保在不清楚转变的成本时，规则的改变不可过于频繁。

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矩阵 1.2 和 1.3 所描述的基本的合作博弈是非常简化的。除了导致强制实施问题的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普遍冲突外，还有个人在规则选择方面的分歧。在这里所讨论的合作博弈中，故意没有涉及这种潜在的冲突。在矩阵中的方格排序中，两个博弈者是无差异的。

然而，让我们设想一个不同的例子，它仍然处于道路规则这个范畴之内。由于已经提到的理由，有某种规则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背景也与“靠右行”——“靠左行”的例子相同。但假设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行为有两种规则，只能选择其一。一项规则是“右边先行”；另一项是“左边先行”。矩阵 1.4 描述了这十字路口的例子。请注意，在 *A* 和 *B* 之间，两个相关方格的排序是不同的，*A* 更倾向于第一项规则，“右边先行”，而 *B* 更倾向于第二项规则，“左边先行”。这种不同的排列有可能发生，例如，*A* 预测在大多 15 数早晨他将从 *B* 的路线的右侧接近十字路口。

		B 的行为	
		遵守规则（左行或右行）	独立调整
A 的行为	遵守规则（左行或右行）	I 10, 10	II 5, 11
	独立调整	III 11, 5	VI -10, -10

矩阵 1.4

#### 14 规则的理由

两个博弈者想要不同的规则，尽管他们都同意有规则强于无规则。然而，由于在采纳什么样的规则上存在分歧，在两个参与者之间将产生拖延和争执，每一方都希望通过不同规则的选择来保证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分配。

对于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规则的不同的利益，不应过分强调。考虑到规则的长期性，以及人们会预测到在连续博弈中可能获得有利的地位，博弈者可能倾向于就规则达成协议，规则的采纳比我们简单的分析所认为的要更快。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博弈者预知每个人有时会从右边接近十字路口，有时从左边接近十字路口，互动关系的模式就可以用矩阵 1.2 而不是矩阵 1.4 来表示。<sup>[5]</sup>

16

### 五、市场秩序的规则

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的目的是利用一般博弈和道路规则这些人所熟知的例子，分析出规则的若干要素。然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所关注的核心是经济和政治秩序方面的规则。在这一节，我们要讨论市场或经济秩序的规则，在下一节，我们将考察政治秩序的规则。

在先前的两个例子中，只要考虑到互动关系，对规则的需要立刻变得显而易见；若不考虑规则，人们无法对一般博弈和交通规则进行理论分析。然而，在涉及人们在经济领域里更为重要的互动关系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支配着个人行为的规则却常常受到忽视。经济学家本身在这方面一直有着漫不经心的恶名。对市场机制的复杂分析很少提到规则，而正是依靠这些规则，个人行为才得以在市场上发生。亚当·斯密却不是忽视规则的人，他强调了经济秩序的“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

对斯密和古典主义的这种视角的背离，最典型的例证也许是

这个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理论福利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根据与经济学家从数学演算中得出的标准模型比较，据说“市场”失灵了。分析的展开让人觉得，制度约束似乎完全与个人在市场结构中的互动方式无关。

对规则相关性的最好证明，也许是关于共有财产资源使用的例子，有时也用“公地悲剧”来证明。如果用简单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来描述使用者的行为，人们断定公地会出现过度放牧的后果。据说市场在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上“失灵”了。然而，现在我们很熟悉，这里的问题与市场过程的机制无关，而与使用者据以行动的规则有关。改变一下规则，让稀缺资源由分立的私人所有，并施以保护个人所有权的手段，即可消除这种无效率。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学家的倾向是看重结果，而不是看重产生结果的规则，这种态度始终是各种理论混乱的根源。结果的改变要通过规则的改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结果的直接操作来实现。

理论福利经济学家从规范角度的攻击，是给政府或集体对市场的干预提供依据。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规范意义上的市场制度，他们的态度的特点就是对规则之重要性的广泛疏忽。这些经济学家总倾向于忽视规则的重要性，有时是因为一个天真的假设：“市场会出局”，而并不在乎制度约束。他们假设，市场方案会强大到足以让任何可能存在的制度约束失效。似乎一直存在着把以下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一是在既定约束下的经济激励行为的强大，一是力求改变这种约束的经济激励行为有可能十分强大。似乎相当有可能的是，在既定制度之下的市场结果有可能十分强健，而这些制度在人们对制度设计和可能的变革没有予以明确和直接的关注的情形下，对于变化的反应相当迟钝。

让我们回到对共有财产的例子。可能存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渔业市场，其中供需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完美的配置—分配后果（假定资源和制度参数不变），同时，在渔场产权缺席的情况下，无

法制定出任何意义上的符合规范理想的规则。

市场规则的第二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在我们前面关于道路规则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规则的基本功能是防止个人妨碍别人的行动：制度有着阻止灾难性损害这一基本的消极功能。这是霍布斯赋予防止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秩序规则的基本任务。然而，根据斯密的市场秩序观，人类互动关系还存在着一个的积极的方面。在斯密的世界观中，商人之间的合作能够通过劳动分工而使各方获益。在劳动分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活动者在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引导下，通过发挥创造性的想像力而对自己的环境做出反  
 18 应，由此也间接实现了其同胞的利益。这种创造性活动的连续进行产生了一种秩序，它既反映人类合作的巨大好处，也为出现更多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空间。无论如何，只要思考一下现行的市场秩序，即可认识到人类通过劳动分工进行合作所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数量。但是，人们不能事先预测到那些收益的性质和数量会是什么样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者具备当前分散在所有经济活动主体中的创造性想像力。

从这一观点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如果规则所导致的特定后果的确切性质只有在其出现时才能被发现，怎么能够根据这些后果去选择规则呢？第二，如果市场制度未被恰当地界定，或采用了某些不利于市场良性特征的规则，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知道规范性的“失灵”的真实涵义的。我们可以设想，推动人类合作的发动机没有充分发挥功效——但是对于还有可能出现什么局面，只能是胡思乱想。

## 六、政治秩序的规则

许多社会分析家都会同意，市场过程是在合理的清晰界定的规则下运行的，这些规则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们也许不

大愿意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政治过程。但是，政治“选择”也是从一定规则之下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每个当事人都受着他人行为的制约。政治活动主体是在或多或少被清楚界定的规则下采取行动。他们在可以利用的范围内做出选择，以便使他们的回报最大化（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背景下一样，回报既包括经济方面的也包括道德方面的目标）。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分立的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起支配作用的一套制度，是否最有利于引导个人去增进其他人的利益，或至少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用我们研究市场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过程，有几种不同的方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政治过程视为有着互动关系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系统，由此产生出各种均衡的结果。这种观点会认可我们能够归之于那些个体的任何动机，也会认可我们据以评估运行规则的任何一种标准。这里所说的动机和标准，能够从<sup>19</sup>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在随后几章，我们将探索这些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的途径。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既不是当事人的动机，也不是评价标准，而是我们打算从考察市场的相同角度考察政治过程。有着各自目标的个人，在一套规则（政治制度）下相互交往以实现那些目标，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最终形成一种特定的均衡结果。如果个人的能力和目标不变，则改变结局的惟一途径就是改变规则。反之，规则的任何改变，都将改变从个人交往中产生的结果。

我们在下面几章的许多讨论，都涉及政治规则结构的特定方面的涵义。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政治背景下的规则—结果之区分的某些必要细节。在一个层次上，政治游戏的规则是相当清楚的：多数规则；定期选举；对政府的获取权力的各种限制；对公共开支进行系统审计的规定；选举安排的地域结构、包括联邦结构之下政治权限的可能的分配，等等。但这些特征本身



有许多是从政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例如，对于具有重要宪政特点的公共活动之恰当领域的理解，主要取决于正在发生的政治决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规则—结果之分在政治背景下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由于规则和遵照这些规则做出的决策本身，其实都形成于同一政治过程，因而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似乎多少有点被夸大了。而恰恰是在这种区分不那么清晰的地方，博弈的基本规则才面临风险——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将在政治背景下继续坚持规则—结果之分。

## 七、规则的重要性

研究规则的第一步论证，取决于我们承认规则的如下作用：它能够为一个由有着既定能力和目标的社会人所组成的共同体，  
 20 萃取出一种均衡结果或结果格局。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指出，社会中的同一群人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果，这取决于现行规则。但是，只有那些能够在某些制度安排下作为均衡而形成的社会后果，才是合理的。基于这个理由，考察所有能够设想的社会结果，并依照某些独立的、外在的规范性标准选择出最恰当的理想结果，是一种误导世人的做法。制度安排对一组社会结果的约束力，不亚于划定了人们的欲望和产品之范围的基本的生理约束（“禀赋”）。

为避免别人指责我们是在这里扎一个稻草人，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共政策领域关于分配公正或“公平”问题的传统讨论（我们将在第八章予以详尽讨论）。传统的做法是考察符合生产能力的基本禀赋、符合再分配过程中造成的必要损失的所有总产出的分配模式（不过，有时甚至连后者也被忽视了）。以此为基础，分离出理论上最为可行的一套“分配模式”，引入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或伦理标准，以便从中挑选出“最优”模式。然而，一个

理所当然的宪政主义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从政治过程中形成这一“最佳”结果？更有意义的做法大概是，把各种备选的政治规则具体化，考察由它们形成的分配模式。如果它们没有一个恰好与以前推导出的“最优”分配相一致，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这种“最优”分配是不可行的。

宪政主义者之所以坚持研究规则，是因为他力求将所有相关的约束纳入分析之中。在分析中不考虑制度性约束，与不管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能力的限度或无视基本的稀缺约束一样，都应当受到批评。

研究规则的第二个论点，从性质上说是规范性的，它有几个维度。我们将在下一章详尽考察其中之一，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同的规则间进行选择时，由于这些规则将在长期的连续博弈中有效，而其中的每个玩家的运气都不太确定，因而这样的选择具有在规则之下进行的选择——在这里，每个博弈者的处境是十分明确的——所不具备的某些特征。更明确地说，博弈者的利益中发生冲突的天然倾向，会在规则的选择中得到大大缓解，并提高博弈者就规则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21

但是，在主张关注规则而不是结果的规范性论点中还有另一个维度。这涉及如下主张：不了解结果如何发生，也就不可能从规范的角度正确评价结果。提出这一主张可以基于如下理由：过程内在地具有规范含义，或关于过程的信息反过来提供了关于结果的信息，而如果没有这一信息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评估。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出现了一个具体的经济结果，甲有5个苹果、6个橙子，乙有10个苹果、9个橙子。对这一结果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这一结果如何产生的信息。假定我们发现，这仅仅是因为甲拿走了原来属于乙的6个橙子。如果我们认定乙以前的占有有合法的资格证明，我们就

可以认为后来出现的结果在规范的意义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由甲的盗窃行为而出现的——因为在形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甲在规范意义上违反了相应的行为规则。

同样，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赛——比如赛跑——的结果也许根本无关紧要：只要规则是公平的，并得到了遵守，则任何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就算从规范的角度说结果有着重要意义，但形成它们的过程同样如此。一个无辜者被错误地判定犯有某一罪，如果他知道虽然陪审团搞错了事实，但审判是完全公正的，他也会稍觉安心。同样，确实有罪的人，在完全公正的审判程序中可能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即使他早就断定会有这种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规范性目的而言，结果与过程同样至关重要。

规则在另一层意义上也可能具有规范性意义——不是因为遵守某种规则的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是因为遵守规则提供了有关结果之规范状态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结果的属性是其效率时，即属于这种情况。具体说来，如果苹果与橙子在甲和乙之间的配置状态是双方以自己的初始资格作为起点，通过自由交换而形成的，且假定苹果和橙子都显示了通常的“私人”物品的属性，则我们就可以推断，由此得到的配置是有效率的，或至少可以说，这一交易合乎帕累托标准。如果缺乏这一最终结果如何产生的信息，则完全没有理由推断它是否有效率。而且，事实上，除非分析者有能力了解相关个体的精神状态并因而弄清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是否有效率。结果是从遵循某种规则的某一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关该结果的规范性状态的信息，而通过别的途径是无从知道这一状态的。在这里，规范性意义被赋予结果而不是过程，但是该过程提供了一个检验该结果之性质的标准。

注释：

- [1] 特别参见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布坎南：《自由的界限》),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霍布斯：《利维坦》) (1651), New York: Everyman Edition, 1943.
- [3] Gordon Tullock, *The Social Dilemma* (塔洛克：《社会的困境》), Blacksburg,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74.
- [4] 博弈论中有超优策略 (dominant strategy) 的概念。在博弈过程中，不论对手采用什么策略，如果自己的最优策略是惟一的，那么自己的这个策略就是“超优策略”。——译注
- [5] 对于达成采纳何种规则的协议会容易实现，而对于达成严格限定的分配性配置 (Distributional allocation) 的协议则要困难得多，对此所做的一般的原则性讨论，请参阅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第二章

# 契约主义的视角

### 一、引言

本章的意图是表述一种规范的立场，我们站在这一立场上分析与社会秩序的规则有关的所有问题。我们从哪个视角来考察现实的或潜在的社会互动世界呢？除非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否则我们在与那些视角完全不同的人们交流时，就有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sup>[1]</sup>坦率而明确地说，我们的立场是**契约主义的**。这个术语本身表明了通晓古典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社会之思想基础的著述的人所接受的概念框架。对于我们这一立场受到最常见的批评，我们必须强调，在使用这一契约主义建构时，是以怀旧的方式着眼于它的比喻性的合法化含义，而不是它的历史含义。相应地，在运用这一模型时，它既有比喻性的评价的含义，也有经验确证的含义。<sup>[2]</sup>

在契约主义的哲学观和规则取向的或宪政主义者的观点之间，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节考察这种关系，并简要讨论宪政主义思想中可能存在的非契约主义因素。契约主义观点是建立在有关价值和价值评估之终极根源的个人主义前提上。<sup>24</sup>第三节探讨了这些信条，并特别与那些较为常见的非个人主义的目的论作了对比。第四节把这一契约主义范式置于人们最为熟知的背景，即一般的经济交换的背景。第五节把这一观点

扩展到公认的政治学领域。第六节较详细地研究了一致同意的要求。第七节则把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下的选择之间的区别与一致同意的要求联系在一起。

## 二、非契约主义的宪政主义

我们在第一章强调，宪政主义者的突出特点是，他对既定规则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和这些规则本身有着严格的区分。一旦做出这种区分，规则约束潜在产出的效果就变得显而易见。只要认识到这种关系，即可促使人们关注社会秩序的规则，将它们视为研究的对象，并且几乎必然倾向于在有关社会政策或社会变革的所有考虑中形成一种扩展的时间维度。

不过，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不必同时是契约主义者。理解并重视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与这些规则下的行为结果之间的区别，既不需要来自于契约主义的立场，也不必以它为基础。也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极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看重现存规则，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并且一直存在。这种人有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其实他可以自称是惟一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因为他的理想就是一套一成不变的约束规则。

还有一种相对不那么极端、但与它有密切关联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作为约束条件的规则与约束条件之下的行为本身是不同的；但它同时也包含着这样的观点：社会秩序的规则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人工产物。按照这种观点，规则是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发生在基本结构的层面，它们也只有通过有机的演化过程才能实现。因此，对基本规则（广义上的宪法）的“改革”，是一种有着内在矛盾的做法。社会规则之所以能够发挥形成秩序的功能，仅仅是因为在任何直接意义上它们都是不可改变的。

第三种立场也许保留了表面上的宪政主义要素，但出于各种原因，它和那些看上去很接近契约主义的思想很不相同。它把法律结构分为两个层次，“高级法”用于保护人们作为“人”而拥有的一组“自然权利”。按照这种解释，“宪法”是用来保护这种自然权利的制度或规则结构，其他所有行动则属于普通政治的范围。现行宪法固然可以修改，它既可以沿着更加符合对自然权利的理想保护的方向进行，也可以沿着更加背离理想保护的方向进行，但是对人类自然权利的定义本身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打算详细阐述支持上述三种立场的各种论证。我们只想指出：这三种立场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具有某些在当今共同对话中被视为宪政主义的要素。契约主义者拒斥前两种立场，因为它们有着根本性的消极无为的含义。假如社会经济和政治博弈的规则本身不是可以进行结构性变革的人为制品，那么人们只能无所事事地忍受历史的力量。无论是因循守旧的反动派还是非建构的演化论者提出的观点，也许是对那些天真地谈论人类完美性的浪漫幻想的出色回击，但我们毕竟必须抱有希望，社会秩序的各种制度是可以改革和变化的。即使没有其他理由，对社会哲学家来说，提供这种希望也是一项道德义务。

契约主义者和自然权利理论家的分歧的来源，与因循守旧的反动派和演化论者的分歧的来源大不相同。契约主义是从共同体的个体参与者推导出全部价值，拒绝包括“自然权利”在内的外在确定的价值来源。第二节<sup>[3]</sup>的讨论与反对自然权利立场的论证，以及与反对所有那些从外在的和非个人主义的根源推导出价值的立场，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

### 三、作为价值源泉的个人

整个契约主义建构的成败，取决于一个至关重要的规范性前

提：完全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定位价值。个人是惟一的意识单位，一切价值评估都是以此为起点。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丝毫不<sup>26</sup>否认共同体或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一个孤立的人的价值体系，可能与被描述为一种或多种社会关系中的成员的个人之价值体系完全不同。这一前提仅仅表示：社会或共同体的影响经过调整而进入由个人潜在地，而不是外在地表达的价值。

假如把个人预设为价值的惟一来源，就出现了认同的问题。应当把哪些个人看作价值来源？对于相关共同体中的人，不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分办法；即使能够区分，似乎也不存在一种逻辑上的理由建立这种区分。一致性原则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被看作道德上平等的个人，他们有着平等的能力对那些相关选择表达价值取向。

仅仅从这些前提中，即可推导出一种有关集体秩序的契约主义“解释”。个人按照他们对各种前景的评估，通过一项得到一致同意的协议，组建一个集体或政体，由它履行特定的职能，这首先包括提供保护性的或最小国家的服务，其次是提供真正由集体消费的服务。<sup>[4]</sup>

如前所述，从经验的记录来看，历史中的国家的建立，与契约主义的解说基本上没有关系。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的出现是强者征服弱者的结果，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如下问题不重要或不相关：从规定了其运行方式的规则这个角度所观察到的现存国家，从广义的契约主义观点看能够获得合法性吗？如果否认这个问题的相关性，同时又坚持契约主义的前提，这无异于指控几乎所有可以观察得到的国家都是非法的。这样一来，契约主义者就只能加入革命者的行列了。然而，如果在宽泛的限制下，政府能够以“仿佛”是从契约中产生的方式而获得合法性，这就为建构性宪政改革敞开了大门。即使现行规则不是以契约方式形成的，也可能用这种方式对它们加以改变。



- 27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有关国家起源的推论中，没有借助于任何外在于加入到共同体的个人所表达的偏好的价值资源。国家不是为了保护“自然权利”而出现的。它也不反映或代表某种宇宙力量（比如上帝或神的意志）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国家不是作为独立于政体中的个人而存在的有机体。国家没有自己的行动，它也不能追求自身的目标。对“社会福利”也不能孤立地加以定义，因为它不能独立存在。

至此，捍卫契约主义还算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提出个人希望从政治秩序中获取什么这个问题时，即使仍然接受契约主义的基本前提，却会产生十分微妙的混乱。即使否认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的存在，或者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我们还是要面对当个人进入理想化的契约对话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的问题。当个人之间试图就某些规则——这包括支配其行为的规则和对实施这些规则的政府权力做出限制的规则——互相达成协议时，他们究竟在寻求什么？他们是在追求“善”，还是在追求“真”？他们是把集体组织视为一种发现的工具或手段吗，无论要发现的东西是“善”、“真”或“美”？政治类似于科学，还是科学类似于政治？

#### 四、契约和交换

我们与其一头扎进这些问题引起的迷雾重重的辩论之中，不如采取迂回策略，引入一个人所熟知的背景。我们所关心的归根到底是个人对契约性协议的参与，它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博弈的最基本规则的改变，而个人就生活在这种博弈之中。普通的市场交换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类比——市场交换就是一个达成契约的过程，我们都参与这个过程，而且经济学家对这一过程有着十分发达的分析工具。我们只需要考虑最简单的交换模型：只有两个

人和两种商品的贸易或交换。

首先，让我们考虑  $A$  和  $B$  两人，每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两种产品或商品：橘子和苹果。为简化起见，让我们假设  $A$  最初<sup>28</sup> 拥有全部橘子， $B$  拥有全部苹果。对两个潜在的交易者而言，这两种商品从效用或偏好函数的意义上说都是“有用品” (goods)，而且没有足够的数量完全满足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种商品的嗜好。在这种条件下，交易能够使双方获益。 $A$  会以橘子交换苹果； $B$  也会充当互惠的角色。只要双方在内心对两种商品的权衡不同，就会同意进行交换。当交易停止时，在这个均衡点上， $A$  在橘子和苹果之间的内心交换比率等于  $B$  的内心交换比率，亦即等于产品交换的最终条件。

当然，这只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从我们的契约主义—制度主义者的视角来观察这种简单的交易过程。交易中隐然规定的规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初始拥有物享有权利，禁止交易中的暴力和欺诈行为。在这些规则下，两个交易者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他们各自获得了新的所有——两种商品在双方之间的一种新的归属或分配。

对于这样获得的结果，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在初始的所有物和交易博弈的现行规则的条件下，这种结果就是价值最大化的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价值的来源仅仅存在于从事交易的个人的偏好之中。没有外在的价值来源，交易本身也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外在的、独立的既定价值的手段。个人只在交易过程发生时做出他们对两种商品的价值评判，并且，如果没有交易发生，也就没有办法确定任何价值。

只有通过交易协议才能够实现最大化的价值。但是注意，这并不是说价值是由协议本身决定的。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交易者表达了他们对所交换商品的价值评判。他们不是从协议中得出这种价值评判的；相反，价值是导致达成协议的要素。

我们这样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观点，是因为对于价值或效率最大化同协议的关系，似乎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看法。科尔曼教授<sup>29</sup>在对我们的立场提出的深入批判中，区分出在确定效用或价值最大化时他所谓的协议的认知用法（epistemic usage）和尺度标准用法（criterial usage）。<sup>[5]</sup>所谓协议的认知含义，科尔曼教授指的是契约过程的工具性功能。因此，假如确实存在某种外在于交易者的价值或评价标准，则交易过程本身可以根据它在达到用该标准所衡量的最大化的成败加以评价。和认知的用法相对应，科尔曼引入了协议的尺度标准用法，科尔曼用它表示价值是由协议本身确定的。在刚才讨论的简单交易过程中，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用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与它无关。不存在独立于交易过程的外部价值标准。尽管协议的最终达成是通过个人的价值表达实现的，但是在个人价值的表达中，交易者也不是从协议本身的最终状态得出其价值观的。他们自身的、基于个人的价值观，随着交易的出现而出现；这种价值也不反映协议本身的反馈影响。

概念化地观察交易过程、未看到违反基本规则行为的经济学家，能够为均衡的交易结果贴上一个“效率”或“价值最大化”的标签。他们在这样做时，既没有参照任何外在于交易参与者的标准来评价交易结果，也没有引入他自己的某种价值标准。在既定的规则之下，交易结果肯定总是“有效率”的，而且经济学家也没有办法定义一种独立于交易本身的“有效率”的配置。经济学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评价标准，它涉及交易规则而不是交易结果。<sup>[6]</sup>

## 五、交换视角的政治学

我们较为详细地讨论了简单交易的例子，因为政治学的契约主义视角的含义也许能通过这一交易类比而获得最好的理解。在

最一般的意义上，政治学的契约主义范式就是交易范式，且随后的分析也会随时利用人们所熟悉的商品交易的例子。只要把价值的来源定位于个人，且在人们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就可以把全部政治事务仅仅看作一个复杂的涉及多人的交易或契约系统。个人必须被认为是聚集在一起探求某些问题并最终达成协议，以建立对大家都相互有利的集体组织或安排。<sup>30</sup>

在此背景下，人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当然不会完全等同于橘子和苹果这种简单的交易方式，后者的交易对象是能够在私人之间进行分割和消费的物品。在政治领域，在最一般的层次上，人们之间“交易”的结果是一组达成协议的规则，而不是得到明确界定的归属于分立的个人的物品。在初步脱离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层面上，个人之间也许会达成一项协议，尊重他们之外的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在这样的交易中，每个参与者都从秩序中获益，从而减少了把资源用于防范的需要。作为交换，每个参与者都如契约性协议中所规定的那样，放弃自己对他人的财产和人身进行剥夺的行动自由。

这个基本的概念性事例表明，建立在一定规则基础上的契约性协议，必然先于任何可分割的商品的一般交易。除非存在着某种相互接受的看法——它涉及谁享有什么权利，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做什么，否则更为常见的市场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让我们回到前文的例证，如果A、B两人没有相互承认作为初始所有物的橘子和苹果的产权，他们便没有开始交换的基础。因此，政治秩序必须先行于经济秩序，尽管在经济学中讨论交换范式似乎比政治学更为自然一些。

这一基本的“概念性—推测性的”事例也使我们引入其他几条原则，它们有助于澄清政治和立法讨论中一些普遍存在的混淆。政治秩序的规则，包括对人身权利的规定，只能从作为政治组织成员的个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合法地推导出来。一种常

见的观点，即个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界定的，没有  
31 任何根据。个人为了保障和维护那些在契约中得到公认的权利而建立了政府。“政府”或政府的代理人，采取独立行动修改或改变个人拥有的权利，势必违反契约的精神。当然，在建立政体时把强制性权力授予了政府，这些权力是用于阻止外部或内部侵犯者的犯罪和对权利的侵害。在授予这些权力时，可能会产生制约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一旦建立起掌握着统治权的政府，它有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局限在当初授权的范围内。不过，政府一旦超越这些限制，它的行动就是非法的，即使从最阴暗的霍布斯主义契约观来看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可能主动承担起重新规定个人权力的角色，可是它这样做明显违背了“政府的合法性源自契约”的原则。

非霍布斯主义的契约观不承认统治权说到底必须不受控制的观点。政治秩序的规则也许会放宽限制政治单位可以采取行动的范围，并且有关宪政变革的大多数清晰的讨论，其实都是涉及如何划定政治权威而非个人权威之界线的问题。在规则与规则下的行动之间做出基本区分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比在普通的个人交易领域显得更加突出。在私人行为方面，可以隐然看到个人停留在各种限制或权利之内。作为一种制度结构的“法律”，禁止一个人侵入他人的领地，假如有人做出了这种侵犯，法律就对他施以惩罚。几乎我们的所有日常行为，都是发生在一个明确制定的法律规则的结构之内。而在政治领域，集体和政府的行为也受到并且应当受到明文制定的规则约束的观点，看上去却不那么“自然”。宪法界定了政治权力的活动范围这种观点很抽象，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不易理解。

## 六、作为契约理想的一致同意

我们所理解的个人展开讨论并最终达成某种初始协议，它规定了彼此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并建立起一个负责保护和落实这些权利的权威机构。为了使这种契约主义思想前后一致，必须把协议<sup>32</sup>理解为具有包容性，其中的条款必须为受协议影响的团体中的全部成员所接受。把在一个团体的部分成员中达成的契约性协议中的条款强加于他人，会破坏整个结构的合法性。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可以观察的一套规则，从理论上说必须来自于普遍同意。不过基本规则本身可以规定采取行动的程序，无论它是私人还是集体行动，而无需政治体内的全体成员在行动上或主观上的同意或认可。实际上，我们在强调规则和规则下的行为这两个基本层面时所表明不同决策层而的划分，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征。也许存在着对采取政治行动的某种规则的普遍认可（比如，在一个立法会议中，按照多数投票规则决定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但是政治行动不需要得到共同体全体成员的赞成。也可以存在着对某种法律规则的结构的一致同意，在这个结构中个人以其私人身份可以采取受到他人反对的活动（比如进入一个现有的产业或职业）。<sup>[7]</sup>

即使从高度抽象的哲学层次上承认建立社会秩序制度之合法性的一致同意的基础，但是在实践层次上，一致同意的要求可能看起来不过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乌托邦。个人在进入订立契约的过程——即使它有着最理想化的形式——时，有着各自形成的价值观和各自明确的利益。可分割的私人产品的简单交易的类比是无效的，或可以证明它是无效的，因为在任何社会或政治契约中，必须就适用于全体参与者的相同规则达成协议。与此不同，在苹果和橘子的交易中，协议的形成受到一个简单事实的帮助，

即双方在交易之后不需要具备相同的潜在消费组合。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要求A、B两人就产品的最终分配结果达成一致，且这个最终分配结果是双方有同等数量的每种产品，那么这种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完全排除了协议的达成。

不过，除了任何政治协议之“公共性”外，我们还面对着  
33 一个更大的难题，即交易群体的规模。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其实是在任何经济关系中，从任何直接参与的意义说，所达成的协议最终只能是包括两方或两个代理人：每一种用于交换的商品只有一个卖者和一个买者。当然，其他卖者或买者的在场或不在场将影响到两个交易者之间的交易条款，但是“2”对于经济学分析来说仍然是一个魔法数字。

而在政治交易中，所有参与方都要对条款表示同意。如果我们从简单的经济交换范式中试图得出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则期望在任何事情上得到一致同意的结果的基础就彻底消失了。在采用一致同意规则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把所有其他人作为对手的特定位置上，这完全类似于双边垄断博弈中有一方控制局势的状态。策略性讨价还价行为的动机看起来就是最大化。前文提到的博弈结果的“公共性”限制着经济交易背景下的协议，然而，在这里它却部分抵消了策略性讨价还价行为的动机。如果参与者认识到将要达成的结果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他们就没有多少动力去争取纯粹的分配性收益，而在双边垄断博弈中，成功的战略家可以期待类似的收益。

## 七、同意规则、无知之幕及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重新考虑规则的选择和在规则之下的选择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那么对赋予政治规则以合法性的一致同意标准的可行性予以反对的看似令人信服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削弱

了。对于规则下的选择，我们可以称为普通政治，普通政治中导致冲突的因素似乎大大超过促成潜在合作的因素，因为个人的和团体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界定，并且是很容易识别的。起点的集合，或当前可能位置集，看起来几乎无所不包，在一致同意的规则下对它们无法做出任何改变。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帕累托最优集合是异常庞大的。然而，当人们面对的选项不是普通政治中的选项，而是规则或制度，这一前景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在这些规则或制度下，结果的格局是由各种各样的非全体一致的<sup>34</sup>决策程序决定的。就规则可能达成协议的范围，必然大于就特定规则下产生的结果达成协议的范围。

这个结论直接来自以下事实：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在选择规则的过程中都非常难以确定。对于个人来说，当面临几种选择权的时候，要确定这些选择权中哪一种将确实能够满足个人合意的价值最大化目标，是十分困难的事。当我们转而考虑对规则或制度的选择层次时，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利益认同上的迷失。首先，根据定义，规则适用于众多实例或案例。这就是说，规则体现“公共性”特征，而公共性不需要体现在特定政治结果之中。例如，考虑一个牛奶场主的状况，他面临两个层次的选择。他可能会强烈反对削减牛奶价格补贴，因为这无疑会减少他的财富净值。同时，他也许会支持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该规则能消除针对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这种规则变迁或制度改革对牛奶场主自身净财富的影响是不同的，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净财富受到的影响相对不确定。

规则还有一种相关的但略微有些不同的特征，就是它们包含着一个延展的时间维度。对规则的恰当看法是，它们存在于一个多个期间的时间序列中。考虑一种博弈，如果规则在每个回合之前都要重新制定，那么我们几乎无法根据规则来描述这种博弈。



规则是趋向于准永续的；它们的“生命”要比在它们约束下达成的交易结果的生命长得多。比如，如果一个平衡预算规则仅仅适用单一的预算期，那么该规则就毫无意义了。只有当这种平衡预算规则在连续的预算期内被认为始终有效，我们才会认为这种约束是一个“规则”。

随着规则的普适性和持续性的提高，面对多个选择的个人就更加无法确切知道每个选项对自己处境的影响。如果我们假定个人通常试图最大化其预期的净财富，则这一关系就显得更加清晰可见了。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标准的行为假设，并不是这里的分析的必要成分。即使不考虑参与者个人寻求何种最大化，随着

35 规则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持续性，特定规则对价值之影响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大。

对规则或制度的任何选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起着有益的作用，它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特定规则对个人境况的影响有着真正的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个人在自我利益的计算的引导下，专注于那些能够消除或最小化潜在灾难性结果的选择。比如，考虑这样一个政治决策的规则，该规则规定随机选出某个社会成员，这个成员将被赋予一种特权，可以决定把谁投入监狱和投入多长时间。在立宪选择的层面上，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其他公民有着相同的机会被选出来充当这个“独裁者”，这样的规则协议也肯定会被拒绝。这个当选者行使独裁权力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将远远超过预期收益。（第四章对此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如果面临立宪选择的个人对于不同的选择给自己造成的处境有着不确定性，他可能会倾向于达成“公平”的协议，此处“公平”的含义是，在该协议的约束之下形成的交易结果格局将会得到普遍接受，无论参与者本人在该结果格局中的处境如何。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是基于这一推理过程，引入了

“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我们此处的讨论和罗尔斯的整个体系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sup>[8]</sup>不过我们强调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无知，因为选项的设计本身会影响到前者。

如果建立的模型是人们要对社会秩序的规则进行选择，而这些规则又具有普适性和准持续性，则“不确定性之幕”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即使它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与此相比，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是理想化的规范建构，它是人们在考虑选择基本的公正规则时的恰当起点。这一建构遇到了两种反对意见。知道自己是谁的现实中的个人，能够像处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那样做出选择<sup>36</sup>吗？此外，这一建构具有普遍的正义感的经验基础吗？我们所采取的最初在《同意的计算》（1962）中提出来的局部的不确定性之幕，没有遇到类似的批评。它不要求进入宪政对话过程的个人在道德上改弦易辙。模型中的人一如现实中的人。不过，选项的设计肯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的幕布和罗尔斯更为充分研究过的幕布是相同的。

另一种反对罗尔斯理论建构的观点也不适用于我们的建构，并且这种观点说到底错误的。在罗尔斯的理论建构中，初始位置上的个人处于无知之幕后面，他对自己在所选定的社会秩序规则——被选中的将要生效的正义原则——下的处境一无所知。然而，据说个人又完全了解这些规则下的结果的一般特征。这种形式化的建构导致了一些批评家的指责，他们认为与罗尔斯本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整个罗尔斯理论建构中没有任何契约主义要素，这些抽象的个人会自动就其偏好的选择达成协议。这种观点按其自身的根据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对不同制度的运行特征的预测中必定包含的主观因素。<sup>[9]</sup>当然，这些主观因素一直存在于计算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中；只有这些因素使契约性协议的生效成为必须。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不确定性表现中，两种理论建构仅仅在有限的条件下完全相同。

## 八、结 论

本章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对早期著作中一些材料的总结，它们都是根据可称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契约主义观点而形成的。我们感到有必要以总结的方式把这些材料纳入这里的讨论，以便让不太熟悉这些早期成果的人们对它们保持可能的兴趣。我们的起点是契约主义的观点或范式，它是我们的起点，也划定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读者如果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以下各章更为专一、更少为人熟悉的论证，有可能看上去和前文全不相干。

我们不断遇到的挫折之一是，同行们明显不愿意承认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几条原则。问题似乎出在研究视角（范式、概念或研究纲领）的不同上。我们在这一章已经勾画出我们的视角；在第三章中，我们将尝试描述和评判反立宪主义者的视角。

### 注释：

[1] “speak in tongues” 原义为“用方言说话”，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14.5。——译注

[2] 论述这种契约主义视角的其他文献，参见 James M. Buchanan 和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布坎南：《自由的界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James M. Buchanan,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布坎南：《宪政契约中的自由》)，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7; 以及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布伦南和布坎南：《征税权》)，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原文如此，疑应为“第三节”。——译注

[4] 有关这一推导过程的详细阐述，参见布坎南：《自由的界限》。

- [5] Jules Coleman, "The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科尔曼: "宪政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i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taining the Economic Powers of Government*, ed. Richard McKenzi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4. pp. 141—155.
- [6] 更加详细的分析参见 James M. Buchanan, "Rights, Efficiency, and Exchange" (布坎南: "权利、效率和交换"), in *Anspruche, Eigentum und Verfügungsrechte*, Arbeitstagung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Basel, 1983.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4, pp. 9—24.
- [7] 这里以及下一节的讨论, 与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一书中的分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8]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罗尔斯: 《公正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9]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分析,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and Roger Faith, "Subjective Elements in Rawlsian Agreement on Distributional Rules" (布坎南等: "罗尔斯式分配规则协议中的主观因素"), *Economic Inquiry* 18, Jan. 1980: 23—28.

## 仁慈的神话<sup>[1]</sup>

### 一、引言

如我们早先所说，契约主义—立宪主义的观点无法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学术共同体中争取到拥护者，主要原因不是科学分析层面上的意见分歧，也不是来自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概念的正确含义——的分歧，尽管那些不相干的论战中的花言巧语，经常用意识形态的指责来掩盖其理解力的贫乏。至少就重要的方面来说，问题是出在交流和理解方面，而不是出在基本伦理标准的不一致。反立宪主义者并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他们的理解非常表面化，因为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社会互动现象的。

在第二章，我们尝试定义和描述了契约主义的视角或范式。但是这种定义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努力理解对立的观点，理解反立宪主义者的成见，理解他们对同一个现实的和潜在的社会互动世界进行理论解释所依赖的基础。为了搞清楚为何有这么多的同行如此固执地拒绝我们的契约主义观点，用尼采的比喻说，我们必须尝试透过另一扇窗户看世界。我们必须尽可能怀着同情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绝不轻易指责别人

39 犯下了分析的错误或具有颠覆性的意图。

对于广义的经验证据的积累同范式转变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尚不具备很多知识。但我们知道，对于几乎所有的个人来说，这种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因为人们确实在改变着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人们观察到的事情越多，并借助于科学进行间接的观察，他们的视角也会随之变化。不过我们也知道，当人们理解了从另一些视角对现实做出的解释时，他也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即使他所感知到的经验一历史记录没有任何变化。

契约主义—立宪主义者和反立宪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双方实际看到或观察到的世界有何不同。恰恰相反，这种差别在于他以何种方式来解释他所看到的世界，或者他以何种方式把自己观察到的现实嵌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试图“解释”反立宪主义者观察政治的方式。“政治”一词在此含义很广泛，包括了社会互动的所有方面。然后，我们才能比较第二章中提到的看问题的方式及相应的概念体系。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我们所要解释的范式的创始人，所以我们的解释必须被看作假说，而不是像第二章那样的清晰陈述。

在第二节，我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第二章曾简短阐述过的晦涩话语，它是由个人在政治中追求什么这一问题而引起的。我们必须澄清“公共利益”（public good）的含义，并把它和“私人利益”（private good）比照，这又涉及有关价值来源的更深层次的讨论。第三节继之以对政治和科学的比较，我们把两者都视为固有的社会行为。第四节试图证明，“真理判断”（truth judgment）范式几乎无可救药地导致了政府仁慈的神话。第五节探讨这种神话中的多数主义民主的概念。第六节在更为一般的哲学层面上，把这一范式与我们的范式做了比较研究。

## 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当人们完全独立地采取行为时，他们会寻求什么？当他们参与40 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时，他们又会寻求什么？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处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的人，比如“星期五”到来之前的鲁滨逊·克鲁索，寻求他们想要寻求的东西：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无聊。经济学家也许会回答说：人们追求“效用”，然后根据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来设计自己的行为。然而，这种形式的效用实际上是空洞的，因为它只会是“人们加以最大化的任何东西”。任何具有可比性的概念都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满意、快乐、幸福或X。这里的要点是，对于在孤立状态下、在任何社会关系之外做出的纯粹的私人选择而言，个人被假定确立了他们自己私人的和内在的价值标准。

第二个问题要困难得多。经济学家建立起在理想的竞争环境中的个人行为的模型，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避开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影响。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的抽象模型中，每一个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他是置身于社会互动之中。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对他所面对的价格做出反应；他的经济交易仍然是完全非人格的。

当然，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仅仅是理想的建构，并且他们承认，即使在得到清晰描述的最具竞争性的市场中，也可能存在着真实的社会关系因素。作为卖者和买者的个人，在市场的交互网络中总是会面对其他人，他承认这些人是人类中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关系其实是社会关系。

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理论分化出两种相互独立的方法论取向。如果追求的是实证的预测性理论，为参与经济交换的个人建立的模型将继续假设他们不认识互惠交易关系中的交易对手。为

了给个人的选择行为提供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表述，必须预先确定个人追求最大化的目标。于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出场了；个人被假定仅仅追求他自己的明确的私人利益，这种利益是可以客观量度的净财富。

如果经济理论家的目标仅仅是对整个交易网络提供一个逻辑解释，则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个方向。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允许意识到交换关系之社会性质的个人与潜在交易中的另一方的利益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也许会使选择行为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可以进行客观度量的最大化目标不需要被具体化。因此，在这种理论建构中，个人追求的最大化“价值”保留在自己内心中。这一价值可能包含着对交易中另一方的利益的某种考虑。但这只是当事人主观体验到的利益，而不是假定会受其影响的人所体验到的利益。

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也是大量混乱看法的根源。我们需要做较为细致的讨论。经济交换中有A、B两人；A认识到交易关系的社会性质。既然如此，他不会单纯追求自己净财富的最大化。他可能也会尊重B的福利，因为他重视这种福利。但是这种评价标准是内在于A本人的；它不可能是B对自己财富的评价。B的评价不可能影响到A的选择行为。

我们再次看到，简单经济交换的讨论是非常有用的，它有助于理解更复杂的“政治”的互动关系。起初我们可能会认为，广义的“政治”指的是所有个人之间的活动，而不是本来严格属于经济学领域的基本的双方“买—卖”交换。在第二章我们曾指出，从契约视角来看，“政治”被看作是“复杂的交换”。但是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行为动机要比在简单的经济交换中复杂得多。在简单的经济交换中，维克斯特德的“相互冷漠论”（nontuism）<sup>[2]</sup>的方法论假设允许把参与者看作在交易过程本身中追求净财富最大化者，这使得分析家可以假定在这过程之外存在任何程度的利



他行为。<sup>\*</sup> 交换的分析者把目光集中在交换的动机上，忽略交换外的行为，把交换外的行为排除在个人的利益约束条件之外。

然而，在“政治”中，这样的假设不能成立。让我们来考虑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治上有组织的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受到必须在两种行动过程之间做出的选择之后果的潜在影响。换言之，这里的背景是，“公共利益”或“公害”是备选项的特征，在这里“公共性”有着标准的技术性含义。如果我们现在假定个人行为的目标就是单纯的财富最大化，那么我们就是在假定，<sup>42</sup>除了我们所评价的个人利益以外，属于其他人的利益都被排除在外。很清楚，这是一种比市场交换模式更极端且更难以接受的行为模式。因此，在政治领域，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非经济学家，以及很多经济学家，不太愿意运用净财富最大化的假设研究个人行为。

这种态度很容易理解，但是在放弃了这个假设，把效用或偏好函数维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时，却出现了另一个基本的错误。如果个人不追求自己所期望的净财富最大化，那么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追求什么呢？

我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假定参与者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当他们做出政治决策时，他们会尽最大努力追求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种动机，当然是一个经验问题。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考虑别人”的程度很容易被嵌入基本的契约主义范式中。契约主义的模型，或复杂交换的政治模型，根本不依赖个体参与者的动机假定。

然而，契约主义模型确实依赖如下假定：“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以及二者不同程度的混合，都是内在地得到理解的，因此对于实践它们的个人而言都是主观的。比如，一个人的

---

<sup>\*</sup> “nontuism”也译为“非第二人称原理”，详见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行为也许会严格遵从理想主义者的标准；他也许会尽力考虑社会上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作为自变量的其他人的利益，以内在于参与者的方式进入参与者的选择计算；如何把其他人的利益纳入考虑取决于参与者的评估。这样得到评估的利益不可能以任何直接的形式反映其他人的意思表达。

契约主义和非契约主义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明确差别就体现在这里。非契约主义者假定，政治中的个体参与者寻求“公共利益”，但这一目标被他们认为是外部的客观存在，是存在于这些参与者的价值和评价活动之外的，这些参与者通过自己的选择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的客观性，把契约主义和非契约主义立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不是假定的动机的区分。

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独立的客观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sup>43</sup>可以直接推导出，追求这一目标的个人的价值观来自于某种外在于自身的根源。他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这永远也弄不清楚，当然，可以凭空捏造很多种根源。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分析；我们只是强调，假定存在着可以客观定义的“公共利益”，这与我们所说的契约主义视角不一致。<sup>[35]</sup>

### 三、科学、真理和政治

我们可以通过区分两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即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来澄清我们的论点。这种区分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科学是人们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而这些人又都承认存在着非个人的、相互一致同意的价值（即真理）；并且更进一步看，他们把这种价值作为所有科学事业参与者的共同目标。因此，科学不能以契约主义的或复杂的交换范式来分析。科学与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契约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把政治比拟为经济关系；非契约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把政治比拟为科学活动。

当然，科学确实利用意见一致，但它只是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认知意义上这样做。有专业知识的科学家之间的意见一致，是检验命题之真实性是否成立的标准。但是这种意见一致本身毕竟不能证明命题的正确。从概念上说，正确性独立于任何科学家的信念，也独立于部分或全体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因此，任何科学命题都一直处于可被反驳的状态，即使在某个时间点上对它的正确性存在着全体一致的意见。在中世纪，不会因为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世界是平面的，世界就是平面的；在今天，不是因为所有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曲面的，它便是曲面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人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在中世纪最有力的检验支持平面说，就如同今天最有力的检验支持曲面说一样。我们的观点是，在科学上得到公认的是，“存在什么”与任何一个科学家或全体科学家的主观判断完全无关。

在科学事业中，单个科学家认为某个命题为“真”。他这样说，并非是把他的个人价值观赋予这个命题。他是在应用他自己的真理检验或真理判断方法。他在问：“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他不是问：“这个命题对我有利吗？”或“这个命题对社会有利吗？”个人会把自己的价值赋予经济结果，但这种价值与科学命题无关。对参与经济交换的个人来说，提出“更多的橘子对我有好处吗？”或“更多的橘子对全体交易者有好处吗？”这些问题是很恰当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两种对比清晰的范式中，政治的位置在哪里？反契约主义—反立宪主义者关于政治事业的模型，更加类似于科学的模型。个人被视为致力于集体组织的合作性活动，目标是“发现”某种存在于他们自身的偏好或价值之外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存在的，“就在那里”，等着人们通过政治活动去发现它。“公共利益”是崇高的圣杯。发现它简直就和科学探索过程中发现真理一样。与此相反，对契约主义—

立宪主义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果要问：“在追求外在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候选人 A 是否优于候选人 B？”这种问题是不恰当的。相反，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应当问：“对我的私人利益最为有利的是候选人 A 还是候选人 B？”或者，可能更有道德感的恰当说法是，“根据我本人对问题做出的评估，候选人 A 还是候选人 B 对整个共同体的成员更有利？”

### 陪审团的例子

45

陪审团这一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两种不同政治观念的区别；这个案例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和第五节有关多数民主的讨论之间架起一个桥梁。陪审团成员的活动的类似于科学家的活动。陪审团制度的任务是确定某一命题之真伪，且这种真伪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陪审员的主观价值的。对 X 先生受到的犯罪指控，存在着两个互相排斥的判断：X 先生有罪，或者他无罪。但是陪审团的发现本身并不能解决事实问题。即使 X 先生被宣告无罪，他实际上仍然可能是有罪的；并且即使被判有罪，他实际上可能是无辜的。在陪审团成员的裁决和有罪或无罪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陪审团作为一种制度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一种工具，用于促进发现过程。如果作为一种制度它是有效率的，在社会需要做出裁决的条件下，这种制度可能是人们能做出有罪或无罪判断的最恰当方式。在运作过程中，陪审团可能利用成员之间的意见一致作为决定任何集体裁决的标准。个体的成员和科学家一样，也会表达自己有关某一命题正确或不正确的信念。

意见一致仅仅是有助于制度发挥功效的一个标准，所以，意见一致本身并没有从本质上证明一致同意规则或实际上其他任何决策规则是否恰当。公平地说，最好的规则应该是能够产生最接近于“真理”的结果的规则，此处“真理”定义为根本无法驳倒的命题集合。同样的道理，陪审团本身仅仅是一种制度化的手

段，用来形成或发现关于有罪—无罪命题的正确性的裁决之制度形式，所以也可以证明它是无效率的，可以被其他制度形式所取代。挑选陪审员的随机过程可以被证明还不如完全依靠“专家”的做法更为有效。或者说，在许多司法领域，做到与独立的可取的结果相一致，作为“专家”的单一法官也许是最有效的制度。

在反契约主义—反立宪主义的范式中，政治的整个过程和陪审团类似，仅仅关注寻找或发现“公共利益”，正如陪审团仅仅关心有罪或无罪的确定一样。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政治，其实跟科学一样。价值外在于参与者，意见一致只是用来确定这些价值的一件工具。<sup>[4]</sup>

#### 四、威权主义的命令式

把社会活动的互动过程概念化为“作为科学的政治”或“作为真理判断的政治”，不仅是威权主义的，而且是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字眼儿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轻蔑的表示。威权主义的规则直接从“公共利益”这一外在于个人的价值来源中产生。如果“公共利益”独立于个人的价值标准而存在，那么，因为关心个人自由而反对促进这种利益的任何观点都会变得自相矛盾。如果“公共利益”独立于个人的偏好而存在，并且如果这样的想法被广泛接受的话，就等于承认它优先于维护个人自由的规则（尽管它可能体现个人自由）。

“作为科学的政治”范式是反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把最终价值来源定位在个人的心理领域之外，而个人恰恰就是在自己的心理领域表达有效偏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有机的”或“有机体论的”范式，因为它把一种“利益”定义运用于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成员本身。然而，在这种定义中，无须粗暴地假定存在着一个有机体——比如“国家”或“社

会”。个人依旧可以被看作是意识的终极单位；无须假设有一个超人存在。不过，适用于共同体的“利益”定义依旧是超个人的，因为个人不能对其存在的独立性表示怀疑。这意味着，所有的人必须一致认为：只要能够发现这种“利益”，就应当正确地促进这种“利益”。

科学的类比仍有帮助。米切尔·波兰尼把科学共同体称为<sup>47</sup>“一个探索者的社会”。这种观点中隐含的假设是：每个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终极目标，即真理，并且对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仅仅由于他个人持有一种信念就要求人们尊重这一信念，显然是不正确的。虽然科学团体可以实际上被组织起来，但是它在履行发现真理这一得到公认的任务上可以有好有坏。不过，科学团体必须在其特定目标的限制下运行，这一目标就是获取真理。比如，以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实验室的效率，可能不如以分权方式组织起来的实验室，但是在所建模型中，前一个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仍然是在整体目标的限制下工作。因为是这样对他们建立模型的，即对他们行动自由的任何公然限制或约束，都必须被看作阻碍了其可能的探索方向。所以，把“宪政约束”强加于科学家的活动，以为他们在探索真理的活动中是一个整体，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威权主义的。

科学的类比也可以表明，反契约主义者为何怀着真正的恐惧和厌恶看待对政治威权行为施以宪法限制这种现代设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政治作为一种活动应受到约束的观点没有任何意义。倡导此类限制建议的人似乎是主动承担起了--项任务，他要预先判断整个程序是为何而建。对政府施加的宪政约束就像限制科学家进入特定研究领域的规则一样。对于从这种角度看待政治的人而言，宪政契约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基础。

我们把这一章的名称定为“仁慈的神话”，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范式的潜在含义。只要想想那些试图检验自己的存在理由的

社会科学家或社会哲学家，我们即可澄清这一范式的潜在含义。在这种知识环境中，学者不以任何特定的能力来建立自己的行为模型，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根本无法确认他自己的（或任何别人的）价值的作用。政治活动本身是由职业政治领袖从事的，他们的行为被描述成在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条件下，不带私利地追求“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这样的范式中，这些领袖既不是公民的代理，也不是公民利益或价值的代表。作为旁观者的学者几乎必须把自身的行为建模为一个与文保持一段距离的、不带私利的探求者，以便为那些更积极的参与者充当参谋或顾问。从几乎所有的方面来看，学者都更像是科学家，在科学家寻求“真理”的地方，他寻求的是“公益”。

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学者”，似乎对维克塞尔的指责无动于衷，他说他们“仿佛”在给一个仁慈的暴君提供建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理解这一指责。只有从契约主义或复杂交换的范式的某些视角建立政治模型，才有可能从一个过程中产生出各种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相互独立的个人利益和价值通过一套决策制度被多少整合在一起。与此相反，政治结果是由按照自己对“公益”的最佳判断来追求“公益”的人所选择的。这里不存在对分立的利益的潜在让步或调整的问题。那些不同意“公益”定义的人是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可以通过政治的花言巧语使他们“看到光明”。在这种背景下，单个的学者能够让自己承担的惟一角色，就是不带私利的“公益”追求者，并自认为比普通公民更加见多识广。

如果科学家—哲学家把自己看作君主的顾问，不论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他一定会反对任何对政府权威增加限制的宪法改革的建议，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一定会支持所有放宽现有限制的建议。任何对政治权威的明显限制，都干涉了学者的选择自由。在对政治“公益”的理想化追求中，学者—科学家需要畅

游于潜在可能的广阔空间。可能性集合必须具有与可观察到的环境参数所允许的程度相一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 五、非契约主义范式中多数主义民主

我们已经指出，本章所讨论的非契约主义的立场是威权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把它归入非民主立场的行列，因为那些最强烈的反对宪政改革的人们也大声倡导“民主”，特别是多数主义的民主。把政治比拟为科学的范式，似乎会提出支持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的论证。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中采取的多数投票表决规则，大概是这种民主制度的最佳体现，然而捍卫这种制度的根据完全不同于从契约主义范式推导出来的根据。<sup>49</sup>

民主的选举机制被看作是产生集体性结果的制度结构，完全类似于在一致同意或严格的多数票规则下运作的陪审团制度。这种民主机制得到支持，是因为据说它在发现“公共利益”方面的有效性。当然，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也承认民主的选举过程，包括相对和绝对多数投票表决的规则，如果按照一些理想的标准来评价的话，总体上看似乎并不完美。不过，对民主的言之成理的捍卫，只要求这些制度比人们建议的另一些制度较为完美就可以了。

在这一背景下，历史记载已经可靠地告诉我们，采用多数原则的民主确实可以找到顽强的捍卫者。然而，按照分量来排序的话，这种非契约主义视角下的民主制度的理性基础，显然要比契约主义视角的基础薄弱得多。民主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取决于它在产生独立存在的“公共利益”方面的成就。整个辩护必须建立在效率基础上。在退而求其次的论证中，采用非契约主义范式的民主支持者承认，虽然多数原则不尽完美，但它优于其他制



度，因为“公共利益”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而且，这些支持者肯定会说，当“公共利益”被非常清楚地描述出来时，比如在战争这类突发情况下，在达成集体决策方面不民主的方式会更有效率。

与非契约主义视角下的民主辩护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契约主义对民主制度的辩护来自宪政理论，它是以这种制度有助于个人价值表达的能力为基础的。这些制度没有被理解为用于“发现公共利益”，即使从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上，对于是否存在这种“公共利益”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既然在评价制度效率方面根本不存在外部标准，那么任何评价标准就必须被直接应用到制度过程本身。在这种视角下，宪政民主——在特定环境下也会体现为  
50 多数投票表决规则——就与其他任何政府—政治权威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对非契约主义而言，在多数主义民主和世袭君主制之间不可能有根本区别。它们不过是用来发现“公共利益”的不同政治形式；多数民主之所以比世袭君主制更受人青睐，仅仅是因为它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更有效率而已。

如果存在着一种先人之见，认为多数表决规则在产生“公共利益”方面比其他任何政治权威形式（例如世袭君主制、贵族统治、寡头统治、单一政党的委员会统治或某个军事集团的统治）更有效率，那么对“多数意愿”的任何宪政约束都有可能受到反对。这一反对不必以“多数的观点总是正确”的主张作为根据；它只是主张，较之形成集体决策的其他任何工具，多数表决正确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多数意志的落实施加宪政约束，肯定意味着某个时期的某个多数能够声称它的智慧优于随后时期的某个多数。在非契约主义的论证框架内，这种说法缺乏合理的根据。因此，必须允许多数实现其自身的意愿。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告知政治领袖和公民“公共利益”的含义。

## 六、政治目标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便阐述了非契约主义—非立宪主义者的政治视角，该视角和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立场正好相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不断发现把它同我们自身的立场进行对比和比较是有益的。我们这一节的目的是把两种不同范式的对比和比较，拓展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分析的核心是最终状态或结果的评价标准的应用与过程或规则的评价标准的应用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把这一讨论同哲学家对结果至上论和非结果至上论的论证或目的论与非本体论的论证的常见区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讨论将表明，根据这些范畴来阐明契约主义—立宪主义立场是相对容易<sup>51</sup>的，而要阐明非契约主义的立场就困难得多。

契约主义—立宪主义的立场几乎必然是非结果至上论者和非本体论的。评价标准需要应用到规则或过程上而不是最终状态或结果上，至少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是如此。因此，不存在对任何最终状态做出评价的手段，因为没有“评价”最终状态的外部标准或尺度。最终状态只能在其产生过程中加以评价。在一个过程中所出现的东就是那个东西本身，此外再无他物。如果这个过程看上去允许个人适当地、无偏见地表达自己的价值，无论它们是怎样形成的或受到了什么影响，那就必须认为其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交易之后苹果和橘子在两个交易者之间的具体分布状况，**不具备**评价的意义。）这种过程取向的评价无须排除在过程的结果和评价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在特定过程或规则下形成的结果格局，也可能导致这个过程本身不可接受。

不过，根据这种范式，政治本身没有目标或目的。广义的政治就是一个复杂的制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表达他们赋予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选择的价值。尽管政治体中的个人可能追求某些

共享目标，但“全民目标”这种说法有着内在的矛盾。

如上所言，就本章所介绍的非契约主义立场而言，很难把它归入某个熟悉的哲学名目之下。不过，“作为科学的政治”这一比喻还是有帮助的。按这种范式，政治是结果至上论和目的论的，其含义就像这些论证范畴适用于科学一样。政治活动本身仍然是非结果至上论和非本体论的，因为不存在参与者了解并一起努力实现的预定目标。像科学一样，政治被视为一个旨在找到“公共利益”的发现过程。这种最终状态，这种利益，无法从寻找活动本身之外得知。但是从一个至关重要的意义上说，整个论证是目的论的。科学或政治中的发现活动是在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假设下进行的，这个假设就是：它所探求的东西独立于个人对这种追求的价值表达而存在。换句话说，参与者会一致同意：一旦找到了终极目标，所有的努力将用于实现该目标。政治变成了对“公共利益”圣杯的无止境的追求。确定这种“公益”的不是参与实际寻找的个人的价值。这些人是在寻找他们的身外之物。

#### 注释：

- [1] 本章中某些讨论的先期研究包含在以下文章中：James M. Buchanan, "Politics and Science" (布坎南：“政治与科学”), *Ethics* 77, (July 1967): 303—10. Reprinted in James M. Buchanan,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4—80. 近期的相关讨论参见 James M. Buchanan, "Sources of Opposition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 (布坎南：“反对宪政改革的根源”), i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taining the Economic Powers of Government*, ed. Richard McKenzi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4., pp. 21—34.
- [2] P. H. 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维克斯特德：“政治经济学的常识”), London: Macmillan, 1910.

- [3] 这是一本合著的书，但是任何两个作者都一定不会同意在特定问题上一直讨论下去。就我们而言，我们应当承认第二节的讨论和本章的相关讨论是这种类型的。讨论中的攻击性评论出自布坎南。布伦南和一些读过早期手稿的读者一样，已经表达了对契约主义立场几乎否定客观价值存在这一观点的疑虑。有人建议，应当讨论客观价值存在的作用，以及建议客观价值应当包括个人自由。在政治领域，持这种建议观点的人可能会认为：在通过政治活动表达个人意愿的最初起源的研究中，契约主义只要求个人的平等。因此，这一立场根本不需要考虑客观价值标准存在与否所带来的影响。
- [4]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能说明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或合法。市场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发展出来，它并不要求市场参与者按照发现科学真理的方式行事。生物科学也没有必要假定有机体在“从事科学”工作。

## 用于立宪主义分析 的个人模型

### 一、导 论

对不同规则对社会互动的结果格局的作用之分析，必然包含着有关参与互动者的预设。我们这一章的目的是提出我们自己的预设，并为其做出辩护。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有关个人的基本模型，最适合于制度和宪政的比较分析——最适合于对各种备选规则体系的内在含义的研究——它基本上就是古典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预设。过去的经验向我们显示，一种广泛的看法（甚至在经济学专业内部）是，这种模型的运用，尤其是在通常的市场背景之外的运用，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最易于遭到反对的特点之一。我们打算、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讨论局限于不同的市场秩序中的行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非市场制度中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过程中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对“经济人”模型运用于非市场背景这种做法的普遍反感，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反对意见。

这种反感无疑是存在的。例如，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我们  
54 试图提出一种有关授予政治代理人的财政<sup>[1]</sup>和货币权力<sup>[2]</sup>理论，我们为这些代理人建立的模型，与经济学家为市场背景下的人建立的模型完全一样。这些研究的目的是要检验现行政治制度下政

治代理人受到的约束的有效性，并把这些约束与另一些结构中具有可行性的约束加以比较。我们部分地评价了这样的问题：要想获得公民尚可容忍的结果，除了多数原则下选举竞争的约束之外，是否还需要采用另一些约束。

不难想见，这项工作得到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对于把“经济人”模型运用于政治背景下的人类行为，无疑存在着广泛的怀疑。例如，在一篇特别尖锐的评论中，我们对人类动机的“嘲讽”态度被说成是有着“法西斯主义”的含义。<sup>[3]</sup>在提交给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评论中，大名鼎鼎如萨缪尔森者，也对“这帮芝加哥小子”和限制征收的整个运动发出了类似的责难。<sup>[4]</sup>

所以我们既有个人兴趣，也有专业兴趣，对有关人类动机的“经济人”假设至少在评价不同社会规则这一背景中的合法性予以肯定。<sup>[5]</sup>但是从更一般的角度看，我们的经历不过是强化了如下假说的证据：许多社会分析家对于“公共利益”或“仁慈专制者”的政府（或承担政府角色的代理人）模型，都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对公共利益模型的偏爱（常常是不明言的），并不是出于经验的、理智的或意识形态的根据，而是出于纯粹分析上的方便。公共利益模型使分析家能够进行规范的政策评估，不必关注政策的实施。根据某种伦理标准判断一个社会后果“不令人满意”，几乎就是明确地认为应改变这一结果。完成这一变革的方式，不是一个需要在纯伦理的层面十分严肃予以考虑的问题，然而它的意思似乎是，既然这是个“社会”问题，那么“社会”应当采取行动。此外，既然严格说来社会“行动”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用代理人即政府取代社会似乎顺理成章。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政府事实上会按照规范的建议行事这一未明言的预设，似乎无关紧要。有别于“私人伦理”的“社会伦理”的意思似乎是，政府一定或应当能够像分析家建议的那样采取行

动，一旦理解了这种建议的道德力量，政府就会如此采取行动。当然，分析家可以回答说，他的阐述中不包含这层意思。他可以把自己的任务理解为仅限于具体说明哪种政治选择“好”，哪种政策选择“坏”；对于他来说，这种隐含的政府和政治模型只是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方便而已。他会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说，对政策选择的评价是一种有用的演练，它完全不同于给政治行为明确建立模型的努力。也许如此；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说，可以用同样的论证去支持那些有关未被发现的资源领域和潜在能力的想象。我们认为，即使仅仅为了对分析家认为相关的政策选择进行评估的方便而提出的仁慈专制者政治和政府模型，在社会科学以及更为一般的社会哲学中，还是造成并维护着严重的混乱。

我们打算为了任何类似的分析上的方便而采用“经济人”模型。我们也不是只想打破处在一个极端的这种模型和处在另一极端的仁慈专制者模型之间的平衡。我们采用“经济人”，是因为我们坚信，对于宪政分析来说这种模型最为适当。这一章的以下各节，将讨论宪政背景下经济人建构的不同辩护路线。

56

## 二、政治中的经济人：对称性论证

根据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同一个人类行为模型，似乎应当适用于不同的制度或不同的规则体系。凡是打算在不同制度背景中采用不同行为假设的人，大概必须承担最初的举证责任。比方说，如果在经济（市场）和政治背景中采用不同的人类行为模型，似乎没有办法区分改变制度的效果与改变行为假设的效果。因此，坚持基本的行为模型对于各种制度保持不变，不过是在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时采用一种“其他条件不变”的技巧。

假定市场背景下的个人，运用他所拥有的能力（在市场规则的限制下）最大化自己的财富，那么也必须假设，在相应的

政治背景下，个人也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政治规则的限制下）。如果政治行动者没有用类似于市场行动者的方式运用自由裁量权，那就必须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政治博弈规则约束权力运用的方式不同于市场规则的方式，也就是说，两种背景下的约束是不可比的。不然的话就是在分析或观察中肯定存在着错误。如果各种制度的行为模型不变，那么从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

当然，这一推理并不排除不同制度背景下有不同的实际行为的可能性。但是它确实排除采用行为差别作为分析性的假设。如果行为差别可归因于规则的不同，那么肯定能够用某种方式把规则同它们所产生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而不必借助于分立的基本行为模型，后者只能使任何制度比较的尝试一无所获。

我们打算像经济学家普遍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从个人行动者所面对的在不同行为过程中做出的选择这一角度，去分析行为。这里的概念工具涉及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在机会组合和偏好之间——的严格区分。在对结果做出“解释”时，参照相关选择的价格或成本（以及这些价格的变化），而不是行动者的偏好。经济学家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与解释行为差别惟一相关的制度差别，是不同选择的价格差别。制度变化所造成的纯粹的偏好差别（即无法最终回溯到相关的价格差别的差别），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解释能力。<sup>[6]</sup>

把偏好的变化与制度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analysis 路径，危险地接近于利用与前面提到的模型完全不同的模型，而且有可能同这种模型难以区分。这一路径也许认为，个人扮演着具有制度依赖性的角色，例如在政治领域，人们扮演的角色是“政治家”，而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是“占有性的追逐利润者”。我们完全没有顾及这种路径以及对它做出阐述的文献，我们在这样做时承认，我们是在限制自己的讨论和对话范围。但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为支持行为对称性而提出的分析预设，似乎相当强大，因此只能把举证责任交给那些提出制度依赖的行为模型的人。

对称论也许是很基本的、不言自明的，但是接受这一论证只能使我们在把“经济人”运用于政治的道路上走完半程，至少对于那些在他们对市场的分析中仍满足于这种行为模型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如此。当然，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对称论完全没有断定“经济人”就是人类行为的适当模型。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行为模型。对称论仅仅主张，不管采用什么模型，这个模型必须适用于所有制度。这种论证坚持认为，把“经济人”局限于市场行为领域，在非市场背景下采用大不相同的模型，对这种行为变化的根源却不做任何言之成理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

### 三、科学和经验主义的辩护

对“经济人”模型的运用需要更为专门的辩护。最自然、大概也是最常见的论证是，人们确实像该模型所说的那样行动，至少平均起来看大体如此。当然，必须允许它具有适当的抽象程度，这是采用任何普适性模型所必需的，所以也必须允许违反这种行为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存在。但是一旦做出这种允许，我们的论点便是，“经济人”提供了一个较之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模型更好的基本模型。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很有可能持这种立场，对它的最为清晰的辩护来自现代芝加哥学派。<sup>[7]</sup>

这一立场难以拒绝，原因有二。首先，只要坚持把“经济人”与另一些抽象程度和普适性相当的行为模型做一比较，许多引起争论的基础就会烟消云散。从心理学上看更为丰富的各种行为模型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潜在的严格检验。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经济人”并没有清晰的定义，打算对它进行批评的人，可能发现自己的猎物消失了，然后又披着

另一种伪装出现。例如，如果把“经济人”具体定义为单纯的财富最大化者，有可能无法解释许多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各种观察可能没有明确的界线，因为该模型的捍卫者可以诉诸于选择者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内容的改变。换言之，“经济人”的捍卫者通过宣布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偏好结构而不是其内容，即可避开对其偏好内容的批评。

我们将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表明，我们对“经济人”模型的捍卫，基本上是站在方法论而非经验的立场上。不过这种方法论的捍卫需要一些经验预设，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到十分具体。我们仅仅要求需求曲线下降，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可以分辨出个人赋予其价值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的经验预设参照的是个人效用函数中的特殊论证，但不涉及对这些论证之间的权衡。此外，我们要求个人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什么，它不同于别人的利益。<sup>59</sup>

与我们有着不同目的的经济学家，打算提出一种实证的一有预测力的“行为科学”，无论其背景是市场还是政治，对于他们来说，该模型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各种研究结果证明，作为一种无所不适的解释模型的“经济人”已经陷入一些明显的困境。分析家很难解释这样一些行为：如人数巨大的选民中的个人投票者的行为，维护集体的志愿者行为以及自愿交纳所得税的行为。幸运的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无需讨论这种无所不包意义上的“经济人”模型用途的可能的检验标准。

理由是，对于我们的宪政主义论证来说，只把“经济人”建构作为一个“有用的虚构”即可，它基本上把这个模型中的个人有多大的“虚构”程度这一问题放在了一边。我们确实提出了更为强大的论证，“经济人”模型对于比较制度分析和最终的宪法设计有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这里的论证是方法论的和分析的，而不是经验的。

#### 四、对不同利益的行为模型的方法论捍卫

我们的方法论框架的核心预设是，个人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类比，即可证明这一预设与我们的宪政主义分析有着怎样的相关性。

假设 *A* 想让另一个人 *B* 去做一件 *A* 希望有人来完成的事情，而做这件事需要花钱。例如，*B* 可能承包为 *A* 盖一所房子。*B*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任何行为，都会给 *A* 造成可能相当可观的成本。因此，*A* 要限制这种可能的毁约行为的范围，即使他认为 *B* 不履约的可能性很低，他还是会这样做。在这个例子中，*A* 在与 *B* 签约前，首先会调查不同建筑商的信誉，假如他发现不履约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有可能根本不与 *B* 签约。

- 60 尽管有这些接受 *B* 的门槛，一旦取得一致，*A* 可以雇一个律师拟定一份合同。出于合同本身的目的，*A* 会做出操作性的假设，*B* 是个坏蛋，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欺骗自己。他做出这一假设，是因为这是正式合同的设计中包括的偶然因素。换言之，拟定合同这种做法的性质，导致 *A* 做出有关 *B* 的动机的假设，*A* 可能认为它并没有反映多少经验现实。

这里没有谈论拟定正式合同是否合理。这种决定取决于该做法的相对成本。但是这一论证确实表明，要想让合同得到履行，赋予相关各方以不同的自利（经济人）动机，是该做法的一部分。合同本身的理由在于，它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把 *B* 的私利变得与 *A* 的私利相一致。这种预防性措施的焦点，必须是 *B* 的不同的和分立的利益。

注意，为了给这种做法辩护，我们不必宣称规范性定义的私利是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或主导动机。只要我们承认不同的、可分辨的私利与人类行为有关，那么不同制度的比较首先必须注意

的，就是个人追求他们各自明确的利益时这些制度起着什么作用的问题。假如互动的主体之间没有冲突，也就是说，假如不存在可以分辨的不同利益，当然就不必在乎不同的规则体系会使这种冲突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否认人们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利益，等于陷入了荒谬的幻想。个人的目标各不相同；存在着冲突，对不同制度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找出解决冲突的某种标准。在所有这些有意义的研究中，为了强调整个分析的核心目标，我们仅仅需要假定行动者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在这样做时，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分析显微镜做了调整，把它聚焦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上。

例如，我们在评价理想化的市场秩序的性质时，可以接受亚当·斯密的观点：消费者不必让自己晚餐中的肉食依靠屠户的善心，但至少不必排除这种善心的存在。屠户对自己的消费者可能仁慈，也可能不仁慈。关键在于不必存在这种仁慈，因此它是否存在无关紧要。更一般地说，假如我们评估特定的规则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把人类行动者的私利转化为促进他人利益的行为，我们自然会假设这些人是完全自私的，即使从经验上说他们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发现制度性规则怎样把冲突变为合作，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在这些规则中合作的人有着合作的天性。这种做法等于取消了整个问题。

因此，在对不同制度的评价中，“经济人”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独特而恰当的漫画式描述，这不是因为它在经验上正确，而是因为它在分析上是恰当的。在评价整个契约或宪法的重要性时，会出现经验正确的问题。私利确实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假如个人天性上倾向于只在自己行为中的少数次要的事情上关心别人，那么对引导自利促进普遍利益的制度偏好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而另一种制度评价的可能标准就变得比较重要了。因此，从根本上说，经验问题决定着整个宪政主义阐述的意义。但是宪政主义的分析方法属于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按照已经指出的门槛方

式，在我们对分析方法问题的讨论中，不会出现经验的考虑。

## 五、社会评价和准风险厌恶

首先我们要对第四节所采用的题目做一些多少有所不同的思考。对于“经济人”在产生有关不同规则体系的选择的规范性结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大概尚未提供完全确定的证据。具体说来，我们没有讨论如下基本事实的含义：有着更大限制性的规则，不仅有助于防止灾难的发生，而且经常有可能排除那些旨在促进可欲结果的行为。

考虑一个 80 年代初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在美国宪法中增加“平衡预算修正案”的建议。我们能够运用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模型，分析现行政治制度<sup>[8]</sup>中的约束的作用。对于选举竞争给政治代理人或集团创造赤字的嗜好施加的现有约束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出某些预测。然后我们可以问，采用强制性的预算约束，会使这些代理人的行为发生何种变化。不过，任何全面的分析也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平衡预算的规则生效，有时会限制意图良好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使他们无法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我们不想参与有关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系统干预从理论上说能否发挥稳定性作用的争论。）至少从观察政治的一种视角来说，政府对不可预见的环境的反应之灵活性的任何减少，都涉及必须予以重视的潜在成本。

显然，政治代理人的中立的和有长远眼光的行为水平，同不同规则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比较是有关的。与仁慈模型相比，自利或“经济人”模型授予政治代理人较少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个角度说，“经济人”模型不是天真幼稚的，它必须正视它的经验相关性主张。

但是，甚至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单纯的经验记录也有很大的

误导作用，尤其是用严格的预测方式来解释这些记录的话。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追求某种符合“最佳”预测——它或者是从技术上指观察到的数值中变量的最小化，或者是指观察到的适当行为的某种平均值具有启发意义——的人类行为模型，然后在第二<sup>63</sup>阶段根据这种“最适当的”模型对各种制度进行比较，那么其结果将会系统地偏向于不充分约束的方向。由于这些原因，“经济人”模型可以得到辩护，尽管与简单的举证证明相比，它对人类的行为模式做了更加嘲讽式的描述。换言之，假如我们沿着一个理论上从“最差”到“最佳”的序列来为行为模型定位，适合于对各种社会安排进行比较的模型，与对行为的简单“平均”描述相比，更接近于最差的一极。

这里的推理是，在对各种制度选择的评价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特点，它赋予评价者某种厌恶风险的态度。我们应当强调，我们并没有假设每个公民，无论是处在无知之幕之中，还是置身于社会，有着通常意义上的固有的风险厌恶。对于我们这里的论证来说，我们可以把个人视为对风险持严格的中立立场。是特殊的选择背景使个人在采取行动时仿佛有着厌恶风险的特点——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标题中“准风险厌恶”这个字眼的用意。

我们的主张是，由于评价对象的性质使然，从脱离模型的行为中获得的“改进”的收益，少于方向相反的行为背离——也就是说，转向比模型本身所描述的行为更差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从最佳最差序列的角度来表达这一论证，随着我们从最佳的一端移向最差的一端，预期社会损失（成本）会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一个行为比共同体中普通人“更差”的人，给他的同胞造成的损害，要大于行为比普通人“更好”的人所带来的收益。因此，普通人模型低估了平均损害。在想象有可能从不同规则体系中产生的各种状态时（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做出选择之前的过程），公民将像他们似乎厌恶风险那样采取行为。这里

将存在着避免最坏前景的偏向。

维护这一主张，除了基本的经济分析工具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首先，我们只需假设，规则体系具有工具价值，也就是说，期待着它们有利于提供可以被抽象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认为，这些产品和服务多少是可以被量化的。其次，我们假设产品和服务不是无成本的；政治和经济体是在整体匮乏的约束下运行。最后，我们假设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是呈下降态势的。

### 1. 垄断的例子

我们将利用一个扩展的事例来解释这一论证，然后可以把其结论普遍化，使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制度比较。这个例子涉及竞争和垄断的比较。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公式表明，在必须得到满足的特定技术条件下，当存在着完全自由的进入时，即会出现有效的资源利用。在这种产业均衡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开发的交易收益。这一竞争模型不明言地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净财富最大化者。把这一行为假设扩展到同一产业的（非歧视性的）垄断组织中，分析证明，有效的资源利用并不是均衡结果的特点。与理想的结果相比，将会存在限制进入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存在着未被开发的交易收益。

但是，这些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对垄断者行为的假设。在教科书的模型中，垄断者被当作净财富最大化者，但是先验地看，其他可能性有着同样的合理性。垄断者出于各种理由，有可能约束自己，不去制定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打消其他公司在纯惯性作用下进入的念头；或是为了促进它所理解的“公共利益”。

如果目的是提出一种垄断行为理论，用来预测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的定价和产出战略，那么利用经验记录似乎是完全恰当的。我们能够从这种记录中为简单垄断者推导出一个最大化目标，它可以提供对价格—产出行为的预测，这个最大化目标既包

含着自变量私人利益，也包含着自变量公共利益，它们都有着经验的相关性。我们的观点是，这种预测模型一般而言不适合于评估垄断组织造成的福利损失。

65

为简单起见，假设所有的垄断者分为两类。全部垄断者中有一半是教科书中所说的严格的利润最大化者；另一半是纯粹的“公共利益”型公司，它们把价格和产出定在充分竞争所导致的水平上。在这一背景下（并做出线性需求曲线的假设），最佳的惟一模型是，价格定在利润最大化价格——设为  $P^*$ ——和竞争价格——设为  $P_c$ ——的中间。假如产品是在垄断条件下、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提供的，并且在每个地方的需求曲线如图 4.1 中的  $D$ ，那么对任何地方的价格的惟一最佳预测是  $P_e = 1/2 (P^* + P_c)$ ，相应的产出是  $q_e$ 。

假如现在用这个最适当的垄断行为模型来评估垄断组织的总体福利损失，我们就要评估图 4.1 的  $ABC$  区域内每个地点上的福利损失，总福利损失是  $n$  个地点的加总数。然后用这一总量来计算为获得有效结果的保障而要求所有的人（消费者和垄断者）支付的额外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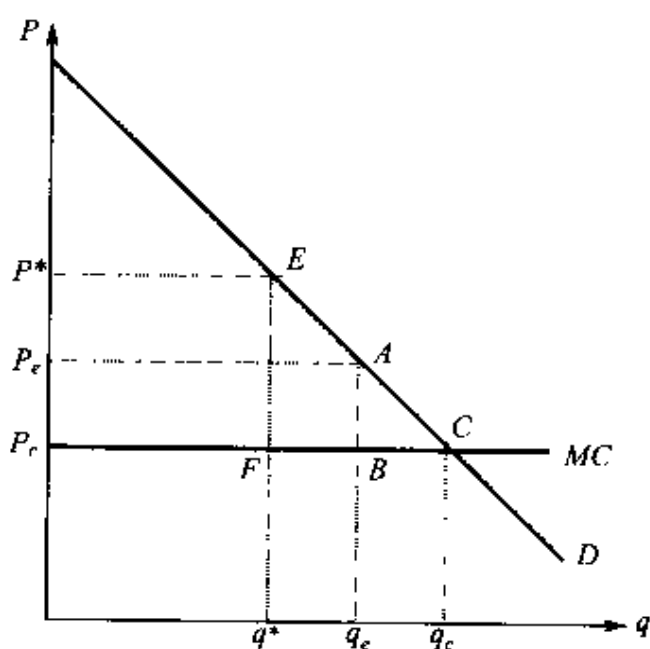


图 4.1

然而，这种分析根本就是错误的。 $ABC$  区域并

没有为垄断型组织的每个地方的福利损失提供最佳计算。可归因 66 于垄断的每个地方的预期损失，是利润最大化模型中的损失的一半加上公共利益行为模型中的损失（根据这里的假设，它是零）



的一半。换言之，每个位置的预期福利损失是大于  $ABC$  区的  $CEF$  区（见图4.1）的一半。

我们如果把福利损失作为相关区间内的产出函数加以计算，便可得出图4.2。曲线  $W$  表示福利损失与产出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图4.1的三角计算上。我们采用大体上通行的方程<sup>[9]</sup>  $W = (1/2 dp/dq)(q - q_c)^2$ 。关键的一点是， $W$  是实际产出和理想产出之差的“凸函数”。这意味着在最适当产出水平  $q_c$  上的福利损失，即图4.2中的  $W(q_c)$ ，明显低于最适当的福利损失，即  $1/2 [W(q^*) + W(q_c)]$ 。也就是说，垄断的预期成本大于同预期垄断行为有关的成本，因为利润最大化者造成了比例更大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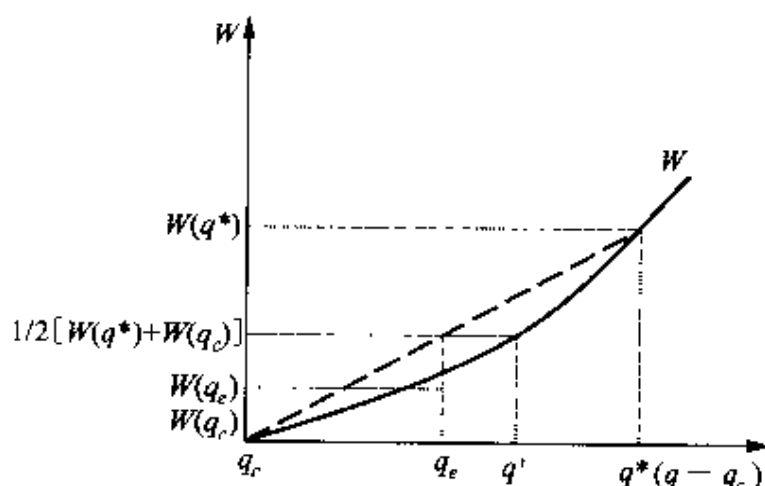


图 4.2

当然有一种单一的垄断行为模型可以提供对垄断成本的适当评估——即导致图4.2中的  $q'$  成为平均垄断产出选择的模型。我们这里的基本观点是，与对垄断行为的单纯经验检验所给出的提示相比，这种垄断行为模型更具有系统的嘲讽性（即更接近于序列中最差的一端）。因此，合理地接近于利润最大化垄断的简单教科书模型的某种东西是有道理的，尽管至少有些垄断者的行为更符合“公共利益”，假如模型的目的是为对不同制度形态的

规范评价提供一个基础的话。

## 2. 一般性案例

这里的要点比垄断的例子更具普遍性。社会分析中采用的行为模型，经常通过诉诸“事实”进行评价。似乎很清楚，在许多分析家看来，这些从简单的观察中、从有关他们自己的政策角色的内省中、或是更为自觉地从参考历史记录中提炼出来的“事实”，显示出在特定制度下掌握着自由裁量权的人，经常受到内在道德考虑的约束，不以自私的方式采取行动。姑且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然而，从可观察的行为模式的简单“平均数”推导出来的任何行为模型，对于比较制度分析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恰当的行为模型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由那些较理论上的平均状态更坏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从比例上说要大于较之平均状态“更好”的人类行为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向行为序列中更坏的一端倾斜是完全有道理的。具体说来，可以把“经济人”作为一个用于比较制度分析的模型，即使经验记录（无论对它做出何种描述）显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共利益动机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预先假设，对政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评价，不是根据它们本身，而是根据它们产生可欲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力。如果接受这一分析框架，那么自然就要在立宪阶段把个人抽象化为：他在做出可能的制度安排决定时采取的方式，类似于在垄断形式和竞争性市场形式之间做出的选择。在宪政分析中采用“经济人”的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分析的而不是经验的理由对这种运<sup>68</sup>用的辩护，是我们从进行制度分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那儿借来的手段。在这个方面，我们最好的做法大概莫过于引用休谟的话：“在限制任何统治体系、确定宪政的约束和控制手段时，当把人人设想为恶棍，其行为除私利外概无其他目的。”<sup>[10]</sup>

## 六、政治中的格雷欣定律

我们为捍卫“经济人”模型而提出的最后论证，至少像霍布斯一样古老。它反映着这样的观念：当许多人参与社会互动时，一个坏人追求狭隘的私利，会诱使大家都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仅仅是为了防范坏人伤害他们而已。正如霍布斯所说：“虽然恶人在数量上少于正派人，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区分他们，于是便有怀疑、提防、抑制和自卫的必要性，即使这偶尔会针对最诚实最公正的人。”<sup>[11]</sup>

在这里，可以把霍布斯的话解释成一种厌恶风险的论证，它类似于前一节阐述的观点。不过，也可以解释为它主张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社会互动中的格雷欣定律，即恶行驱逐善行，所有人都会因为极少数追逐私利者的存在，而让自己采取追求私利的行为。<sup>[12]</sup>

建构相关分析的方式之一，是遵循加利·贝克的利他主义理论的对立面。<sup>[13]</sup>在贝克的理论中，假如有个人 *A* 仁慈地对待另一个人 *B*，于是 *B* 有机会采取某种反过来对 *A* 有利的行动（以很小的成本），这可诱使 *B* 出于私利而采取这种行动。比方说，假设 *A* 把自己在边际上得到每 1 美元的四分之一送给 *B*。进一步  
 69 假设，*B* 能够以 1 美元的成本，采取能让 *A* 获得 4 美元以上收益的某种行动（或阻止 *A* 受到 4 美元以上的损失）。这时 *B* 就会理性地采取这一行动，保证 *A* 能够得到这一收益：*A* 最初对 *B* 的利他主义激励了 *B* 对他的利他主义，尽管 *B* 事实上根本不关心 *A*。就更大的社会群体而言，这一论证表明利他主义者组成的群体，有可能倾向于建立一个明显的利他主义社会，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互利的非交易行为所造成的相互收益的社会。

假设在这个社会里，利他主义者的人数下降，或贝克尔模型

的有效性所必需的直接互利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时，非利他主义者采取利他主义行为的激励因素有可能迅速消失；预期的互利关系不复存在。面对立宪选择的理性人，有可能愿意选择那些尽量不依靠利他主义行为的制度，以便防止有可能出现的对互利关系的任何侵蚀。

因此，可以使霍布斯的论证与贝克尔的社会互动论保持一致。不过，一种较为直接的解释也许更为重要。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与贝克尔分析的案例截然相反的情形，某人  $M$  以损害他人  $N$  为乐。假设  $M$  以 1 美元的成本，给  $N$  造成价值 1 美元的损害， $M$  用自己收入的五分之一来玩这种故意害人的勾当。进一步假设， $N$  丝毫也不关心  $M$ 。但是，假如  $N$  能够采取行动使  $M$  减少 1 美元收入，他便避免了价值 20 美分的损害。因此， $N$  将会伤害  $M$ ，尽管他对  $M$  完全不感兴趣。也就是说， $M$  的伤害具有蔓延性。此外，就像霍布斯所表明的，假如  $M$  在共同体中的存在是无法事前发现的， $N$  有可能对每个人都部分地怀着恶意采取行动，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  $M$ ，至少这种行为的成本并不很高的话。

考虑一个更为合理的情形：共同体中的一些人有着适度的利他主义，另一些人真正自私。假设个人是被某种互动关系，即矩阵 4.1 所描述的囚徒困境联系在一起。（第一章讨论过这种类型的矩阵）在这个案例中，矩阵方格中的数字表示博弈者得到的货币回报（按美元计算）。如果每个游戏者的行动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货币报酬，就会出现社会性的灾难后果。

矩阵 4.1 描述的这种博弈的突出特点是，当一个游戏者选择策略 1 时，另一个游戏者从选择策略 2 中得到的收益非常少。注意，假如  $B$  玩  $b_1$ ， $A$  通过玩  $a_2$  得到的增值收益只有 1 美元，而假如  $B$  玩  $b_2$ ， $A$  通过玩  $a_2$  的收益是 20 美元。现在假设， $A$  其实是个适度的利他主义者，从  $B$  的报酬收入中得到一定的数值，

比如说 1 美元中的 10 美分。这种利他主义不足以诱使  $A$  向  $B$  直接转移支付，因为这种转移支付使  $B$  每得到 1 美元收入  $A$  就要承担 1 美元的成本。但是，假如“交易条款”受到某些限制的话， $A$  完全有可能约束自己不通过损害  $B$  使自己得到一定收益。如果我们从等价效用的角度来描述矩阵 4.1 中  $A$  得到的报酬，而不是把它描述为货币报酬，那么在适度的利他主义的假设下，我们得到矩阵 4.2。注意，在这种背景下， $A$  没有超优策略。他偏好的策略现在取决于  $B$  的预期行为。如果  $A$  知道  $B$  是与他平等的利他主义者， $A$  就会玩  $a_1$ ，他相信  $B$  的反应会是玩  $b_1$ 。另一方面，假如  $A$  知道  $B$  是个狭隘的私利最大化者，他也会像狭隘的最大化者那样参与游戏。在这种博弈中，只有当  $A$  相信  $B$  也是适度的利他主义者时， $A$  的适度的利他主义才有行为意义；不然就会像前面一样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B 的选择	
A 的选择		$b_1$	$b_2$
$a_1$		[4, 4]	[-20, 5]
$a_2$		[5, -20]	[0, 0]

矩阵 4.1

		B 的选择	
A 的选择		$b_1$	$b_2$
$a_1$		[4, 4]	[-19.5, 5]
$a_2$		[3, -20]	[0, 0]

矩阵 4.2

- 71 我们再回到霍布斯的那段话上，假设  $A$  确实不知道  $B$  是不是一个最大化者。在这种情况下， $A$  需要做出这样的预期，他在囚徒困境这一背景中遇到的不同的  $B$ ，有 90% 会采取对等的行动以便让  $A$  玩  $a_1$ 。利他主义者要有一个最起码的数量，低于这个数量，所有的人都像纯粹自私自利的人一样采取行动，这仅仅是

为了防止在游戏中防止狭隘的金钱最大化者的前景。于是，即使“好人”多于“坏人”，所有的人都会“不以好人的方式”采取行动，预期结果由此产生。

如果我们建立多人模型，则这一结论会得到加强。假如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处在有许多人参与的囚徒困境之中——这里不像上面的例子中那样只有一个 *B*，而是有许多 *B*——那么他必须做出有关另一些人的互动行为的预测。例如，假设 *A*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 10 个 *B*。可以预期，大多数 *B* 会采取互利行动，作为对 *A* 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回应，可是只要这一群 *B* 中有一个人不这样做，来自 *A* 的这种行为方式的收益就会消失。

尤其是在多人互动中，会出现另外一个因素，它有可能阻碍自愿的利他主义对社会结果发挥很大的行为影响。考虑一下刚才讨论的背景，即只有一个 *A* 面对 10 个 *B*。假设 *A* 继续在各种限制下采取利他主义行为，尽管他预测到至少有一个 *B* 会利用这种情况谋取差额收益。另一些 *B* 最初会对 *A* 的善意姿态做出对等反应。可是，当这些 *B* 看到那个惟一的背叛者有望得到不同的高收益时，他们内在的不公平感觉会诱使他们不对 *A* 采取互利行为。“拿到我那一份”这句话所反映的公平的性质，可能成为阻止尊重他人的行为扩展的力量。<sup>72</sup>

总之，霍布斯的分析的精神本质是，虽然利他主义和公共精神的动机可能普遍存在于人口之中，它们是令人赏心悦目的鲜花，但是，让它们绽放的必要条件却是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它使社会秩序基本上不必依靠这些花朵的效用。就此而言，霍布斯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在设计制度时应当把“经济人”牢记在心，对于利他主义，就像良好的风俗一样，可以赞赏，却决不可当作“假设的基础”。<sup>[14]</sup>

最后，从某种十分不同的、非霍布斯的角度看，格雷欣定律能够适用于社会互动。阿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

力绝对导致腐败——无疑是建立在对专制者道德构造的心理瓦解的某种预期上。这一思路超出了我们这本书的论域，不过需要指出一个相关但十分不同的要点。假如制度允许一部分被选出来的人对别人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应当期待哪些人占据这种位置呢？

在另一种市场类比中，假设对垄断权利进行拍卖；我们期待什么人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我们十有八九会假设，打算最充分利用这种垄断权的人，有着最高预期收益的人，会是这一特权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同样，政治权力的职位倾向于吸引那些赋予拥有这种权力以最高价值的人。在政治官职的分配中，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出价最高的投标人。经济学家只是在最近才开始用“寻租”这种行话对政治投标过程的福利性质产生了兴趣。<sup>[15]</sup>在寻租文献中，注意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相关的净资源浪费上。我们在这里表达一种不同的关切。存在着政治寻租会使官职最终被分配给“最佳”人选这种假设吗？难道不可以这样假设吗？——获得官职的将是那些对权力估价最高的人，是那些力求用这种自由裁量权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计划的人，无论这种计划是否道德。真正的公共利益动机是有可能存在的，甚至有可能很普遍，但是这些动机足以刺激人们去争夺政治官职，同那些热衷于对别人运用权力的人展开竞争吗？如果程序导致权力被分配给那些最看重权力的人，那就可以假设，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考虑所有价值的人会被淘汰出局。希望社会结果与大概多数人所选择的结果不同的个人对自由裁量权的需求最大，既然如此，政治制度中便有可能充斥着其利益与普通公民的利益有冲突的个人。公民有必要为他们的制度生活制定相应的计划。

## 七、总 结

我们相信，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即理性的、自利

取向的最大化者，是用来评估不同制度体系之机制的恰当的人类行为模型。在这个方面，“经济人”的核心特点是，它假设互动主体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正是这一假设决定着对掌权者的怀疑，并表达着我们（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待制度设计的态度。这种怀疑主义意味着不能假设代理人在特定政体中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将会根据别人的利益加以运用，除非制度结构中包含着一些能够造成这种结果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模型与主流的“仁慈专制者”政治模型相距甚远，在后一种模型中，<sup>74</sup>把公共利益取向简单地设想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在提出为“经济人”选择的辩护时，专注于分析的和方法论的论证，而不是纯粹的经验论证。我们的论证如下：

1. 有着强大的分析性证据证明，应把制度与相同的基本行为模型进行比较，而不是改变行为用语。

2. 如果认为制度设计是为了把私利动机转化为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专注于私人利益的动机，放弃任何纯粹的行为利他主义，就有着分析上的意义。

3. 如果从工具的角度评价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看它们产生公民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如果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偏好表现出标准的凸面属性，那么在设计制度时接受产生“较差”结果的公民政治代理人行为模型，而不是接受经验记录提示一般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理性的。

4. 除非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数量极多，有可能达到公民中实质性的多数，那么有着利他主义倾向的人也有可能采取自私的行动。

5. 最看重制度权力的人，有可能是那些私人计划要求让别人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的人，因此全体公民能够理性地期待，自由裁量权将会以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的方式被运用。

这些论证中当然有一些经验成分。但是，与传统经济学中纯



粹预测性的“行为科学”模型相比，经验成分并不起完全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事实的意义不在于我们相信有关“经济人”的功能的纯粹经验证据不足，虽然我们相信它比我们的一些更为热心的同行所认为的还要不足。它的意义在于经验记录格外难以阐述，这至少是因为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有可能受到现行制度结构的重大影响，所以当该结构发生变化时，<sup>75</sup>也会出现完全可以预期的、但当前肯定无法观察的行为变化。因此，我们没有关注那些归根到底是不充分的观察，而是试图在合理的思辨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论证。宪政主义分析的大部分内容肯定是由这种合理的思辨组成的。我们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先驱一样，认为惟有从“经济人”推导出来的社会冲突与合作模型，才适合于我们的宪政主义思考。

### 注释：

- [1] 参见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布伦南和布坎南：《征税权》)，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 参见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 *Monopoly in Money and Inflation* (布伦南和布坎南：《货币垄断和通货膨胀》)，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1.
- [3] 参见 John Foster 在 *Economic Journal* 91 (1980) 上对我们的《货币垄断和通货膨胀》的评论。
- [4] 参见 Paul A. Samuelson, "The World Economy at Century's End" (萨缪尔森：“世纪末的世界经济”)，*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34 (May 1981): 44
- [5] 我们的两篇文章，“The Normative Purpose of Economic Science” (“经济科学的规范目的”)，*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 (Dec. 1980): 155—66；和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Choice among Regimes”

- (“预测能力和体制选择”), *Economics Journal* 83 (March 1983): 89—105, 为把“经济人”建构运用于宪政主义分析提供了较早的辩护。
- [6] 把我们的偏好变化带人相对价格的解释框架, 这方面的一次精心尝试, 参见 George Stigler and Gary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March 1977): 76—90.
- [7] 例如, 参见 George Stigler, *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斯蒂格勒:《作为传道士的经济学家》), 1980 年哈佛大学坦纳讲座的讲稿。
- [8] 我们为此做过若干努力。具体参见 James M. Buchanan and Richard E.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布坎南和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Brennan and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布伦南和布坎南:《征税权》).
- [9] 参见 Arnold Harberger, “Three Basic Postulates for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 (哈伯格:“应用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Sept. 1971): 785—97.
- [10] David Hume, “On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 (休谟:“论议会的独立性”),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vol. 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1] Thomas Hobbes, *De Cive* (霍布斯:《论国民》)(1642),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9, p. 12.
- [12] 参见 J. Roland Pennock,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潘诺克:《民主的政治理论》),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21—24.
- [13] Gary Becker,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贝克尔:“利他主义, 自私和遗传适应性”),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Sept. 1976): 817—26.
- [14] 霍布斯的论点似乎与罗伯逊的警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 后者建议, 在听到是否有效取决于“爱心”的各种建议时,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出狂吠以示警告。见 D. H. Robertson, *Economic Commentaries* (罗伯逊:《经济评论》). London: Staples, 1956.
- [15] 相关文献见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 76 规则的理由

(ed.), *Toward to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布坎南等编:《建立一种寻租社会的理论》).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1.

## 时间、诱惑和受约束 的未来\*

### 前 言

前面几章提供了一个哲学的一方法论的视角，从这一视角或多或少会自然地出现对社会互动的规则或制度的强调。在这一章，我们从一种更为特殊的角度提供规则的理由。当然，任何约束性的规则都是对行为的约束。人们为何有意选择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呢？

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种回答，每个回答的适用性取决于人们面对的选择背景。在这一章，我们首先要强调个人选择的时间维度，以及对这一维度的认识对选择行为本身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一个简单的事实含义：人们从不同方案中做出选择，他们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影响到他们在以后时期可能得到的机会。这种作用是重要的，值得加以分析，不必考虑选择的背景。但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承担着私人选择角色与集体选择角色的个人行为之间，这种作用是不同的。

77

对选择的这个时间维度的认识，提供了一条“规则的理由”——这里的规则是指对规则本身建立起来之后的选择施以有约束力的限制的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承担着私人选择角色还是集体选择角色，人们可以选择限制自己的未来，这种行为可以

是完全理性的。

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私人背景下的个人选择；第二部分分析集体背景下的个人选择。

## 第一部分 个人的私人选择

### （一）导论

“我们从这里出发”这一常识性训令，是任何有关制度—宪法变革的严肃讨论的前提。从因果角度说，“这里”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因素，而我们强调的却是时间因素。我们不但必须从这里起步，它限定了我们的位置，并且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步。我们无法取消已经发生的事情。不错，我们可以重新解释我们的历史，但我们无法从时间上回到过去，重复这一历史过程。

我们只能现在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在未来采取行动。我们是现在而不是以后面对选择，虽然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到我们以后可以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对这些选择的可能排序，事实仍然是，我们无法现在做出未来的选择。然而，在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中，肯定反映着对我们以后也会面对选择的认识。

### （二）终极性的组合商品 $Z$

我们将把这里的分析与个人选择行为理论的现代发展，尤其是加利·贝克尔及其同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sup>[1]</sup>在这种研究中，  
78 个人效用函数的论证被重新定义为表示组合“商品”，即  $Z$ ，它们是通过各种投入组合  $X$ ，由家庭生产出来， $X$  是作为普通商品在市场上购买的。家庭生产函数描述了在不同的投入  $X$  之间的相关权衡，可以对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以产生  $Z$ 。模型中的个人

是效用最大化者，效用是根据  $Z$  来定义的， $X$  的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不变，并且存在着某种整体上的收入约束。

从这一基本架构可以比较直接地回到个人决策过程的一个阶段，通过纳入休闲或可欲的时间利用，作为具有自身价格的商品  $Z$ ，从而摆脱收入约束。然后我们可以在模型中把个人视为正在对有时间约束的行为、各种才能和始初禀赋的整体描述进行选择。在决策时序上的这一步倒退似乎太大了，是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无法迈出的一步。他们在返回想象中的选择链时并不想走得太远，回到集合商品组合即贝克尔的  $Z$  的后面。经济学家在没有办法具体说明效用函数的论证时，他们会变得很不舒服。

不过，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不是进一步深化传统经济学家的框架中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我们打算超越贝克尔的  $Z$ ，讨论一下我们所说的“终极性的  $Z$ ”。我们要研究个人对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的选择，其背景要比可以被概括为用已知论证加以定义的函数最大化的背景大得多。个人可以选择一种人生方案，一个行动序列，他希望这将保证自己的经历是“有意义的”、“美好的”、“有回报的”和/或“幸福的”。

当然，为了得到这种经历，必须获得最起码的贝克尔  $Z$ 。基本的人类需要——衣食、住所、性、安全和自由——对生活方式的可行性构成约束。不过，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个人，基本上早就达到了足够的富足水平，使他们能够超越这些初级的生物学的行为约束条件。

### （三）对偏好的偏好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终极性的  $Z$  中的偏好权衡进行选择？我们真的能够大大超越贝克尔  $Z$  吗？我们能够谈论偏好的塑造吗？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讨论元偏好（meta-preferences）吗？ 79

一旦我们认识到，个人是在不同时期做出有时序的选择，并

且一个时期的选择影响着后来时期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的讨论。我们这里强调，我们不仅打算引入当期选择的投资因素。我们随时能够通过把相关的  $Z$  定义为“时间  $t_i$  的消费”，从而允许一个人在时间  $t_0$  把资源用于生产这种  $Z$ ，由此使这些因素纳入通行的框架。这一分析隐然假设，个人只在  $t_0$  做出选择。没有引入多期选择，虽然这一分析中体现着效用的时间相互依赖性。

我们打算考察一种背景下的真正的多期选择，在此一背景下，个人在相关的  $Z$  中进行选择，日期为时间  $t_0$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处于时间  $t_1$ 。他不是  $t_0$  而对选择的同一个人。在  $t_1$ ，这个个人将是先前在时间  $t_0$  做出的选择的“产品”，并存在于时间  $t_{-1}, t_{-2}, \dots, t_{-n}$  的整个序列之中。在相关的限制下，个人把自己设定为一个行动和选择的主体，它是由现在而对的选择之前的时期采取的行动形成的。<sup>[2]</sup>

这个个人有私人的、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会形成影响着决定任何时期  $t_0$  的选择行为的偏好和约束。从未品尝过葡萄酒的人，不可能表现出对美酒的偏好，即使约束条件允许潜在消费范围内存在这种选择。没有受过长跑训练的人，不可能参与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竞争，无论他是否有这种强烈的欲望。<sup>[3]</sup> 在这里的  
80 理论阐述中，个人类似于一种特殊的资本品，一架以预定形状设计出来的机器，因此能够被运用于相对有限的功能范围，离开这一范围，只有在付出一定的预期效率成本时才有用处。

理性的命令要求承认这种时间的相互依赖性。一个在时间上处于  $t_0$  并有着既定的个人史的理性人将会认识到，对相关的  $Z$  的当期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有可能在  $t_1$  以及此后得到的  $Z$  的范围，并且，当期选择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在以后时期得到偏好的  $Z$ 。可以预期，处于  $t_1$  的“个人”与处于  $t_0$  的而对选择的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个个人“塑造”  $t_1$  及后来各期的选择者，

以及受着各种限制的选择组合（相互依赖性的限制对于分析本身并不重要）。选择者认为可以获得的那一组“处于 $t_1$ 的人”的偏好排序，从理论上说与对一组基本的 $Z$ 商品的偏好排序似乎没有差别。

假如同意这种偏好排序是可能的，假如认识到当期选择影响到以后各期做出的选择，那么分析中就必须包括“对偏好的偏好”。某些未来肯定优于另一些未来，现在的选择倾向于反映着这些偏好。

#### （四）过去、现在和未来

尽管存在着预期的生活连续性，个人知道在 $t_1$ 面对选择的人将是不同的人。这一未来的现实必然进入现在 $t_0$ 的决策计算，成为一种约束条件。在各种限制下，对于将存在于 $t_1$ 的人能够进行“塑造”，使他反映 $t_0$ 表现出的偏好排序——但是这有一定限度。这种塑造充其量只能是部分的，处于 $t_0$ 的选择者知道，生活在 $t_1$ 的人必然表现出某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意愿和个性，表现出某种偏好组合。这个只出现于 $t_1$ 的新人，可能发现自己有能力破坏或改变任何可能小心地反映在 $t_0$ 做出的前瞻性选择中的计划。在 $t_0$ 做出选择的人，以紧张的方式工作，与他作为一个自觉的人在时间存在中的连续性相对立，他认识到有可能受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另一些缺少深思的自我的诱惑。

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自觉的人，个人可能不太愿意对自己<sup>81</sup>的行动自由施加约束。即使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未来时期的行动目标，他也会很看重自由。不过，完全不受约束的行为有可能确实令人担心。更为可取的生活方案，易于受到“另一些”人在未来时期可能表现出的行为模式的侵蚀。因此，从 $t_0$ 的制定计划的角度来看，这个作为参照物的人可能寻找各种办法对那些从未来时期的同样意识中产生的“他人”做出不惜成本的“破坏性”



行动，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禁止这种行为。

个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两种独立但又相关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选择一组道德律令，它既指导现在的选择也指导未来的选择。如果一个人确定了一种内在的、主观上认为有意义的道德观，并且在为这种道德观建立合法基础和进行辩护时，以一种可以留下准永久性成果的方式借助于智力和情感资源，他就能成功地使未来摆脱这种生活计划——可以用遵守这种道德律令的行为来部分地描述这一计划——的做法增加成本。根据一组道德规则内在地致力于某种生活，不会明确地限制着选择。但是这种做法能够保证不可取的行为模式（用  $t_0$  时的眼光来评价）将引起犯罪意识。例如考虑一下工作伦理。假如人们有意或是通过不自觉的习惯把这种伦理植入自己的内心，未来时期的懒惰将伴随着一种主观感受到的成本。游手好闲将成为一种罪过；这会使游手好闲付出更大的成本。

然而，这个人可以努力超越工具性地选择当期  $Z$  的做法，并且超越工具性地采用一部个人道德法典的做法。这个人在一定的潜在选择行为的范围内，尝试通过实行有约束力的规则或限制，先期做出未来时期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自觉地减少预期出现于  $t_1$  及以后的选择机会。人们有可能自觉减少行动的自由。其目的是消除一些在落实某种可取的生活计划时“没有效率的”行为方式的可能性。

例如，考虑一下鲁滨逊孤身一人生活在岛屿上（在星期五<sup>82</sup>到来之前）。他可以自觉地选择睡在海岸旁的某个地方，早晨的海潮会无情地把他叫醒。睡在这个地方，鲁滨逊预先便决定了要早早开始自己翌日的工作。他取消了决定什么时候起床的机会，因为他的生活计划包括勤奋工作而不是游手好闲，他要消除后者的诱惑。

埃尔斯特在《尤利西斯和塞壬》一书中，用不少篇幅讨论

过这种预做决定的行为。<sup>[4]</sup>正如这个书名中的经典事例所示，尤利西斯在接近塞壬的海岸时把自己绑在船桅上。他认识到自己意志薄弱。他不相信自己能够经得住诱惑，他知道假如自己经不住诱惑，航行的伟大目标就会付诸东流。

谢林等人也分析过预先防范的问题，认为它是一种“冲突战略”。<sup>[5]</sup>在类似于博弈的潜在互动中，预先防范可以提供一种保证战略优势的手段。将军在自己的军队过河后下令烧掉桥梁。这种战略上的“规则的理由”，当然不是我们这一章或这本书所关注的对象。这里的讨论仅仅直接涉及惟一的一个人。不存在战略性互动，除非它是发生在一个现在的人和一个人可能出现的人之间。正如以上分析所示，对未来时期的行为的约束可能是来自一个一直完全孤立于所有其他的人的理性计算。这个人可以预先让自己做出选择，他认为从长远看这种选择优于纯粹的即时反应。

当然，这一分析不限于处在社会孤立状态下的个人的选择行为。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把这一分析扩大到另一些显然有着集体性质的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但是，甚至当选择仍然有着严格的“个人主义”性质，这种选择背景仍有可能是社会的，市场关系便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类情形下，只要没有预期个人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别人的行为，那么这种非战略背景就仍然是描述性的。作为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资源、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者和/或供应者而行动的人，在这样做时不必意识到自己正在就交易条件，或换一种说法，就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份额进行讨价还价。<sup>83</sup>用更具普遍性的语言说，这种分析似乎适用于人数众多的一切背景，只要这个作为参照的人始终是许多人中的一员，而另一些人的行为只被当作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对象。

## 第二部分 个人的公共选择

### (一) 导论

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个人的私人选择计算,因为这一分析有助于引入个人在公共或社会选择背景下的更为复杂的计算。为了把讨论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们将忽略可能出现的若干复杂现象。我们将继续省略战略性行为。公共选择背景下的个人是许多人中的一员,能够理性地把所有其他人的行为当作环境的一部分,因而是无法进行操纵的。我们也要继续集中讨论惟一一个个人的选择计算。我们省略确保人们达成协议所涉及的问题,虽然正如我们的论证所示,有利于做出各种安排的规则的实行有可能改变个人的选择行为。我们假设,个人在许多人的集体选择的背景下,就像他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那样采取行动,这些利益反映在基本的效用函数中。

在第一部分细致阐述私人选择行为的一个理由是要表明,在某些方面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背景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前面的分析总结如下:一个人在 $t_0$ 面对一个选择,它受着先期选择的约束;这种选择将会考虑到 $t_0$ 的行为预期对 $t_1$ 及以后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处于 $t_1$ 及以后时期的人,部分地是由 $t_0$ 及更早的选择塑造的,但是处于 $t_1$ 及以后时期的人肯定不同于必须在 $t_0$ 采取行动的入。在这种背景下,处于 $t_0$ 的个人在 $Z$ 中间进行选择;个人可以采用道德规则;个人可以先期做出未来的选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实现一种可取的生活计划。

84

### (二) 拥有历史的社会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人的处境,他在 $t_0$ 是既定社会的众多成员之一,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集体单位有自己的历

史，它不同于个人成员的各不相同的集合在一起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个集体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体，在过去的一系列时期采取着“行动”。它有过战争，或它维持着和平；它曾对公民课以重税，或它没有这样做；它允许公民享有范围广大的行动自由，或它不允许这种自由。采取“行动”创造这种历史的“它”，当然必须表现为具体的人，他们承担着或攫取了或被指派为代理人的角色。但是这些作为代理人的人将以集体的名义而不是作为有明确身份的个人采取行动。

这个集体单位的历史是由过去所有时期做出的“选择”来描述的，这一历史约束着  $t_0$  的可以利用的选择组合，集体本身和该集体中的个人都可能面对这些选择，其方式一如前面分析私人选择时谈到的相互依赖性。这些由历史决定的约束条件，可以描述性地概括为共同体的法律、制度、习俗和传统，其中也包括对做出集体“选择”的手段做出规定的规则或制度。此外，就像在前面的分析中一样，集体单位本身在  $t_0$  做出的“选择”通过对约束或偏好或两者的影响，将改变出现于  $t_1$  及以后时期的选择机会。

我们在第二部分要讨论这样一种人的选择行为：他作为许多人中的一员（一个投票者）参与某个团体的决策过程，他期待着自己所表达的偏好（“选择”）发挥作用，通过一种已知的规则（例如多数票或简单多数票原则）与别人的偏好汇集到一起，它将导致一个惟一的决定性的集体结果，它一旦产生就对所有成员有效，即它是标准的、分析意义上的“公共”决策。

### （三）时间的相互依赖性

85

处于  $t_0$  的个人面对一组集体选择或选择机会，他认识到包含在历史记录中的偏好和约束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不是遵照选择规则采取行动的决策者可以控制的一组选择变量。现有的偏好函

数和从过去的选择中产生的制度，是“相对绝对的绝对值”，它可以发生变化，但只能随时间变化——现在做出的选择对它影响甚微。至于这个人自己对选择机会的评估，这方面不存在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别。

然而，当这个人认识到对于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来说，他本人的偏好的可能变化也许无关紧要，这时就会出现一个重要差别。集体决策是通过遵守某种规则产生的，这一规则把个人的偏好表达整合在一起。被视为一个单位的集体的偏好排序，不必与团体中的任何个人的排序相一致，并且有可能根本不存在这种排序。

在这一点上，分析似乎顺理成章地导致对最熟悉的社会选择定理、即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的讨论。<sup>[6]</sup>这一定理表明，即使个人对偏好排序的选择本身始终如一，不会因为对集体选择组合中的各种备选方案的一系列比对而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集体所表现出的“偏好排序”，可能并不反映在可以合理接受的整合个人选择的规则下的内在一致性。

时间维度本身不是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分析的核心，对这一定理的全部扩展性讨论，一直是建立在未明言的假设上，即所有的比对都是共时的。相反，我们这里的要点是严格针对时间维度，针对它对个人的选择计算的含义。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共时的集体“选择”中不一致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可以提供另一种“规则的理由”，一个我们在本书中基本上予以忽略的理由。我们关心的是个人对集体选择的控制力的衰落以及这种衰落<sup>86</sup>的后果。一个人可以在两种政治选择之间表现出清楚的偏好。分立的偏好的排列可以使现行决策规则在每一独立时期产生一种稳定的结果。然而，即使这个人期待别人的偏好在一系列时期保持不变，他也没有办法预见决策规则产生的一系列结果，会表现出在这人看来与他自己的排序相一致的时间路径。

表面上看，这一结论似乎仅仅是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变种。但是请注意，这里为了进行考察而分离出来的问题，并没有被定位于更为常见的共时背景下多数派组成的瞬间可变性（在不存在单峰偏好的情况下）。这里的问题源于个人偏好本身的主观性质，源于个人不可能知道为何其他人那样排列选择。一个人可以在  $t_0$  偏向于某个选择或候选人  $A$ ，而不是另一个选择或候选人  $B$ ，因为他预期  $t_0$  时选择  $A$  能够使他在  $t_1$  可以进一步选择  $a_1$ ，后者才是最终欲求的目的。但是决策团体中也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相反的原因，即为了在  $t_1$  选择  $a_2$ ，前一个人可能认为，这种最终结果是最差而非最优。

就我们所知，关于个人的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的计算之间的基本差别，一直无人进行分析。与反映在个人的私人选择中的视野相比，他倾向于根据更为短期的视野做出投票选择。由于选择背景的性质使然，个人无法像在私人决策中可能做到的那样，把决策的多期相互依赖性纳入考虑。虽然一个选择者在这两种背景下同样可以认识到，现在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时期的偏好和约束，从同一个人因为希望集体取得的成就而做的“投资”中产生的对他有利的当期效用价值，肯定相对低于任何为了成为某种理想生活计划中的私人而做的可比投资。换言之，进行私人选择的个人可能试图做出这样的选择，它能够把他本人塑造成一个在随后各时期具有连续性的自觉的主体，因为他追求的是一种具 87 有连贯性的生活。作为从事公共选择的许多人中的一员，这个人肯定表现出较少的兴趣以未来时期的眼光做出当期选择。

#### （四）实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的差别。 $A$  处于公共选择的背景下，它在  $t_0$  时出现了两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将通过把个人对两个选项的偏好表达整合

在一起的决策规则得到选择。预期每个选项都会产生将在  $t_1$  得到实现的结果，那时将会出现对后来的两个选项的另一次比对选择。在  $t_1$  时从决策规则中产生的“选择”，又会产生将在  $t_2$  得到实现的结果。为简单起见，我们随意把这一时间序列截止到  $t_2$ 。

个人用  $t_0$  时的眼光评价预期报酬。图 5.1 用一个树形图描述了这个例子，其中预期报酬都有具体数值，它们都是从  $t_0$  的角度加以评价的。最初的选项是 A 和 B；哪一个会主导着其报酬已经得到描述的这个作为参照人的偏好表达呢？“选择”将取决于这个人对集体在后来的  $t_1$  做出什么“选择”的预测。假如这纯粹是个私人选择的背景，报酬十分明确，这个人就会知道在  $t_1$  对选项的控制始终是内在控制。因此，在  $t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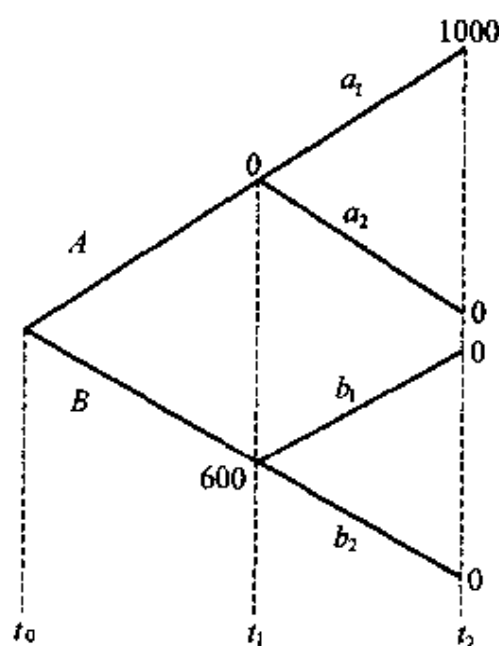


图 5.1

选择  $a_1$  有着合理的高概率，这使最终能够达到当前评价的最高报酬 1000。尽管认识到这个处于  $t_1$  的人不同于处在  $t_0$  的选择者，后者对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仍可以使这种概率评估变得合理。因此，假如这是一个私人选择的背景，在  $t_0$  得到选择的将会是 A 而不是 B。

但是，在这一虚构的背景下，个人是许多人中的一员，决策是为作为一个单位的集体做出的决策，其结果适用于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关心的是个人在  $t_0$  的投票亭中如何表达个人偏好。

88 我们这个作为参照的人也可以在  $t_0$  投票支持 B 而不是 A，

把私人选择背景下可能表现出的偏好颠倒过来。他可能采取这种行动，因为他无法赋予以下前景以高概率：作为一个单位的集体通过实行现行决策规则，当在  $t_1$  面对选择  $a_1$  和  $a_2$  时，将选择  $a_1$ ，即对于这个人来说最为可取的结果。这里没有意识的连续性，没有准永久性质的心理统一体的感觉。即使这个投票人一选择者认为，个人偏好排序无论是他本人的还是别人的，不会在两个时期之间发生变化，他也只能给这样的前景赋予较低的概率：决策规则将在  $t_1$  产生最可取的结果。这一较低的概率来自这样的事实：个人没有办法知道别人——他可能是团体中的合伙人，而该团体在  $t_0$  有可能表达对  $A$  的偏好——如何排列预期在  $t_1$  出现的选项。置身于这个未来团体中的人，可以采用同报酬已得到描述的人完全相反的方式，对图 5.1 中的选择进行排列。

89

为了让我们的事例更为具体，考虑一个多人背景下的风险中立的投票人，此人不知道别人的偏好。在简单的多数票规则下，假如选择了  $B$ ，这个人将在  $t_1$  享有 600 个单位的报酬。相反，假如遵循决策规则选定了  $A$ ，则  $t_1$  的出现只有 5 的前景，该规则将在至关重要的第二个模态上产生  $a_1$ 。

表述这一核心命题的更为一般的方式是，参与集体选择的个人会发现难以利用集体作为促进真正长远的目标的工具。在个人排序中，“类似于投资”的集体选择的地位有可能低于“类似于消费”的选择。导致集体或公共选择中表现出的有限的时间视野的这个基本原因，十分不同于另一些必然与选举限制以及“公共产品”中的个人份额的不可交易性有关的更为常见的原因。

### （五）道德规则和/或宪政措施

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证明，认识到选择的时间相互依赖性的个人，有可能发现理性的做法是采用一组涉及纯粹私人



行为的道德规则。但是应当清楚，为约束未来时期的行为而设计的道德规则，在集体背景下将变得更为重要。作为参照的人知道他只是一个团体中的一员，集体结果产生于一个特定决策结构的运作。如何限制作为一个单位的集体的“行为”呢？在  $t_0$  采取行动的个人，如何在一个多人世界里确保个人的生存和安全？他希望施加影响的，首先不是他自己在未来时期的行为，而是将会成为做出选择的团体之一员的另一些人的行为。怀着这种考虑，这个人可能基于十分理性的理由，把当期资源投入到对一套普遍原则或规则的教育、传播和普及上，这些原则或规则将对预期受到约束的处境反应模式的行为产生普遍影响。

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指出，对选择的多期相互依赖性的认识，有时可以提供一个先期行动的基础，即便是在最为独立的私人选择的背景下。除了进行思考的当下时刻，个人可能不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刻都是个理性的选择者。但是如我们所说，在私人选择中的先期行动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因为个人清楚自己的行动自由是受到约束的。

在公共选择的背景下，这种天然的局限性就不适用了，个人有着极为强大的理由，选择对集体行为采取立宪主义的先期行动。正如第二部分前面所说，个人在  $t_0$  对集体在未来时期面对的选择做出的反应的预测能力，要低于对私人的个人反应的预测能力。在前一种情况下，即使个人正确预测到自己的偏好，他对别人的反应模式必定仍然是不确定的。作为一条普遍原则，理性律令将指出，在未来时期的“选择”的可预测性与约束未来时期的选择集的可欲性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sup>[7]</sup>

第二条相关的论证表明，对未来时期集体背景下的选择进行约束，有着相对更大的吸引力。如前所述，在严格的私人选择中，个人知道任何先期承诺限制着他满足自己的个人偏好的能力，无论它是什么偏好。在先期承诺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权衡交

易。相反，在公共选择的背景下不存在这种权衡交易，至少就其直接意义而言是这样。在投票赞成对未来时期作为一个单位的集体面对的选择做出限制时，个人完全没有必要从限制个人偏好的选择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为集体“选择”划定的界线，可以被视为处在任何潜在的可欲结果之外。可以认为这种界线只适用于<sup>91</sup>可能从那个作为参照的个人以外的人们所表达的偏好中产生的潜在集体结果。显然，对集体的行动能力的宪法约束，倾向于被视为大大不同于对私人行为可以采取的先期行动。<sup>[8]</sup>

让我们回到图 5.1 描述的例子。个人倾向于支持能够增加出现如下情况之概率的宪法约束：在  $t_1$  到来时，集体将产生  $\alpha_1$  而不是  $\alpha_2$  的结果。如果这种约束到位，个人可以在  $t_0$  选择  $A$  而不是  $B$ ，即使他处在公共选择的背景下。考虑一个实践中的例子：在偿还和不偿还公债之间做出集体选择。假如个人有宪法或其他方面的保证，一旦还清旧债，不再发行新债，那么他就有可能表达赞成偿还的偏好，以此减少与还债有关的未来的纳税负担；如果不存在这种保证，则个人有可能表达连续展期旧债的偏好。

宪法义务或约束成了政治体成员用来把长远考虑纳入当期决策的手段。如果不存在这种约束，个人几乎必然会在政治中采用短期眼光。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这种短期眼光的实践意义。

#### 注释：

\* 对包含在这一章中的材料的初步研究，可以在布坎南的两篇论文中找到：James M. Buchanan, "History, No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Future" ("历史，现在和宪政主义的将来")，presented at the Interlaken Seminar on Analysis and Ideology, Interlaken, Switzerland, May 1982; "Individual Choice Behaviors in Private, Agency, and Collective Decision Roles" ("私人、代理人和集体决策中的个人选择行为")，presented at the Club Turati Conference on In-

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Turin, Italy, January 1983.

- [1] 参见 Gray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2] 选择中的这种自我塑造的一面,在以下文章有较详细的讨论:James M. Buchanan, "Natural and Artifactual Man" (布坎南:“自然人和人为的人”), in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ed. James M. Buchanan.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Fund, 1979. pp. 93—112.
- [3] 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区分约束的变化和偏好的变化并不重要。斯蒂格勒和贝克尔认为,不妨把所有这些变化都视为偏好变化,假如偏好在整个时间和不同的人中间始终不变的话。在这两种情况下,做出选择的个人知道自己的选择行为会影响到他在另一时期的选择行为。  
参见 George Stigler and Gary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March 1977): 76—90.
- [4] John Elster, *Ulysses and the Sirens* (埃尔斯特:《尤利西斯和塞壬》).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译按:塞壬为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常以美妙歌喉引诱船只触礁沉没。)
- [5] 参见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谢林:《冲突战略》),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6] 参见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 (阿罗:《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 New York: Wiley, 1951.
- [7] 莱纳提出了一种基于行为人在解释符号中的预期易错性的约束理论。这一分析被扩展到人类以外的物种的行为刚性。参见 Ron Heiner, "Uncertainty, Rules, and Behavior: A Theory of Behavior and Evolution as the Resistance to Unreliable Complexity" (海纳:“不确定性、规则和行为:一种行为理论和与不可靠复杂现象相对抗的进化”),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1. 油印稿。
- [8] 当然,这种关系对两者都有影响。如正文指出的,虽然个人可能更愿意对集体后果的范围施加限制,以便防止另一些人的强加行为,但是这个人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也更愿意利用国家代理人作为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手段。那些在美国让禁止饮用酒精的宪法禁令获得通过的改革者,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会受到限制。

## 无规则的政治

### 第一部分：时间与无约束的集体行动

#### 一、导 言

在前面一章我们力图证明，与私人或个人化选择中行为相比，集体选择中的个人行为所反映的时间视野更为短浅。行事比较审慎的人士，可能更乐意自己干自己的，这样他本人或他的子嗣肯定能享受自己在人力或非人力资本上长期投资的果实，相反，他在集体行动中就没有这么多等待的耐心，这反映在透过政治决策制度做出的表达之中。由于从集体或政府“投资”的果实中，个人可以得到的权利或份额肯定会被稀释，所以，个人的时间视野会缩短。如果这一基本假设是可信的，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随着现代社会变得日益集体化或政治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内在的贴现率会趋于升高。

在本章，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不那么抽象而是更实际的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不过，我们想强调一下，我们不会跑完全程，我们不敢涉足于历史性或描述性的制度细节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讨论依然是抽象的，我们将考察民主制度下理想化的政治模型可能会表现出的运作情况，我们设想，在面临我们当代经历的种种困境时，这些模型依然可以正常运转。政治分析性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所熟知的问题在现代政治生

活中总是挥之不去。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这里进行的分析的主要任务的附带结果，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为宪法<sup>93</sup>法规则或约束提供依据。

我们打算借助于从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遇到的经济困境中选出的几个比较明显而又为人熟悉的例子，提出跨期主题。我们将讨论“高征税陷阱”、“通货膨胀陷阱”和“公债陷阱”，它们证明了现代民主政体普遍存在着收支无度的问题，不同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些难题，只不过它们的相对严重性各不相同而已。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会得出系列推论，我们的更重要、更一般的论点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清晰：只有当政府受到宪法规则的适当约束，政府才有可能变得目光长远，然而，这样的宪法规则目前尚不存在。对于规则必要性的这种论证，源于我们对现代政治经济体之运作机制的理解。

## 二、社会贴现率

本章的讨论与经济政策理论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有关，通常人们将其称为“社会贴现率”。长期以来，尤其是自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本世纪初出版以来，<sup>[1]</sup>经济学家一直关注下面的规范性问题：社会应该以多大比例去贴现未来？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应当”如何权衡后代的效用？更具体而言，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以市场所决定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即以市场制度所确定的作为私人投资决策之参数的比率进行贴现，是否能充分保证后代的利益？集体本身是否应当根据由市场决定的贴现率做出它自己的投资决策？如果市场贴现率“过高”，那么，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应当在社会的全部或部分投资和资本积累活动中取代个人的市场行为？

这些问题本身当然都很有意思，不过，对我们的讨论而言，促使经济学家提出这些问题的隐含的假设则更发人深省。<sup>94</sup> 提出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假定：只要学者们能就某个令人满意的规范性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则一个仁慈的政府就能够，大概也会乐意实施这一解决方案。这些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抬起头来问一声，我们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政府，是否能够或乐意执行从规范性处方的仔细操练中形成的这一“最优”贴现率。换句话说，福利理论家缺乏某种关于政府政治行为的实证理论或模型，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隐含的。

50、60 和 70 年代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填补了规范分析中的这一可怕空白，而我们曾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恰当的范围内，如果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解决适当的问题，它确实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关于政治如何运作的实证理论，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话来说，提供一种理论武器，使我们能够解释在不同的规则和制度下政治的运作机制有什么区别。我们关于政治贴现率的结论，正是建立在这种分析性结构的基础上。在现代政治决策制度的运转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贴现率”，要高于个人自己行动时所显示的时间偏好率。这一陈述采取的是一种可以验证的假说形式，它并不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如果用某种超个人的标准来衡量，人们在市场行为中显示的个人时间偏好当然有可能“太高”。为了论证这一点，恐怕必须诉诸某种价值标准，而这种标准在做出关于市场行为与政治行为之相对贴现率的实证性陈述时，却并非必需的。不考虑我们自己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私人变量，我们也可以说，政治过程中所形成的贴现率要高于竞争性市场之运作中所形成的贴现率。

### 三、高征税陷阱

我们将要谈到的三个主要例证，都是在 80 年代初的政治讨论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用“高征税陷阱”一词指通常被概括地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一整套观念。我们对这一陷阱<sup>95</sup>或者说两难困境的分析，将为我们提出的对政府之征税权应当给予限制——即使在纳税人与受益人的身份基本重叠的情况下——的论证奠定基础。<sup>[2]</sup>也就是说，我们为民主政府建立的模型是，政府会对公民的如下两种要求做出回应，一是扩大国家的服务（和转移），二是降低税率。困境来自于私人行为与政治行为这两组行为在时间视野上的差异。

某些具有价值取向的规范性标准暗示我们，相对于一个经济体中的私人或市场部门，存在着某种“最优”规模的公共或政府开支，如果不参照这一标准，我们能说税率“太高”了吗？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有当每个人，包括政府成员（政治家、议员和官僚），也包括群体内的直接受益者，都对“太高”这一陈述表示同意，我们才可以说税“太高”了。但群体成员，尤其是接受净转移支付的人，恐怕永远不会同意缩减公共部门的规模，这种规模是根据政府开支总额、从而也间接地根据税收总额来调整的。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某些规范性的判断标准，我们就不要指望人们普遍同意“政府开支太高”这一命题。

这一命题并不等于说税率“太高”。起码在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税率过高，结果实际税收反而要比实行低税率时还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各方都会对降低税率的必要性普遍表示同意，虽然在缩减税额上未必如此。

80 年代，在美国，人们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名目下广泛讨论了税率与税收总额之间简单的算术关系，亚瑟·拉

弗教授使这种关系成为政治上的热门话题。很多批评家指出，早在摩尔人<sup>[3]</sup>时代，甚至可能在古希腊早期，就已经有一些著作明确阐述了这种关系。而事实上，这样的关系，并不比一个简单<sup>96</sup>的函数表的数学属性能告诉我们更多东西。只要能够预见到纳税人逆向行为反应，就必定存在这样的关系。

但是，指出税率—税收之间必然存在这种关系，并不等于说，现代财政制度可以用表格或曲线中“错误的”或反向部分的位置来描述现代财政体系，即它所处的位置是，税率下调将导致税收增长而不是下降。在80年代的美国，报刊上一些鼓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似乎就主张这个位置就是现有财政结构的基本特征。

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最初的反应，的确是拒绝导致这种位置所必需的行为模型。任何有着理性动机的政府决策过程，似乎都不可能允许税率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什么它会允许税率高到减少税收总额的地步？这样高的税率对于纳税人、各种福利项目的受益人及政治家来说，都没有好处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乐于维持这种财政结构。从行为上看，沿着相关的税率—税收曲线的反向位置看起来未必荒唐，更不用说那些经验研究的成果了，它们显示反应弹性远远没有达到产生这种结果的地步。

然而，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最早的这种反应，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样确定。对做出征税和支出决策的政治决策过程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个人对这些决策的的分析，显示出一种有一定道理的过程，它确实可能导致税率—税收关系的“错误”一侧的位置。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私人选择与公共选择在时间视野上的差异。

我们做出一个有可能是非事实的假定：财政结构就处于这种位置上。在税率与税收总额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是否存在具有行为意义的路径，推动财政制度达到这一位置呢？



我们首先来考察那些参与政府的财政决策过程的人士的效用<sup>97</sup>或偏好函数。极端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财政决策都是采用多数投票规则形成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结果的投票。允许不同的选民群体发挥各自的集体影响力，这样的分析便足够全面了。不管怎样，参与集体决策过程的人都愿意通过政治单位来决定开支或花销。他们需要这些开支，可能是想为“有益的事务”（由政府出钱的物品、服务和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或是为了补贴自己或亲朋好友和选民的腰包。不管是在哪种情形下，我们都可以设想，那些参与集体决策的人想得到资金或税款。最终做出财政选择的人无论是谁，在他们的效用函数中，政府税款是一种“有益物”。

与此同时，为了得到这些税款就必须征税。（在本节，我们先不提通过印制货币或发行债券得到的税款；我们将在下面两节再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从从事私人经济的公民那里攫取资金。不管政府的决策模式是什么样子，这一征税过程总是痛苦的。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描述，税或税率是“有害物”而不是“有益物”。从某种乌托邦意义上说，参与集体决策中的人的理想是不必征税就有钱可花。对这些人来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可能就是，在没有任何大家所希望的项目开支的情况下征税。不管纳税人和受益人完全重合、部分重合还是根本不沾边，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

请注意，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谈到时间视角。我们还没有确定，政府希望获得的税收流是开征某种税目的产物，还是提高税率的结果。现在，我们假定，参与集体决策的人是出于短期考虑而行动的，理由上一章已经分析过。我们在这里用“短期”一词，意思是说，相对于私人或人们作为个体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税率变动时的考虑来说，财政决策者所考虑的时间周期要短一些。我们不必更详尽地讨论贯穿于每个集体决策中的时间视野的

全部特征；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政府进行财政决策<sup>98</sup>时所考虑的时间视野，没有纳税人在对税率变动做出反应时的视野那么长远。

当然，我们知道，纳税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税率变动是要花费时间的。面对税率提高，人们肯定会绞尽脑汁寻找免税的项目代替课税项目，至少是代之以税率较低的项目，不管税目是针对收入来源还是针对收入的使用。人们必然会将投资向不用纳税或税率低的机会转移，必然会投资于那些对直接受益的事情有所增益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研究并利用法律的漏洞，律师或会计师可能会最早发现这些漏洞。这里的全部分析仅仅依靠一个大致正确的假设：在考虑一个税种或提高税率的增收潜力时，参与政府决策的人，比起作为纳税人的个人调整自己行为以趋于税后均衡时的考虑来说，有着更短的时间视野（贴现率较高）。

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对税率变动做出充分调整需要十年时间，这个调整期乃是根据现代西方国家的财政制度而做出的非正式估计。我们进一步假定，人们在参与征税（和政府开支）的集体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时间视野，不长于五年。当然，有很多理由可以支持我们所假定的个体在这两种不同角色中形成的时间观的差异，上一章我们只对其中之一进行过讨论。

给定上面所假设之时间视野上的差异，则“政治均衡”将先于“纳税人均衡”而确立。也就是说，个人作为政治决策的参与者，将会努力实现这么一个局面：财政决策活动所面临的税率与税收之间的权衡取舍，在相应的时间周期内，等价于效用函数中对这两种自变量的主观权衡取舍。只要个体作为财政决策者，认为从增加政府收入中得到的好处，高于因为获取这些资金而不得不提高税率面蒙受的“损失”，他就会“投票赞成”或支持提高税率。这两个变量都与政府资金预期能够带来收益的时间

99 周期长短有关，而与纳税人充分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周期没有直接关系。同样，财政决策过程中的这些个体参与者不会关心下面的事实：纳税人得花费十年时间才能对目前的税率做出充分调整、实现均衡，即使他们在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可能认识到，在两个过程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但作为政治决策者，个人只关心五年以内的税收流和由此而产生的项目收益。

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纳税人无法在五年时间内充分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一结果导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按给定的税率（高于最初的起征税率），政府在五年期内的每期所能征收到的税款，要多于它能从整个十年期内每期征收到的税款。<sup>[4]</sup>于是，比起体现着等于或长于纳税人调整周期的时间视野的过程来说，体现着较短时间视野的财政过程，能够更充分地盘剥纳税人。比起具有真正长远打算的过程，仅仅关注短期政府税收流的政府决策过程，对纳税人的压榨更彻底。举一个大家很熟悉但跟税收无关的例子：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石油卡特尔，调整石油供应量所需要的时间，比个人调整车辆的大小和能源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因此它能够在个人完成调整之前从石油消费者那里得到更多收益。

当然，如果给定足够的时间，纳税人会做出调整以适应任何给定的税率，最终可以实现政治均衡与纳税人均衡间的平衡。要实现这一完全均衡状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人们盘算的那些权衡取舍必须相同，而纳税人也必须对现有税率做出充分调整。这种完全均衡在长期税率—税收表内的位置，很有可能是税率和税收有着反向关系的位置，尽管准确的位置只能根据经验确定。但这一分析显示，由于长期的税率—税收关系与政治决策过程无关，出现在这一关系或表格的反向区域中的位置，并不是“集体非理性”的表现，因为参与政治决策的人们未必违反了理性原则。

但是，如果达到了这一位置，政治决策者也意识到了这一位置，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不是降低税率？答案在于税率增加这枚硬币的反面。降低税率后，政府会发现，在同参与政治决策的人相关的这段时期内，政府收入会减少。即使我们假定，降低税率可以在十年后实现政府收入的增长，也无法改变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仅仅关注五年周期内的政府收入的人们的决策。维持高税率可以确保在这一时期内的较高政府收入。减税增进政府收入的效应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

站在 80 年代初期的角度看，那些反对天真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论点的批评家是正确的。降低税率肯定会、并且确实减少了政府收入流；特别是由于开支削减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削减，结果，预算赤字扩大。但如果给出足够时间让纳税人做出充分调整，批评家们的看法是否依然正确，我们就永远无从知晓了，因为早在 1982 年就出现了出于短期政府收入考虑而要求提高税率的压力。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征税陷阱”的根源。参与政治决策的个人，即使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也不可能轻松地摆脱这一两难困境。如果缺乏对集体财政倾向的约束，而仅靠形成财政决策的现有规则和程序，即使在其私人活动中具有长远眼光的人，在作为政治的参与者行为时，也是非理性的。正是这一点，构成我们提出对政府财政当局必须施加有约束力的限制的有力论据。只有找到某些限制政府权力（政治分配）的办法，在以后的期间内按照经过深入评估而立刻选择的长期财政项目重新起步，每个参与者才会发现支持这种财政项目中的各个因素是有益的。只有通过宪政变革，才能够对现代政治制度做出调整，以确保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受到激励按照他们认为合乎自己和共同体之长远利益的方式行动。<sup>[5]</sup>

#### 四、通货膨胀陷阱

高征税陷阱与通货膨胀陷阱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本节我们将分析通货膨胀陷阱。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两个陷阱本质上源于同一个行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分析这种类似处，前面我们已经概括地指出，这一行为基础是：个人在分别扮演公共决策者和私人决策者时所做出的选择的贴现率，是存在差异的。

70年代，美国和另一些西方国家一样，都陷入了通货膨胀，而且它似乎没有消退的迹象。尽管人们普遍地承认，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低于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但通货膨胀依然挥之不去。从长远角度看，通货膨胀显然不符合任何集团的利益。然而，渗透到参与政治的人们的决策算计中的短期眼光，却阻碍着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货币的有效稳定。

那么，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一困境的？有没有一条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且不仅仅是暂时摆脱？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或许首先得回答第二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观念的变化过程，至少是自凯恩斯爵士以来的经济学观念史。我们只想勾勒出一个概貌。

凯恩斯成功地将一个高失业、生产能力被闲置的经济的抽象模型，灌输进了本世纪中叶经济学家的思想。凯恩斯的如下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学者的观念最终会影响政治家的行为。在最初的  
102 凯恩斯模型中，需求形成供给，需求增加，将吸收未被充分利用的人力和资本，而不会导致成本和价格攀升。在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供给一方的限制，从被实际替代的其他选择的角度看，公共支出是没有成本的。这一简单的模型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经济系学生的教科书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为60年和70年代的政治领袖和舆论的塑造者。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简

单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依然盘踞在 80 年代的很多教科书中。

然而，早在 50 年代，就已经出现某些迹象，表明凯恩斯主义模型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搞错了。如果用常见的几何术语来表述，供给表并不是平直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即使是在存在着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多的闲置产能的经济体中，需求的增加至少会在某些部门对成本、从而对价格形成压力，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后凯恩斯主义者新发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这种关系，在 50 和 60 年代获得经验证明，从而被人们接受。菲利普斯在 1958 年对这一观点做出了明确的阐述。<sup>[6]</sup>

“菲利普斯曲线”主宰了 60 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这条曲线，或者说关系，描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消长关系。其核心思想是，正通货膨胀率导致失业率下降（或者说就业增加）。经济学家在普遍承认存在这种消长关系后，开始收敛以前鼓吹不断增加总需求以刺激经济的热情，但他们依然固守比较宽泛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大谈什么“最优”通货膨胀率。他们所依据的观点是：在政治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中，通货膨胀与失业间的权衡取舍只要与菲利普斯关系所表明的权衡取舍相吻合，就实现了最优。轻微的通货膨胀，似乎不过是为实现就业和产出增长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并没有出现 60 年代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事情。利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失业的权衡取舍中的时间维度。确实有一些经验证据显示，非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sup>103</sup>上升，能够导致就业的暂时增加（失业减少）。然而，一段时间后，就业（和失业）似乎又会恢复到自然水平，它基本上不受现在预测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是由经济的结构特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业的空间分布、特定雇员群体的技能水平、最低工资和工会限制、失业水平、残疾、退休补贴等众多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借助某种来自于最优化选择并予

以维持的通货膨胀率，不能实现就业永久的、持续的增长。

至此，我们简单勾画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不过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一旦有人告诉参与政府决策的人，轻微通货膨胀是提高就业的办法，即使事实证明这样的刺激效果只是暂时性的，这些人也会经不住诱惑，去重复以前的做法，制造第二轮通货膨胀，以换取第二波短期或暂时的就业和产出增长。政治机制中固有的短期反应的简单逻辑提示我们，政治诱发的通货膨胀会不断加速，起码要经过好多轮调整才能打住。

可以说，这就是70年代前宏观经济博弈的状态。不过，自7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发展出了更为精密复杂的政治—经济互动模型。这些模型显示，有可能出现一种非常类似于我们上面讨论高税率陷阱时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政治诱发的通货膨胀未必会不断加速，最后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在未达到这个水平前就有可能实现政治均衡。体现着现代民主制度的短期眼光的政治决策参与者内部的权衡取舍，如果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规定的通货膨胀—失业间的权衡取舍相吻合，且通货膨胀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从而确保能找到满足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解，就可以实现上述政治均衡。<sup>[7]</sup>

104 这样一种完全的政治均衡必然可以同时满足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条件。也就是说，失业处于“自然水平”，但仍然存在某种持续且完全能够预期的通货膨胀。在这样的均衡状态下，政府决策者不再有任何短期激励去制造更高通货膨胀，而且，个人能够对现有的通货膨胀率做出充分调整。

在这一完全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同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时一样高，甚至可能更高。既然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效率损失，这种完全均衡状态显然是一种非最优状态。降低或消除通货膨胀率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陷阱，因为根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预

期中的通货膨胀率的任何下降，都会导致失业的短期上升，1981和1982年的美国就出现过这种局面，并且相当严峻。政治决策参与者通常据以做出决策的时间视野不够长，无法使他们相信降低或消除通货膨胀是理性的，即使他们完全承认这种措施能使他们得到长远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集体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才会对政治参与者形成某种激励，确保让他们根据长远打算做出选择。只有当政治决策者能够确信，未来时期的政治组合不会出于短期效用的考虑重新制造通货膨胀，他才会相对审慎地行动，做出有长远眼光的努力控制通货膨胀。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这个一般性观点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辩论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似乎没有由此得出一个正确的推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必须对共同体的货币当局施加宪法限制。

## 五、公债陷阱

我们对于公共债务陷阱的讨论比较简略，因为这一陷阱的大多数特征，与我们上面考察的公共—私人贴现率差异的两种宏观经济学应用完全一样。在分析高征税陷阱时，我们没有讨论作为105  
税收来源的公债。公共借债手段的采用，显然扩大了参与政治选择者的活动空间。

即使政治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了发行公债的后果（当然这可能是个很成问题的假设，不过好在对于我们这儿的讨论这一点不太要紧），但政治活动中短浅的时间视野，会使这种筹资手段在某种开支的初期范围内较之征税更为可取，除非举债受着宪法或道德的限制。政治参与者通过借钱为当前享受的“利益”提供资金，这等于推迟了付款期。政府可以以相当于或低于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借钱。然而，由于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



的原因，政治活动中的贴现率要高于市场利率。所以从开支中得到的预期短期收益将超过短期成本，这一成本乃是按市场利率对未来预期需要偿付的税款进行折现而计算出来的当期价值。即使有人已经意识到，从长远看来，没有负债的财政结构要比负债的财政结构更可取，他们依然会认为这种计算是正确的。人们不可能放弃债务支撑的开支项目带来的收益，也不可能采取措施防止出现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所要求承受的长期税收负担。在做出目前的财政选择之后出现的政治组合，有可能彻底摧毁当期实行审慎财政政策的成果。在普通的民主政治运转过程中，个人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的根据去支持或“投票赞成”实行财政上的审慎原则。人们对利用公债做出过论证，从长远看，这些论证似乎颇为合理，而相对于这些论证，这种财政工具总是在趋于过度扩张。举债财政和税收财政之间的政治均衡会偏向于有利于举债的方向，起码以共同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为标准来衡量，税率将会太高，理由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现有公债的偿还或清偿。普通政治的参与者可能会意识到，现在清偿债务从长远看有利于共同体，但在缺乏财政约束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没有办法向人们保证，现在清偿债务确实会产生可取的长远效果。

跟前面的两个例子一样，只有对政治联盟（政府）的权力施加某些限制，使其无法抵消或破坏人们在当下做出的具有长期  
106 “投资性质”的选择的果实，才能形成某种激励，诱导参与政治的个人，按照符合他（和共同体）的长远利益的方式行事。<sup>[8]</sup>

## 六、其他例证

在对 80 年代宏观经济领域三个为人熟知的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以既醒目又简单的形式，揭示了公共—私人时

间贴现上的差异。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还有很多例子可以据此予以重新考察，下面顺便讨论几个例子。

本书作者之一在以前的著作中，曾探讨过“惩罚困境”和“行善困境”（直译为“撒马利亚人困境”，Samaritan's dilemma）。<sup>[9]</sup>它们都没有直接专注于时间贴现差异的问题。但是它们都能说明时间维度的问题，指出了对政府的权力加以约束的必要性。在惩罚困境中，实现短期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要求加大被惩罚者或犯罪分子的负效用，这样做出的惩罚要远比追求长期效用最大化策略所做出的惩罚更严厉。短期效用最大化政策的结果是“纵容犯罪分子”；犯罪行为增加，我们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真正长远的眼光要求增加惩罚的确定性和严肃性，然而，除非民主政治的参与者能够确信，未来的政治组合不会推翻目前的改革，否则人们就会觉得，进行这样的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仍然会高于可能得到的长期收益。

用“行善困境”可以解释现代福利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某种短期最大化策略要求人们关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穷困无助的人所遭受的再明显不过的痛苦。这样的策略要求政府以财政资金提供补助，尽管人们也意识到，增加转移支付从长远看将导致穷人数量的增长。对转移支付的条件采取严格限制的策略，从长远来看将提高人们自力更生的精神。然而，除非参与今日政治的个人能够确信，未来的政府也会坚持这种策略，否则实行这种严厉政策有可能让人觉得过于冷酷无情。

## 七、结 语

本章主要是以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问题为例，试图从现实的角度论证对集体性单位或政府的活动加以有约束力的限制或规则的基本逻辑或理由。我们根据人们——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用于公共选择和私人选择的时间贴现率之间存在差异的观点，来说明政治仅仅考虑暂时或短期收益，这种倾向是不受约束的多数至上政治内在固有的，也是其他类型不受约束之政府决策程序所不可避免的，而对于长期考虑的相对忽视所导致的结果，是共同体中的任何人或集团所不想看到的——这也正是“陷阱”或“两难困境”这两个词的用意。简而言之，现代政治中的短视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帕累托最劣”。

#### 注释：

- [1] A.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庇古：《福利经济学》), 4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32.
- [2] 根据提出的要求对征税权加以限制的论证的基础，与我们在前一本书《征税权》中根据互相对立的政治模型提出的论证的基础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我们指出，政府收入具有最大化倾向，因而税趋于“太高”，其模型是个两人博弈，而纳税人是博弈的一方。在那里，是不存在这里所分析的两难困境的，因而也没有涉及调整的时间视野之问题。
- [3] the Moors, 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公元8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进入并统治西班牙。——译注
- [4] 用简单的几何来描述，这一结果就很清楚了。尽管我们的分析中没有使用拉弗曲线，但如果用它来描述这种情形，就可以说，高于初始税率的短期的拉弗曲线或税率—税收曲线，总是位于长期的或充分调整曲线之外。
- [5] 本书的作者之一，曾与一位同事合作对“高征税陷阱”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参见 James M. Buchanan and Dwight R. Lee, “Tax Rates and Tax Revenues in Political Equilibrium” (布坎南和李：“政治均衡状态下的税率和税收”), *Economic Inquiry* 20 (July 1982): 344—54; “Politics, Time, and the Laffer Curve,” (“政治、时间和拉弗曲线”),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August 1982): 816—19;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 the Laffer Curve”（“拉弗曲线的简单分析”），paper presented at the 38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Copenhagen, August 1982.
- [6] A. W.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in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菲利普斯：“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率的关系”，*Economica* 25, November 1958: 283—99.
- [7] 参见 Finn E. Kydland and Edward C.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基德兰和普莱斯科特：“规则而非裁量权：最优计划的自相矛盾”），*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June 1977): 473—91.
- [8] 对债务困境的分析，参见 James M. Buchanan, “Debt, Demos, and the Welfare State”（布坎南：“债务、人民和福利国家”），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welfare state, Civitas, Gesellschaft zur Fo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nst, Munich, West Germany, October 1983. 其中的论证在很多方面与此处的分析相同。
- [9]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布坎南：《自由的界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ch. 8;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宪政契约中的自由》），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 12.

## 规则与公正

### 一、导 言

“公正”是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价值——也可能是现代辩论中一个暧昧不明的价值。本章旨在探讨公正与规则之间的关联，并对公正概念作一番疏理，指出它与我们的立场中广义的宪政主义契约论取向是一致的、相容的。我们的特殊主张是，公正的含义来自公正概念所适用的社会秩序的规则。讨论公正，也就是讨论相应的规则。不提规则而奢谈公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这一主张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承认公正是一种价值，从本质上说等于承认需要规则的某种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强调的这一点，是把现代关于公正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的大量讨论颠倒了过来。通常，公正被认为可以提供一种独立的标准，人们利用它来评价可供选择的各种规则或行为。这也就是说，正统的讨论专注于“规则的公正”。而在我们提出的另类概念框架中，规则变成了公正的基础：规则在逻辑上先于公正。

首先我们应当区分“公正行为”的概念与“公正规则”的概念。前者是指规则内的公正，它将公正视为在已然存在之规则所界定的制度框架中评价行为的标准。而后者则涉及诸种规则下的公正；它将公正视为评价不同规则体系的标准。尽管我们做出

这样严格的区分，但我们在这里所展开的部分论证将证明：把作为评价规则之手段的公正，视为规则下的公正的一个特例，可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公正行为的概念——不是公正规则的概念——是我们的论辩的核心所在。我们将指出，公正规则的问题大致可以作为规则下的公正的一个特例来处理。

109

那么，如何才算“公正的行为”？公正的行为就是不违犯已事先表示同意之规则的行为。在这里，同意是一个核心概念，所涉及的是对赋予规则以合法性所必需之协议——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隐含的——陈述。借此，规则获得合法性，因而也就可以成为判断个人的行为是否公正的参照点。

如果接受这一看法，则公正与其说是评价可供选择的多种规则和/或社会秩序的外部标准，不如说是相应的规则结构内在固有的组成部分。关于公正的思考所欲论证的，与其说是想全盘重构和改革规则，不如说是要对实际存在的规则做出正确的理解，消除这些现行规则中的冲突、不协调和模糊。我们可以认为，公正要求规则之融洽和谐，及扩展受规则支配之行为的范围。不过，不应认为，公正可以提供一个独立的规范，据此，可以建构一种全新设计的理想规则。共识才能发挥这样基本的规范性功能。在我们的概念框架中，规则设定公正的条件，而不是相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公正呈现出某种“非目的论的”、依赖于具体历史背景的性质。不再能够说明完全普遍的、抽象的、脱离背景的公正要求人们做什么——不管是针对行为还是针对规则的性质。公正要求人们怎么做，取决于个人恰好同意的具体规则是什么。

我们将首先讨论规则下的公正问题——即在已经相当完善的宪政秩序的框架内的公正行为是指什么。在第三节，我们将努力解释，有关遵行现行规则的公正的思考，为什么具有道德力量，不管这些规则凑巧是什么。在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将把这一讨

论扩展到不同规则之间的公正 (justice among rules) 问题上。

## 二、公正行为与应得观

怎样才算公正行为？对这一问题通常的回答是：公正就是人们被给予其“应得之物”：每个人都获得了理应属于他的东西，  
110 就实现了公正。这一回答立刻会引出无数相关问题；只有当人们的应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单独确认出来，说公正就是人们被给予其应得才是有意义的。而人们可以问，什么才算正确的应得？它是如何形成的？

然而，提出这种问题搞错了我们探讨的出发点——它们是整个问题中最困难、最普遍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妨从相反的一端开始，即首先讨论那些人们受到他们不应遭受的待遇、明显不公正的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某人因为他显然并未犯过的罪行面受到惩罚；在这案例中，惩罚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个人不应当遭到惩罚。现在，我们设想在进行赛跑，裁判由于纯粹的任性，非要把头奖颁给第四名。我们会说，这个运动员不应获得这一奖金，它应当属于跑得最快的运动员。如果其他运动员没有做任何可能导致其被剥夺资格的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第一个达到终点的运动员理应获得奖牌，任何与此不符的奖金分配都是不公正的。裁判做出的重新分配奖金的决定，不管是纯粹出于自己胡来，还是出于有计划地照顾参与者的某些与决定其运动成绩的素质根本无关的其他素质（比如美貌或种族出身），其结果都是不公正的。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不公正来自对规则的违犯——人们本来正当地期望，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参与者或相关各方。这些规则排除了某些有关事态之结局或报酬之确定的考虑；这些规则也排除了另外某些明显或预期无关的考虑。

如果考虑种种不相关的因素（比如原告准备与法官发生性关系，或运动员的肤色），或同样重要的是，无视某些相关因素（比如真正最先越过终点的人），“应得”观便受到了侵害。

因此，在公正观与现行规则的存在之间是有关联的。只要存在规则，就足以确定应得之归属，从而也可以确定参与者的行为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

这里至关重要是参与者可以合理地预期人人都会遵守规则，不管这种预期针对的是体系内的官员和管理层，还是其他参与者。如果这些预期确实是正当合理的，那么，在此基础上采取行为的个人就不应当大失所望。这一论点的基础在于下面的事实：规则提供了他人将如何行动的信息，而我的福利将取决于该人之行为。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某一具体行动，正是基于对他人可能做或不可能做什么之理解。正因为如此，如果他人没有按照要求的方式行动，则我很容易受到损害，而假定我关于他人之行为的预期是正当合理的，则我本来不应当遭受这一伤害。因而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什么东西使预期成为“正当合理的”？我们将在下一节转向讨论这一问题。

就目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下面一点即可：假如规则确实可以让人们形成正当合理的预期，则公正的问题就必然迎刃而解。从这一意义来说，规则必然是与公正密切相关的；公正的行为，大致而言，就是遵守通行规则的行为。

这一论点的另一个涵义也值得一提。我们在第一章的论证中已经指出，规则的价值就在于向每个活动主体提供关于他人行为的信息，因而允许每个主体参照自己对于他人未来行为之合理预期来追求自己的目标。据此，如果规则被不公正地执行，或个别人不按规则行事（也就是说，如果个别人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公正地行事），那么，规则就无法再提供这种信息了。规则就不再能够发挥其功能，而规则正是因为这一功能而为人珍视的。这



一论点为公正提供了一种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 的辩护。古人告诫说,即使天塌下来,也必须坚持公正,在我们的论述脉络中,可以将这句话解释为下面的要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坚守规则。公正的价值就在于它包含着具有独立价值的对规则的遵守。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解释公正,完全不同于下面的观点:具体的规则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符合客观的公正标准。

### 三、公正与信守承诺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论证,违反了正当规则的人的行为,对于那些根据他人将会遵守规则的预期而采取行动的人是不公正的。<sup>112</sup>人们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使一个规则或此一规则所导致的预期成为正当合理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规则的违反就是不公正行为?什么东西赋予如此定义的公正概念以道德力量?

我们这儿的回答并无多少出人意表之处。如果某一规则乃是受该规则支配的秩序中的参与者自愿同意的,则该规则就是正当的,违反该规则就是不公正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自愿基础上的同意,就等于做出了遵守该规则的承诺。公正的行为就是信守已经做出的承诺的行为。如果某人曾经做出一项承诺,他人也出于道德上的正当理由相信他会如此行动,但随后他却变卦,采取另一种行动,即为违反承诺。因为公正的伦理,就是信守承诺的伦理。对于这一点,重复霍布斯的两段话足矣:

……国家的法律一如赌博的规则:凡是全体赌徒同意的事情,对他们便无不公正可言。<sup>[1]</sup>

根据自然法则……出现一个第三方;正是由这个人来执

行他们所达成之契约：没有他，该契约就是徒劳的，是废纸一张……而我们也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法则是公正的源泉和由来。因为假如不事先制定契约……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做任何事情，于是我们无法判定何种行为是不公正的。假如事先制定了契约，则违反该契约者即为不公正；不公正的含义无非就是不遵守契约。凡是不属于不公正之行为，则均为公正。<sup>[2]</sup>

不过，这一表述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一个人同意了某规则，就必须遵守该规则吗？第二，如何理解“自愿达成”的协定？“协定必须出于自愿”这一必要条件如何影响人们的义务？第三，对于我们的论证目的来说，我们对“协定”和“同意”能够做出多么宽泛的解释？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只做出一个无足轻重的澄清。如果一个人自愿同意一套规则，这等于除了按协定追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外，他还承诺做更多的事情。具体而言，尽管规则一般来说都 113 包含着如何处置违反规则的行为、对这种违反施以何种惩罚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是全面的协定中必然包含的内容，但下面的说法似乎有失偏颇：协定仅仅包含着参与者愿意接受明确规定的对违反行为之惩罚。他所同意的是规则，而信守承诺的道德力量要求他承担自己对其他参与者的义务，按这些规则玩游戏。违反这些规则或许会给个人带来好处，但这种行为不是公正的，它不会仅仅因为他接受了惩罚变为“公正的”。“公正行为”的含义就是信守向其他参与者做出的承诺，也即遵守自己已经同意的规则。比如，在美式足球比赛中，一个球员拳打另一球员，就必须罚其后退 15 码。但他也会因为做出了“不公正”行为而承受道德上的自责，人们相信，这种纯道德因素——球员的公正感——对于抑制他的粗暴行为，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在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个体是否选择遵守规则，就跟在饮料机前选择饮料是一回事，即个人要么选择遵守规则而不用遭到惩罚，要么选择不遵守规则，并承担规则中所规定的、这样做带来的代价。然而，立法规定的惩罚不仅仅是个人为其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它还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人犯了“错误”。在不同饮料中做出一个选择，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行为；而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中做出选择，则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行为（最起码在规则的合法性源于选择者的事先同意时，它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行为）。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协定是真正出于自愿的。显然，一个人在被胁迫状态下做出的遵守规则之承诺，并不具有个人在自愿状态下做出的承诺所具有之约束力。一个人在遭受绑架时承诺，用自己的银行存款支付 100 万来换取自己的性命，但后来拒绝付款，这种情形不同于未满足他人之完全合法的预期。同样，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为了换取一块面包而承诺去冒非同寻常之风险，人们不能够坚持要求他信守承诺，尽管我们可以说，比起他身处逆境依然拒绝做出那种承诺来说，他要承受更多约束。换句话说，如果做出承诺的环境中存在着非自愿因素，则促使该人信守承诺之义务的道德力量就大打折扣（但未必完全灭失）。

- 114 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这一论点随意扩展引申。有人说，假如交易各方的交易实力不完全均等，则其所达成的协定就是不自愿的，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牵强。上述论点所说的是：只有在极端受胁迫状态或真正的暴力强制状态下所做出的同意，才对同意者没有道德约束力。比如，如果 A 和 B 同意结婚，我们通常并不会说，只有他们的交易实力或婚前“恐吓策略”或经济地位或容貌或体力（总之每人带人婚姻生活中的一切因素）

完全均等（或者哪怕不是过度地不均等），他们所交换之婚约才具有约束力。我们一般不去追问，A 和 B 是不是胁迫对方做出了婚姻承诺，或者是否可能进行过这种胁迫。只要不存在极端的胁迫，就足以赋予该“契约”以道德力量。事实上，即使婚姻是出于父母之言，人们通常也并不认为可以据此完全撤消婚姻关系中所蕴涵的道德义务（有时甚至根本不能弱化这种义务）。

澄清这一点相当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们打着“自愿性”的旗号，为一种很怪异的“公正”观大开方便之门。在有些文献中，“遵守”协定的“公正”，完全取决于现状是否公正，而后一种“公正”观通常会参照各方的相对收入状况。我们强调，在我们的概念中，同意的自愿性不能作如此解释。只有在做出的承诺不具备约束力的条件下（一方通过暴力手段或存心欺骗使另一方做出的承诺），才可以放弃我们所定义的公正要求。

这种公正观容易引起的第三个一般性问题是，能够形成多么广泛的对规则的同意或认可。显然，在绝大多数社会环境中，参与者并没有公开地同意适用于他们之相互关系的规则。比如，开汽车的人并没有通过明确的一致同意来制定道路规则。那么，怎样才能让信守承诺的考虑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呢？这一问题一直是所有“社会契约”理论探讨的核心所在。有些学者试图证明，公民们有一种遵守现行社会秩序之规则的推定性义务，<sup>[3]</sup> 根据是，人们“应该会同意”这一规则。<sup>[4]</sup>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sup>115</sup>以确定这样的义务，并据以衡量个人行为是否公正。然而，这样一种纯属假设的同意，似乎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我们完全不清楚，一个人凭什么要受他并未做出之承诺的约束，或我们怎么能够仅仅根据这些规则能使他的境遇得到改善的假设，得出他已经同意该规则的解释。

然而，默会的或隐含的同意，则是另一回事。所谓默会的同意是指，只要他们自愿参与游戏，即可认为他们默会地同意了游

戏的规则。只要参与者确实可以选择不参与这一游戏，那么，他们参与这一游戏本身，相当于他们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他们必须承担遵守规则的义务。那么，假如他不遵守规则，其他参与者就可以视之为“不公正”。只要所有玩家都是自愿参与的，参与者预期其他人会按规则游戏的想法就是正当合理的。比如，如果有人要求加入一场正在玩的牌局，并获准加入，那么，从遵守规则之公正的角度看，他所承担的义务一点也不少于曾经公开同意规则的其他玩家。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秩序中的另一重要群体——规则的管理者。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法官、裁判或执法者公开同意规则结构，只要这些人违反规则或为了一己私利而修改规则，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我们可以推定，监督赛跑的人已经接受了谁先到终点谁获胜的规则。执行法律制度者也必须在该制度之规则框架中活动。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参加“游戏”的人，都是基于其对规则的理解而加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则之存在本身就等于规则执行者向所有参与者（实际的和可能参与的）做出了隐含的承诺，他将忠实执行规则。

如果参与体育比赛或室内游戏——不管是当玩家，还是当管  
 116 理者、裁判或执法者——就足以赋予所有参与各方以遵守规则的  
 义务，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基于公正的考虑而将这种义务推广到  
 各种社会情境中？我们是否可以说，个人如果参与某一给定社会  
 秩序，他就是个自愿参与者？对于规则的管理者和自愿加入者  
 （比如自愿移民）来说，似乎显然会承担这样的义务。当然，问  
 题是，这里所玩的游戏，实际上是“独此一家”。人们可能没有  
 更多可以选择的余地。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  
 说，违反规则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意  
 义上的公正为何，值得略加讨论。假定  $A$ 、 $B$  以至  $N$  都是某一游  
 戏的参与者，而其规则是由  $Z$  单方面确定的。而且假定，大家

都已经注意到这些规则—— $A$ 、 $B$ 一直到 $N$ 等人都曾按这些规则玩游戏。如果 $A$ 现在由于违反规则而给 $B$ 造成伤害，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B$ 不应当受到伤害？在这一意义上看， $A$ 对 $B$ 的伤害难道不是不公正的吗？ $B$ 预期 $A$ 会遵守规则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预期难道不合理吗？这样的规则已经长期通行，这一事实本身难道不能赋予 $B$ 的预期以合理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由于他们的活动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长期遵守那些规则，规则已经获得了默会的同意——即使他们并没有其他游戏可以玩，即使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是不自愿的。当然，作为遵守现有规则之义务的来源，这种默会的同意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做出改进规则之努力。不过，这已经属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的范畴了。

那么，根据上面的讨论，对于规则与公正间的关系，我们能得出哪些结论？我们的结论是：通行的规则，仅仅因其存在，就能散发出公正的气息。与现有规则相抵触的行为，就可以被算作对社会舞台上其他参与者的不公正，因为其他人已经形成了正当合理的预期：所有人都会按规则行事。至关重要的是预期的正当性而非合理性，而这种正当性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参与该规则所规范之活动，就是出于自愿或可以认为是出于自愿。自愿参与等于同意规则。它构成遵守通行规则之默会的承诺，而违反这一承诺就是不公正的行为，因为对于他人来说，这是其所不应遭受的。

117

#### 四、规则间的公正

尽管前两节对公正行为的讨论与当代社会哲学中的观念有若干密切关系，不过它并非研究“公正”的最常见的思路。人们通常把公正作为评判不同规则或制度的标准。很多规范性政治、

社会理论都是将公正作为评判标准来使用——从自然法到由此概念发展而来的“分配的公正”、“社会公正”等现代概念。<sup>[5]</sup>因此，大多数人认为，是公正约束规则，而不是规则约束公正。

本节我们将提出一个命题：确定何种规则是公正的——也即让公正成为人们对不同规则进行选择的标准——这样的事，不过是在通行规则下进行抉择的一个特例而已。这一论点要求我们承认：关于规则应当是什么的决策，只能根据适用于从不同规则间作出的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做出。这种更抽象层面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那么，从早先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筛选过程符合公认的元规则，那么，从中筛选出的规则就是公正的。

尽管这一点完全是对霍布斯观点的一种自然引申，不过，我们这里与霍布斯只有部分的一致，至少从霍布斯的阐述的严格意义上说是这样。在霍布斯看来，“不公正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说法。他声称，“没有任何法律会是不公正的。法律是由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制定的，而这类权威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全体民众所批准和拥有的；每个人都可能做出相同的选择，因而，没有谁可以说它是不公正的”。<sup>[6]</sup>然而，霍布斯的讨论表明，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是否同意至上权力的原则。它是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对政治秩序的结构的不同意，从这一结构中形成的法律就是“公正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就宪政主义方法的本质而言，政治行动（包括法律之形成）是按一定的规则（或元规则）展开的。因此，“公正的法律”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公正的法律就是在获得同意的制度下形成的法律，或者换句话说，公正的  
118 法律就是不违犯这些制度运行于其中的获得同意之规则的法律。

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弱化了公正行为的必要条件。在此之前，只要行为没有违犯与该行为相关的获得同意的规则，它就被称为公正行为。现在，只要行为不违犯公正规则（即在

获得同意的元规则之下形成的规则)，就可以说它是公正行为。由于我们所讨论的元规则并不要求对规则直接表达同意，因而，“获得同意的规则”与“公正规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使一条规则具有约束力，我们不一定需要该规则获得同意。如果规则是在获得同意的元规则之下形成的，那么，该规则不需要经过同意，也可以具有约束力。

对获得同意的规则与公正的规则所做的区别——即承认同意可适用于不同的抽象层面——会使有关公正之必要条件的讨论变得较为复杂。我们将在第五节努力澄清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想强调另一个问题，即抽象性与自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规则内部的公正要依乎规则是否已获得自愿同意而定，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在比较抽象的元规则层面上“自愿同意”概念的含义。如果一致自愿同意的对象是元规则，“自愿同意”是什么意思？比如，在那种元规则层面上，不是出于自愿的一致同意会有什么结果？

事实上，随着讨论进入越来越抽象的层面，要求我们修正关于同意的自愿性之考虑——最起码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需要做这种修正。我们当然可以从原则上设想，在元规则层面，一个人对他人施以直接的肉体强迫。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从根本上看，使用暴力是否可取。在厚重的罗尔斯无知之幕后，个体完全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境遇这种极端情况下，个人是没有利益需要捍卫的。某个人之所以喜欢一套规则而不喜欢另一套规则，其理由恐怕在于其他人也都喜欢这一套规则。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个人将会或能够为强迫他人找到理由？

而且，我们必须谨记，在这一抽象层面，众多主体将会乐于维护自愿达成之协定，这有充足的理由：正是这种确立道德义务的自愿达成协定的能力，推动着整个“宪政事业”。人人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宪政秩序，使自己能置身某种恰当的环境中，以追



求自己（设想中的）未来的生活计划。如果强加的协定不能使  
 119 规则具有合法性，它也无法树立起遵守规则的道德义务；因此，  
 强制达成之协定是没有意义的。

此外，在这个最抽象的层面上，诉诸极端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宪政现状——它可以被用来质疑“自愿性”条件——中的相对地位的一般关切，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个体对自己的未来境况全然不知，他们就没有各自明确的利益；所有人的境遇是完全平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成的协定也不大可能反映现有地位方面令人无法接受的差异。因此，人们在达成的协定中表达自愿性要求的愿望无论多么正确，随着人们在规则形成活动中进入抽象越来越高的层面，全部必要条件获得满足的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大。这一事实可能是证明整个“宪政主义”立场之正当性的主要理由。

## 五、公正的规则，获得同意的规则与公正的行为

上一节的核心观点是：规则间的公正不过是曾被清理的规则下的公正之一例。这意味着，元规则间的公正是一个元元规则下的公正问题，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则下的公正就成为范式性的事例。研究人际互动关系中的公正，也就是考察就这一互动关系所达成的协定，或这一互动关系赖以发生之规则所达成的协定。

这一论证路径要求我们厘清两种规则之间的区分，其一是以上所定义的“公正”规则（即从获得同意的制定规则的程序中产生的规则），其二是获得同意的规则。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公正行为或规则下的公正这个范式性概念，允许我们把公正行为的定义扩展到既包括那些遵守获得同意的规则的行为，也包括公正的规则所界定的行为。

为说明这里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场相当重要的网球赛进行到第五局，即决胜局。A 以 5 比 4 的比分领先，现在轮到 B 发球。裁判突然宣布修改规则：球网要升高一尺。B 抱怨说，规则的这种变动“不公正”，他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或 A 不应当获得这种不期而至的照顾，这种说法难道不 120 是很正当的吗？根据前两节提出的论证，看来 A 和 B 确实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决定参加比赛时曾经默会地同意的规则，现在却变了。他们并没有隐含地承诺遵守新规则，因此，即使他们违反这样的规则，也不能指责他们的行为不公正。比较而言，A 曾经默认的规则由于 A 受到了照顾而遭到践踏；B 则受到不公正对待。

不过，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过于匆忙。我们必须问，这里对规则的改变是否符合公认的元规则。比如，假定是一个章程健全的组织，如世界网球联合会，严格依据其程序规则决定提高网球比赛中球网的高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世界网球联合会的这一决定是提前做出的，并规定它将于 1985 年新年的子时生效，而 A 与 B 之间的比赛是 1985 年澳大利亚网球锦标赛的决赛，比赛执行世界网球联合会的规则，并在新年前夜举行。然而，比赛超出了原定时间，在第五局，比分为 4 比 5，当轮到 B 发球时子时来临。在这一案例中，由于 A 和 B 都注意到了未来的规则变动，也可能预期到比赛将持续到子时，A 和 B 两人都会理性地服从新规则。

但是，如果世界网球联合会没有事先宣布这一规则，裁判仅仅是在子时通过电话得知规则变动，那么，就不能认为新规则获得了 A 和 B 的隐含的同意，他们也可以不接受该规则之约束。但如果联合会的行为从程序上说是“公正的”——也就是说，遵守了约束规则制定行为的获得同意的元规则——则修改规则并不是对公正的践踏。只要忠实执行了现行的元规则即可。这里的

要点是，我们可以认为，*A* 和 *B* 所默会地接受的，不仅是游戏的规则，还有元规则——事实上，就是一整套抽象程度各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规则体系。这一元规则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规则是可能改变的，修改规则只要合乎此一元规则，即可被认为是公正的。球员一致同意规则有可能被修改，就像天气总会变化一样。不过，与天气变化不同的是，规则的变动是人的行为的产物，因而需要接受“公正”的详细审查。人们争论的问题是，规则的制定者改变规则的行为，是否妨害了人们的正当预期？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只要他们遵循了相应的元规则。不能对规则做任何修改的要求是一条可能的元规则，但它不是现行的元规则，盲目遵循禁止修改规则的元规则是不公正的。比如，尽管元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裁判应当改变球网的高度，但他却拒绝执行，那么，*B* 就得到了不应得到的好处，而 *A* 则丧失了他本不应丧失的优势。

在政治经济领域，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设想一下下面的案例：政府实行限制进入某一产业的管制，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化。现在假定，过了一段时间后，政府取消了这些保护性管制，个人会丧失收入，而且蒙受损失的人未必是以前获得收益的人。那些购买了纽约出租车牌照、并由于牌照数量增加而蒙受损失的人，未必就是从牌照制度中获得收益的人。人们有时会据此认定，政府的活动是“不公正的”，不管是取消管制，还是最初实行管制，都“不公正”。同样，人们也经常指责政府对政策变动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是不公正的，这样的行为对于最终买单的纳税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然而，如果从规则内部的公正的角度看，这些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只要在上述案例中，政府的活动本身符合约束公共部门行为的现行的、公认的规则，那么，这类活动就并没有违反公正原则。事实上，现代政治制度似乎有着这样的安排：分配政府收入

的人多多少少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或出于政治考虑来分配这些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断言政府违反了公正原则。指责政府的行为不公正，就得证明政府违反了获得同意的公共行为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对公正做出正确的论证。

不过，在社会领域中，规则可能常常是不明晰的。比如，人们会怀疑，管制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是否等于“获取”，因而违犯了现有的宪政规则。人们也怀疑，在有些案件中，司法解释是否改变了规则，从而引起了法院在整个宪政秩序中的正当角色是什么的问题。此外，某些规则可能在同一个抽象层面上与另一些规则重叠，但蕴涵着不同的行为约束。在这些情况下，要弄清何为公正，需要澄清规则，解释其模棱两可之处。在澄清这些规则时特别要重视同意所针对的抽象水平。不过，起码我们讨论公正的理路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还想强调一下另一个可能引起歧义的问题。对于在规则结构之外达成的协议，我们赋予其何种地位？显然，如果同意该协议的个人包括了构成政治秩序的全体人士，那么，就不能认为这样的协议违犯了公正原则。但如果这两组人群并不重合，那么，这样的协议就可能是不公正的。也就是说，获得同意的规则之结构可以排斥某些类型的协议。

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澄清简单的二人市场交换在我们的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交换的双方自愿同意交换条款。如果一方后来没有满足那些条款，就可以推定，他的行为对另一方是不公正的。但是这种有关其行为不公正的推定只能是一种推定，因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更具包容性的一套宪政规则明确地排除少数人进行的某些类型的自愿交易，或者说已经明确地树立起某种义务，而少数人的交易要求各方承担的义务却与其构成冲突。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下面的情形：某个行业的企业通过达成协定、以自愿加入的方式组成一个卡特尔，其目的是限制外人进入

该行业，降低产量，从而抬高价格。现在假定，同意该协定的一个企业食言，降低价格，以牺牲其他企业为代价获得高额利润。那么，这一破坏卡特尔的企业行为是否对该行业中其他企业“不公正”？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更具包容性的宪政规则对卡特尔共谋施加限制的话，那么该企业这么做也减少了它对该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的不公。在这里，在有关公正的考虑中出现了冲突，这十分类似于A与B、C分头签订协议，但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这两个协议发生了冲突。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协议出现冲突，关于公正的考虑并不能揭示哪个协议是决定性的，但在卡特尔案例中，我们显然可以推定，宪政规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对霍布斯的论述作一些发挥是恰当的。“凡是<sup>123</sup>全体赌徒同意的事情，则对他们便无不公正可言”，这一论断尽管正确，却没有排除下面的可能性：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赌徒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它是否公正取决于同一个基本原则：赌徒是否事先与其他具有或应当具有更大发言权的代理人达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协议。

## 六、结 语

本章旨在对公正的性质做出阐述，它是我们的宪政契约论立场的自然产物。我们明确地将公正定义为不违反获得同意的规则之行为。这一思路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公正并不是“第一位”的概念。相反，它源于两个有着逻辑优先性的观点：首先，协议中包含着遵守协议条款的道德义务；其次，诉诸制度背景内部生成的公正，公正的意义是由这一背景赋予的。

这一立场也为讨论“公正”提供了一种理路。具体而言，对公正的考察，既是价值考察，也是事实考察。约束某一行为领域的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获得同意了吗，或者说可以认为它们

已经获得同意了吗？这些都是有关事实的问题。当然，还存在着价值问题：协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同意该协定的人？但是，从原则上说，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思考公正来解决。只有接受了自愿同意的效力，才能谈得上公正。

最后我们应当强调一下，本章的目的是很有限的。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将公正概念与社会秩序的规则联系起来。然而，这一论证的性质使我们必然危险地触及深奥的哲学研究领域，而对于这一领域，我们想说，我们实在是力所不逮。因此我们应当表明，我们不敢妄言对公正本身的分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这一核心论点，对于我们的全部论证过程，以及在我们看来，对于正确理解公正概念，有着重要意义。不管是博学的哲学家还是凡夫俗子，在讨论公正时都把下面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是在某种规则结构中展开的。要考虑公正问题，就得研究规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相信，公正是行为或社会秩序的可取的属性，就等于间接地论证了“规则的理由”——也论证了从宪政主义或强调规则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生活，有着独立的必要性。

### 注释：

- [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霍布斯：《利维坦》) (1651), New York: Everyman Edition, 1943. part 2, ch. 30, p. 185.
- [2] 同上书, p. 74.
- [3] 这正是霍布斯撰写《利维坦》的目的所在。
- [4] 见罗尔斯等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传统的学者的著述。参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罗尔斯：《正义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5] 我们在第八章从宪政主义立场讨论了分配公正。
- [6] Hobbes, *Leviathan* (霍布斯：《利维坦》), part 2, ch. 30, p. 185.

## 第八章

# 无规则的政治

## 第二部分：分配公正与分配政治学

### 一、引言

在第七章中我们讨论了规则与公正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对公正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要以规则的存在为前提，我们还认为，当人们遵守相应的规则时，就会出现公正的结果。

无论是在经济学圈子还是在更为广泛的圈子里，这种公正观不是常见的。正统的公正观概念有赖于分配公正的理念，或“平等”的理念。按照这一看法，结果是否公正，取决于结果本身内在的固有特性，而且是独立于具体场景的。确认一种社会分配结果是否比另一种社会分配结果更“公正”，只要搞清楚个人在这些结果中的相对状况就可以了。衡量个人相对状况的标准方式，是参照个人的收入或财富，虽然有时某些“关键性”消费品（如医疗、住房、食品或教育）的消费或获得被认为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更好的指标。

我们这里的目的是不是批评这种大家熟悉的分配公正概念；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要把做出某种解释的“平等”或“较少不平等”的规范意义视为既定事实。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从宪政角度评估分配公正的概念。我们的任务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平等是可选的这一规范判断，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助于保障这

种“平等”（或者“较少不平等”）？是否有理由相信，政治秩序能够比自由市场规则创造出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正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规则”有可能导致更“平等的”结果？

然而，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提出这些问题时采取了一种与正统观点完全不同的分配公正观。因此在开始我们的讨论时，我们将首先阐明正统观点，并揭示宪政主义观点引起的另一些关键问题。此外我们还要说明，根据我们的判断，正统观点在分析上有何逻辑缺陷。

## 二、分配公正：传统观点

说明分配公正的规范概念的特征，就要提出并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部产品应当如何来分配？这里要考虑某种总量的所有可能的分配，要采用某种标准来选出“最优”分配。一个常见的比喻是在相互争夺的儿童中分配一个馅饼，假定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一份。举例来说，设想有一个由  $J$  和  $K$  两人组成的社会。借助于简单的几何图形可知，所有可能的分配方案由图 8.1 中的直线  $JK$  来表示。人的吝啬性使该共同体的总量呈现为  $OJ$ （与  $OK$  相等），既可以把它全部分给  $J$ （位于  $J$  点），也可以把它全部分给  $K$ （位于  $K$  点），或按不同的比例在  $J$  和  $K$  之间进行分配。我们用  $J$  的份额与  $K$  的份额的比率来表示分配结果。例如在  $E$  点，我们可以把从原点到  $E$  的斜线的斜率，即  $S_E$ ，来表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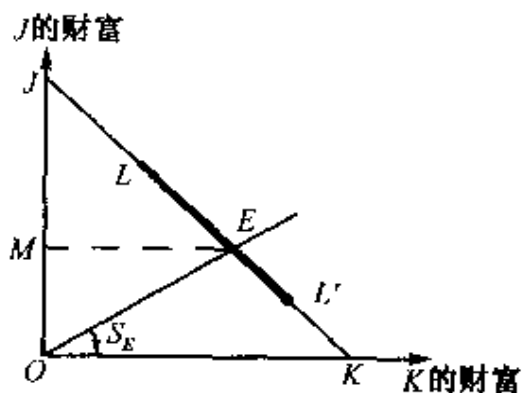


图 8.1



一比率。对分配结果的其他衡量方法，也可以是  $S_E$  与 1（表示平等）之差，或不同水平的变量，或更穷者所分配到的数量（在  $E$  点上是  $OM$ ），或更复杂的方法。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从规范的角度大体可以假定平等为最优。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可能难以提出理由为平等以外的任何结果辩护（尽管提出理由为平等辩护也非轻而易举）。

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典型观点是，这种描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存在缺陷：第一，这个馅饼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相反，它已经被分割过了，每一块的尺寸是由不同的个人的相对生产能力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在  $JK$  线上有一个点（让我们设为图 8.2 上的  $Q$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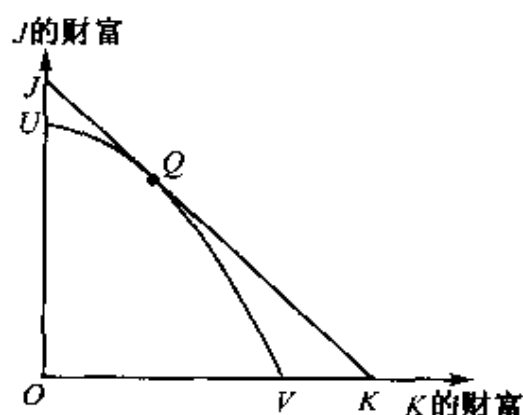


图 8.2

它代表既成事实，通过某种手段进行的再分配只能以这里为起点。第二，随着再分配的发生，馅饼的大小也发生变化。一般的假设是，当我们离开  $Q$  点时，馅饼会随着征税和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税产生的“额外负担”而加速缩小。这样，相关的可能性边界就变成图 8.2 上的  $UV$ ：只有这条曲线上的点是可能的；而在  $JK$  线上，除了  $Q$  点以外其他点都是不可能的。在认识到这种现实后，规范的分析就成了对如何在馅饼大小和馅饼分配之间加以“权衡取舍”的分析，由此出现了著名的“公正—效率”之间的冲突。这样，“政策问题”就表现出两个维度：一是如何组织政策手段的落实，使用馅饼来计算的实现理想分配的成本最小化；二是决定为使馅饼尽可能大，应该牺牲多少分配公正。

### 三、宪政主义视角和制度影响

对分配公正的这种典型描述存在若干不当之处。首先考虑概念化的哲学问题。作为一种思考人们的分配目标的一种抽象方式——即赋予分配公正观以涵义的方式——这种推测式模型大概是十分天真的。人们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让我来分这个馅饼，我会怎样做？”但这个问题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分配公正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呈现为这个样子。它暗示着分配是由某个惟一的代理人或根据某种决策规则来选定的。

但是，分配并不是选定的。社会结果有其“内置”的分配特征，它产生于个人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其中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一组现行规则下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当然可以设想，现行规则允许某个行动主体选择结果（或特定的分配结果）。彻底的专制制度并非不为人知。这就是道德和社会哲学家在处理分配公正问题时未明言地假设的政治模型吗？经济学家在把抽象的哲学思考带入“相关的”政策层面时，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其实就是这种政治模型。但是，如果分配是由一个独裁者选定的，图 8.1 中的模型就完全不适用了。这时相关的社会背景就不能只有两个人，而是有三个人。除了对馅饼提出要求的  $J$  和  $K$  以外，还有一个切馅饼并进行分配的  $H$ 。假如我们将  $H$  界定为与  $J$  和  $K$  一样，都是对馅饼有着相互冲突的需求的人，那么  $H$  就会将整个馅饼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  $H$  对  $J$  和  $K$  有着利他主义的关切，那么按照行为对称的假设，我们也必须把  $J$  和  $K$  界定为这样的人。这样，图 8.1 中所表示的分配状<sup>129</sup>况就会从  $JK$  下降到  $LL'$ ，因为在那些界限之外的分配涉及能使  $L$  和  $L'$  得到保障的各方之间的自愿转移。同样，可以假设  $H$  能够在其善心允许的范围以内向  $J$  和  $K$  做转移支付，就像一开始所

有的产出都给了  $H$  一样。换句话说，就单方面的分配结果的选择而言，对任何分配公正问题的理论解释实际上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分配现状就是选择者占有着一切。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使得分配公正难以实现。此外，任何最小国家条件下自由市场的分配，即图 8.2 中的  $Q$ ，似乎肯定要比使再分配成为可能的情况更为平等。由此可见，分配公正的考虑似乎有利于说服人们接受这样的规则，它彻底禁止把任何转移支付的权力赋予政治机构。

当然，对这些批评意见可以立刻回答说：并没有预先设定的专制者模型。授予政治代理人转移支付的权力，并不等于无条件地授权他们把政府收入用于转移支付。政治代理人根本不能把收入转移给自己。但是，如果情况如此，我们就要问问其中的原因。换言之，我们必须搞清楚政治代理人在分配馅饼时受着怎样的约束。这里的相关约束不是人们所熟悉的“经济”约束，即公共转移支付的活动水平上升时馅饼尺寸必然发生的变化。相关约束是那些包含在政治博弈规则中的约束，这些规则决定着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方式。更一般地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小国家”中的制度安排，到表现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其中缺乏对转移支付权力的明确制约），会产生分配结果的不同格局。政治实践的问题就是选择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它会产生最符合分配公正要求的分配格局。

这里的要点是效率分析语境下人所熟知的要点。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归因于公共产品，普遍的外部性，以及私人产品供给中的垄断因素），尽管足以表明存在着交换无法实现的收益，但是现在人们广泛承认，这不足以成为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  
130 规范性理由。下列预设并非必然成立：仅仅因为市场不完善，政治过程就可以运作得更好。相反，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告诫我们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政治过程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能

力。从规范角度看，重要的是对两种不完美的制度进行比较。只观察到这种或那种制度是不完美的——如市场“失灵”——不足以成为赞成政府“干预”的理由。至少从原则上说这已被很多人接受，尽管似乎仍需要一再说明。

然而，在实现分配公正方面，似乎也存在极为相似的要点，虽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要点就是：只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所引起的——或假设由它引起的<sup>[1]</sup>——分配而悲伤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证明这种有关分配的政治过程是向着平等的方向发挥作用。或者以更为直率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朝着平等方向的运动从制度上说具有可行性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存在大量有关分配政策的文献，却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基本问题，更不用说做出回答了。<sup>[2]</sup>宪政主义视角的优点就在于，它把这个问题牢固地置于舞台的中心。它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把规范性研究的领域，从可以想象的各种收入分配，转向可以产生收入分配的各种具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

在我们看来，这里有必要进行某些“制度后果归宿分析”。比如，考虑一下人们很熟悉的正统公共财政学中的税种后果分析。假设把“政策制定者”理解为可以选择若干税种：啤酒消费税、土地税和法人利润税。在常规条件下，人们大概可以问，征收啤酒消费税而不是等值的土地税，会对分配结果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群体（如啤酒消费者、啤酒产业内部的特定生产要素等）“所承受负担”以及其他群体所减少负担，来<sup>131</sup>衡量这一税种替代对分配的影响。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运用分配公正的规范标准来判断哪些税种替代是可欲的，以及征税手段哪一种组合为“最佳”。就现有的税收手段而言，只有某些分配结果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分配结果与理想相符。正如我们所强调的，这种分析方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任何税种的选择都是来自这样一个政治过程，只有当

“分配公正”服务于那些在政治博弈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利益时，它才能够得到保障。不过，这一分析方法确实承认，并非所有的分配都是可行的，在提供任何规范性建议之前，必须确定不同政策工具对分配的影响。至少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规范性评价的对象是不同的税种，而不是不同的分配结果。这里我们将这种认识提升到一个更为适当的论述层面。我们不讨论不同税种对分配的影响，而是关注不同的规则体系对分配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不同制度的“后果”归宿。

#### 四、不受限制的多数主义的影响

在本节和后面的各节，我们尝试推导出在受着各种制度限制的多数规则下预期会出现的分配结果的格局。<sup>[3]</sup>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政治制度理解为就是我们大体上所了解的样子，然后提出以下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任何理论假设，同比如说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相比，政治过程倾向于产生更大的“分配公正”；第二，对政治制度的运行采取哪些限制，可能有助于人们对“分配公正”的追求。我们自始至终只讨论一种极为简单而又高度抽象的多数规则模型。

- 132 具体说来，我们要讨论一个简单的三人社会，它由 A、B、C 三人构成。<sup>[4]</sup>三个人都有投票权，而且假设他们在投票时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sup>[5]</sup>这里不存在利他主义，他们的目标都是最大化自身的实际收入。<sup>[6]</sup>我们把一个周期的长度界定为两次选举相隔的时间长度，因此不言自明，每个周期内只有一次选举。最后，为了集中关注多数规则造成的分配结果，我们取消政府可能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假定政府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转移支付。<sup>[7]</sup>由于我们只关注所产生的分配，我们把全部结果描述为

$[a, b, c]$  这种三要素组合的形式，其中的  $a, b, c$  分别是  $A, B, C$  三人各自的全部收入。

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完全“自由的”市场秩序下的分配所呈现出的概念性参照基准。没有发生任何转移支付，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转移支付。这种分配格局反映着每个个体的不同的生产能力、承受风险的意愿、积累偏好和历史背景。因此一般而言，我们不能期望这一结果能反映分配平等。我们用矢量  $M = [m_a, m_b, m_c]$  来表示这种“从自由市场中产生的分配结果”，其中  $m_i$  是第  $i$  个人的“市场分配结果”。设  $A$  为最富有者， $C$  为最贫穷者，于是  $m_a > m_b > m_c$ ，全部  $m$  之和就是大体上用常规方法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模型的一般性不会有所减少。

现在让我们引入政府从事转移支付的前景，假定多数规则是惟一有效的约束。作为起点，考虑所有的转移支付都是“一次总付”，也就是说，可以任意对总收入实行没有任何损失的再分配。这样，总货币收入（以及总的财产存量）不会受到转移支付过程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假定最初  $B$  和  $C$  组成一个决策联盟<sup>133</sup>。于是，很明显，他们将理性地拿走  $A$  的全部收入（和财产）。如果不这样做，就失去了多数无需成本即可占有或偏向于占有的收入。于是，出现的结果将是  $L = [0, l_b, l_c]$ ，其中  $l_b + l_c = Y_M$ 。但是请注意，这种结果是不稳定的，到了下一轮选举，这一结果  $L$  就会失效，假定  $A$  和  $B$  又结成联盟，就会形成  $J = [j_a, j_b, 0]$  的结果，其中  $j_b > l_b$ ， $j_a + j_b = Y_M$ ；或出现  $A$  和  $C$  的联盟，形成  $k = [k_a, 0, k_c]$ ，其中  $k_c > l_c$ ， $k_a + k_c = Y_M$ 。肯定总会存在着在三方中使境况得到改进的两方结盟。这是在公共选择理论（或博弈论）中常见的情况，即在多数规则下每一种结果都会被另一种结果打败。没有哪一种结局有着内在的稳定性。我们可以预期，随着多数联盟的构成发生变化，会出现持续的“循环”。然而，无论多数联盟的组成如何，所有的结局都会表

现出相同的特征：少数方成员的收入总是趋于零；转移支付总是被推进到等同于没收的地步。

我们应当注意到，占优势的多数联盟中的成员，有着达成维持联盟的有约束力协议的激励，因为当他们达成这种协议后，他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期避免自己收入为零的概率为 50% 的风险。当然，拒绝单方面破坏联盟是理性的。只有当一个人现在的同伙决定破坏协议时，他才会遭受损失。但是，尽管联盟面临着受到破坏的持续压力，以下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一个特定的少数会在多选举期的漫长过程中受到系统的剥夺。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有三个一般性要点需要说明。第一，给定所有转移支付为一次总付这一假设条件，显然，作为“基准”的税前即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分配完全无关紧要。每一个人在任何多选举期时段中，都有着预期的平均收入  $1/3Y_M$ 。没有谁内心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富有”。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储蓄偏好或冒险偏好的差异，对分配结果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甚至作为相关的起点也是如此。也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某人“拥有”任何东西，除非他能够从政治过程本身取得的东西。个人取得的东西，  
134 只在当前选举期结束之前属于他。在这里采用简单的切馅饼比喻再恰当不过了。馅饼的尺寸是固定不变的，就看大家如何争夺了。

第二，由于每个时点上多数派的具体成员构成难以预测，因此每个人在未来的选举期自然有着相等的预期收入，即  $1/3Y_M$ 。从规范解释的角度说，这种预期收入的平等化本身可以被解释为实现分配公正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对于这种平等的预期收入，必须根据如下事实来评价，即在选举期的任何一个时刻总有一方的收入为零。此外还有这样的可能性，某个特定联盟会在多次选举中变得十分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将面对在多个时期被完全没收的转移支付政策。基于这一

事实，分配公正的标准尺度无法反映参数变动的分配结果，这似乎是它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多数主义政治过程对分配公正的影响仍然是不清楚的。

第三，一次总付性转移支付的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在多数人决定结果的制度下产生的收入水平，肯定会因所有权的出现而下降。例如考虑一下目前属于多数派联盟成员的A在认识到自己在下一轮选举中受到剥削、自己的财产被没收的三分之一的风险时，他的积累资本的激励因素，为增加劳动收入而培养技能、承担风险或寻找创业机会的激励因素，会因为如下事实而大受削弱：个人只能预期获得未来收益的一小部分。进一步说，确保自己是多数派联盟的成员，从私人角度说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动。假如——并且事实上也可能就是如此——一个人为了变成决策联盟的成员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被用于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正面的价值，那么这些时间和精力付出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净损失。这种损失类似于“寻租”的损失，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制度性结构创造与增加产量无关的收益时，它是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sup>[8]</sup>

这意味着，总量转移支付的说法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在任135何时期，占优势的多数没收和占有少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可以预期，在为未来的选举期制定计划时，各方都会想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少数中的一员，他们自己的财产也将被别人没收，只有在这时以上说法才能够成立。所以，这种没收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具体说来，在选举时期的任何时刻，税后转移支付会大大少于 $Y_M$ 。

根据这一事实，为限制将少数的收入向多数的再分配而对税收和转移支付做出限制，从预期的角度看会改善所有人的处境。此外，这种再分配会产生一种假设性的可欲的分配结果，即在选举时期的任何时刻分配的不平等将会较少。因此，在下一节，我



们将对可以用来限制税收—转移支付的各种可能的手段加以评价。

## 五、征税规则和多数主义规则下的分配

在保留我们前面设定的多数规则基本模型的情况下，下面我们考察在不同形式的财政限制下，从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分配结果的特征，并假设税收—转移支付的运作引起了“额外负担”以及给社会造成普遍的效益损失。然后，我们讨论对征税过程和转移支付过程的种种限制，并在讨论的每一个转折点增加一项限制。首先我们假设，宪法限制征税当局只能实行单一税率的所得税，此外不做其他限制。然后我们进一步要求，在征收每个人的所得税时，要实行统一税率。然后我们加上进一步的限制，转移支付要按人头实行平等数量的支付。最后，我们考虑一种有关税收—税率—转移支付水平的直接的立宪选择。

### 136 1. 统一税率的所得税

假设多数派受到限制，在向少数征税时，只能采用统一税率征收货币所得税。因此，尽管只有少数派成员纳税，但对税基有严格的规定，即货币收入，并且单一税率平等地适用于少数派的全体成员。这种限制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实行单一税率的重要性在于，它阻止多数派向少数派成员货币收入中的边际收益以下的单位进行歧视性征税。正如歧视性垄断者可以为产品的边际收益以下的单位制定更高的价格，由此获得本来可以由购买者获得的一部分消费剩余一样，征税当局能够以适当的累退税作为手段，占有公民的一部分消费剩余。<sup>[9]</sup>要求对个人收入的所有单位实行统一税率的做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二，只对货币收入征税的要求，明确排除了多数派没收少数派成员资产——例如，实行财产税就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

权力。对于从资产中取得的收入，能够按照与其他来源的收入相同的税率征税，但资产本身大体上不会受到侵犯。<sup>[10]</sup>

对征税的这些限制有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对于每个人来说税额都是有上限的，即  $R_i^*$ ，能够通过单一税率从他那儿得到这一税额。第二，每个人也将有一个相应的最低收入水平，即  $n_i$ ，他在面对最高税率时，能够在税后达到这一水平。第三，我们知道征税过程会使纳税人遭受净损失，这种损失甚至超过纳税额，因为纳税人在税制的刺激下，会用免税的休闲代替收入。

这些说法很容易通过分析加以证明，<sup>[11]</sup>但这里只需提供一个<sup>137</sup> 类比即可。我们能够把多数派设想为拥有向少数派销售要素服务的垄断权。可以获得的最大税额对应于出售这种服务得到的最大垄断利润，少数派的最低收入可以被设想为垄断者为提供这些服务和获得基本生产要素（在这个例子，即少数派）而付出的成本。这样一来，额外负担类似于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

显然，在这个基础上，具有决定权的多数派总是会对少数派的收入实行收入最大化的税率。不这样做，多数联盟本来能够得到的转移支付就会消失。然而，这不会使少数派的净收入变成零；税率必须低于 100%。不言而喻，实行超过收入最大化比率的税率，会减少可以向多数转移的收入。同时，多数绝不愿意向自己征税，因为纳税怎么说也是额外负担。即使税款会以一次总付的形式返还给纳税人团体，该团体收到的数量还是不足以补偿上交的税款。

例如，考虑一下  $A$  是少数而  $B$  和  $C$  是多数的情况。这时  $A$  将面对收入最大化的税率，并得到他的净收入总额  $n_a$ ，而  $B$  和  $C$  不用纳税，并能得到  $R_a^*$ ，这个数量按一定比例在他们中间分配。结果将是： $J_A = [n_a, m_b + S_b, m_c + S_c]$ ，其中  $S_b + S_c = R_a^*$ 。与此相似，如果  $B$  是少数，结果就是  $J_B = [m_a + S'_b, n_b, m_c +$

$S'_c]$ ，其中  $S'_a + S'_c = R'_b$ 。如果  $C$  是少数，结果相同。

在不受约束的多数主义的条件下，我们无法预测哪一个多数联盟会取得支配权。可以预期会出现“循环”，因为拥有决定权的联盟成员的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循环是受到约束的，因为没有哪个人的收入会下降到低于  $n_i$  的水平。显然，任何一个团体可以设想的最佳做法，就是从另两个团体得到最大收入。当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多数派的成员也许不得不同意向自己征税，从而可以提供足够的收入来收买其他团体加入多数联盟。例如，假定现在存在着  $J_A$ ，最大化收入  $R'_a$  在  $B$  和  $C$  之间平分。这时  $A$  将寻求组成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联盟。假如  $B$  能够得到的最大收入大于  $C$ （即  $R'_b > R'_c$ ）， $A$  就会试图与  $C$  结成联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A$  可能需要把大于  $R'_b$  的数量付给  $C$ （比方说，假如  $R'_b < 1/2 R'_a$  的话），因此， $A$  自己也不得不交纳一定的税。

由于不断反复的循环和普遍的分配不确定性，对于每个群体在连续性多个选举期内的预期收入，很难做出准确的说明。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说明。第一，与不受约束的多数主义不同，生产力和节俭上的差异将对预期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可以预期，处在少数派中的每个人能得到的最低收入反映着基本的挣钱能力。因此，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富有的观点在这里有着某种实质性的意义。第二，就像不受限制的情况一样，政府从事转移支付的活动，似乎很可能是向着预期收入平等化的方向发挥作用。一般说来，我们预期从任何群体得到的最大化税收，同该群体的免税收入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最贫穷者有望从转移支付中得到的数量，将大于最富有者有望得到的、作为转移支付的绝对量意义上的数量（从而更不用说作为一定比例的税前总收入）。其实际效果是把长时段的多选举期内的预期收入分配予以缩短，而不是实现预期收入的平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受约束的多数主义导致了更接近于平等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在多选举期的时段内的每一时刻，与不存在征税限制相比，存在着征税限制的收入分配更接近于平等。当然，可以预期收入总量也更大。

## 2. 统一的比例制所得税

这里我们将为前面所说的征税限制条件增加一项要求，即对全体纳税人统一征税。在这种限制下，多数派必须面对和少数派一样的货币收入所得税税率。但是，由于税收的使用不受限制，<sup>139</sup>多数派会理性地把全部税款占为己有，不会向少数派进行任何转移支付。同样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仍会出现循环。任何多数联盟都不会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为任何结果总是会面对受到三个人中的两个所偏好的另一种结果。

假如在税收系统中没有额外负担的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与不受约束的多数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多数派将征收不打折扣的统一税，这样它就可以把每个人的全部收入据为己有，然后按一定比例分给多数联盟中的每个成员。换言之，在征税体系内部不存在扭曲的情况下，统一征税的要求根本不会对结果形成约束。但是，由于税制确实存在着扭曲——因为它使多数派成员承担额外负担，这一负担会在边际上随着税率面增加，所以多数派联盟会理性地不让税率突破最大化税收的上限。相反，多数派联盟会把税率定在增加自己边际收益的成本——其中也包括多数派成员所承受的额外负担——恰好是1美元的水平上。很容易看到，这意味着所采用的税率低于从少数派征收最大化税收所要求的税率。为了更为具体起见，我们来考虑一下税率提高到接近于税收最大化水平的情况。税率的提高将只能使从少数派征到的税收（从而也是多数派成员所得到的转移支付）稍有增加，而多数派成员自己面对的纳税额外负担，却有实质性的增加。

具体分析，多征收1美元税收给个人*i*造成的成本，是由两

个要素构成的：他本人的纳税份额，以及他承担的边际额外负担。用公式表示就是  $C_i = r_i + (dW_i/dR)$ ，式中  $r_i$  是个人  $i$  在税收的边际数量中的份额。在比例制货币所得税之下， $r_i$  仅仅是他本人的货币收入与总货币收入之比。显然，随着我们接近税收最大化， $dW_i/dR$  趋于无穷大，因为在达到税收最大化水平时  $dR$  变为零。因此，增加 1 美元转移支付给  $i$  造成的边际成本，也会在税收最大化时趋于无穷大。如果每个多数派成员在征税中的份额相等（也就是说，每个多数派群体得到每 1 美元税收中的 5 角钱），那么每个群体都会要求采用使  $C_i$  值为二分之一的税率。

对于货币收入多的人， $r_i$  值也会更大，并且货币收入和总收入 140 人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那么当多数派联盟由富人组成而不是由穷人组成时，可以预期税率会较低。因此，属于少数派的穷人的损失，要少于属于少数派的富人的损失。进一步说，虽然税率一般而言会低于不实行统一税的情况，税收总量仍有可能大于不实行统一税的情况，因为所有的人都得交税。这又意味着转移支付的总量更大。

综上所述，在有统一税限制的条件下，穷人的处境有可能更好一些：与不实行统一税相比，他们在属于多数时能够得到更多的人均转移支付，在属于少数时交税也较少。税制统一的要求的作用是，它有利于更大数量的人均再分配，但是从多选举期的长时段来看，它对任何个人的命运变化有着较小的影响。在选举循环中，最富的人不会得到很多好处，最穷的人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值得予以强调。在存在着多数主义规则（对转移支付则没有任何相应的统一限制）的情况下，与不存在税制统一的规定相比，这种规定会导致更为平等的结果，无论从预期收入的角度看，还是从选举循环中每个时刻的结果看，都是如此。

### 3. 统一的比例制所得税和人均转移支付

现在我们来讨论对税收和预算的转移支付都实行统一性限制的情况。转移支付的统一性要求在全体公民之间平等分配税收，其形式是一个人向所有人支付。因此，每个群体将得到每1美元税收中的33美分。与上一节一样，税收统一性被定义为以相同的单一税率向每个人征收比例制所得税。

在这些限制下，将会存在某种对每个人来说可欲的税率。任何一个人的收入越高，他就越是希望这一税率较低，因为他要每1美元税收贡献更多的人均份额。事实上，凡是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人，都希望税率为零——因而人均转移支付也是零。这样，一个人是按自己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为税收作出贡献，<sup>141</sup>同时得到有着持续净损失的人均份额。反过来说，收入低于平均值的个人希望税率为正值，在这种情况下，每增加包括边际额外负担在内的1美元税收给他造成的成本，将等于他本人三分之一的人均份额。显然，个人的收入越低，他们所希望的税率就越高（相应地，税收收入和人均转移支付也会更高）。这里我们看不到循环。对惟一的参数 $t$ 的偏好，可以沿着一个惟一的方向来排列，多数规则将导致中等收入者，即本案例中的 $B$ ，在确定采用的税率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征税和转移支付受到的既定限制下，不会出现有利于 $A$ 和 $C$ 的安排： $A$ 希望税率较高，而 $C$ 希望税率较低，所以在他们之间不存在结成决定性联盟的余地。因此实行的税率将是中等收入者所希望的税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只有当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才希望发生正转移支付，他的收入越低，他要求的转移支付就越高。可见，再分配的数量取决于收入分配向低端倾斜的程度。

与前面的案例不同，这一案例中的转移模式是完全确定的，并且相应地出现于多选举期的每个时刻。这种再分配的数量只取决于平均和中等的收入水平。规范分析的焦点是收入分配的差别，

或在不平等程度的类似测定，而在受着这种限制的多数规则下的再分配程度，只取决于倾斜程度。换句话说，在征税和转移支付都受到统一性限制的情况下，多数规则起到了把再分配与错误的参数连接的作用。与再分配的道德考虑基本上没有关系的收入分配的变化，能够导致政治转移支付模式的实质性变化，而具有十分规范的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变化，要么不会使富人向穷人的转移程度支付发生任何变化，要么就是使它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从我们的三人模型分析中得出的一些简单的比较性静态结论，就足以为这些主张提供证据。例如，假设最穷的人收入出现下降，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平均收入自然会下降。然而中等收入不变，于是转移支付的程度也会下降。反之，假如最贫困者收入<sup>142</sup>上升，其他条件不变，转移支付将会增加。再来看看其他条件不变而中等收入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最贫困者在整个馅饼中的相对份额已经下降，转移支付仍会下降。当然，收入分配的某些变化，将会使与传统解释中的分配公正要求相一致的转移支付模式发生改变。例如，当最富有者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转移支付水平也会上升或下降。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简单的中间投票人模式并不能产生恰当反映出分配公正要求的政治再分配模式。

## 六、直接的宪政主义和分配公正

前两节对制度结果的分析所传达出的核心认识是，在保证分配公正方面，普通的多数主义政治是一种极不完善的机制，至少根据对分配公正的传统理解来说是这样。多数规则似乎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分配不确定性的问题。用政治手段进行转移支付，总是会使转移支付的方向偏离少数而转向有决定权的多数，并且难以期待最贫穷的人和其他群体相比，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具

有决定权的多数。因此，尽管从相对长期的角度看，最贫穷者有望成为政治轮盘赌的净受益者，但是政治的转移支付的方向经常发生逆转，却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实。人们到底如何评估一系列可发生系统性变化的分配的结果，一直不是社会哲学家或规范的政策分析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显然也无法根据分配公正的标准来评价多数主义的制度。随着时间随机变动的收入流量，与在每个时期都产生同等收入的流量一样“公正”吗？假如不是这样，具体地说，假如人们更偏向于不变流量，那就有很好的初步证据表明，应当对多数规则做出某种限制，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产生更为稳定的分配结果。

通过限制多数规则实现确定性分配的方法之一，是要求采用统一的比例税，并按人平均税收。然而，如果实行这种限制，多数规则的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由此产生的转移支付模式，将无法反映与道德有关的考虑。具体而言，转移支付的水平将会对最贫困者收入水平的变化做出逆向反应。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出现转移支付。当然，实际出现的任何转移支付，都会使贫困者受益最大。这是实行限制——即按比例征收所得税，按人平均支付税收收入——的直接伴生物。但是，多数规则似乎没有能力确定这样一个转移支付水平，它有着道德上的恰当性或对于相关的分配参数具有敏感性。

当然可以认为，以上各节所采用的这种高度简化的政治过程模型，与“现实世界中的民主”相距甚远，因此无法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我们虽然完全同意这种简单的多数主义模型过于死板，但不接受以上批评。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从选举过程中发生的分配结果所受到的压力的性质。这些压力必然反映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而简单多数规则下的选举竞争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许多人认为是它的首要）特点。以不太正规的方式研究民主制度的危险是易于被流行的政治宗教所俘获。政治流行话语中当然



有许多关于分配公正的议论。实质性的问题则是，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分配公正将得到保障。

在我们建立的简单的多数规则的模型中，充其量只能提供模棱两可的答案。多数规则也许能够保证收入分配中更为平等的结果，做到这一点的成本也尚可接受。然而，如果用统一的比例税制的要求来约束多数规则，它有可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这种要求能够促进更平等的结果，因为它限制有决定权的更富有的个人联盟通过实施以自己为对象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得到好处，同时它也在较小的程度上限制穷人得到类似的好处。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由于转移支付经常向着“错误的”方向流动，这使获得可取的再分配的成本相当高——似乎达到了毫无必要的地步。例如，在第五节的1、2两小节的案例中，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在144 选举周期的每个时刻都保证平均分配结果，那么各方似乎都会得到较多的回报。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有着纯粹的分配优点。在实行罗尔斯式的最大最小规则安排背景（maximin setting）下，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将属于哪个群体，导致每个时刻都有预期分配结果的安排，有着彻底排除最贫穷者就是受剥削的少数这种结果的优点。如果接受最大最小标准，这一特点似乎有决定性的意义。

那么，某种直接的宪政主义的转移支付安排，是不是一种更为优越的分配方式呢？如果在某种准罗尔斯式的背景下，个人在立宪阶段处于无知之幕后，可以假设他对未来的收入分配以及用来约束这种分配的转移支付的政策有着明确的偏好，那么他为何不会力求在立宪层次上把这些政策制度化呢？例如，假设在征税中实行统一的比例制税率，由此得到的税款实行按人平均分配。不过也假设税率（从而也包括转移支付的水平）不是多数规则下的中间选民来决定，而是在立宪阶段选择税率（或转移支付的水平）。收入分配政策将不再是一个选举期内的政治决定的问题；政府的转移支付模式将成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关于这种安排有四点需要说明。第一点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人均转移支付的体制，未必像第五节第2小节所评估的统一税方案那样，能够有效地取得既定的预期分配结果。也就是说，选举周期中的最贫困者收入流量变动性的减少，是通过损失一定的总收入而取得的。其原因似乎是，要求转移支付使所有个人受益，这增加了当最贫穷者属于有决定权的联盟时坚决要求的转移支付水平对总税收收入的要求，这样做足以抵消穷人属于少数时的不利处境。我们再回到在第五节第2小节讨论过的模型。存在着最富有者的联盟时的税率，要低于存在着最贫穷者的联盟时的税率，所以穷人因为属于少数而蒙受的不利多少已经得到缓解。无论如何，要想通过一种人均转移支付体系使最贫穷者取得同样的预期收入，那么与转移支付被限制在多数派成员的情况相比，确实需要更高的税率，从而也是更大的额外负担，虽然在前一种情<sup>145</sup>况下，最贫穷者有一段时间将属于受剥削的少数。

第二，从账目的另一个角度看，宪政主义的人均转移支付体系，削弱了试图使自己成为决策联盟中的一员而花费资源的激励，只要有多数主义循环，就会存在这种激励。假如这种类型的政治寻租十分普遍（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一个只受着统一比例税的要求限制的多数主义体制中，税收方面较低的额外负担也很可能是无法补偿的。在这种情况下，效率的考虑赞成宪政主义的转移支付方案。

第三，尽管把这种安排称为“用宪政手段决定转移支付”似乎顺理成章，可是在这个说法中还是有一些误导的因素。毕竟，这里并没有这些政策将在人们中间进行资源或收入“再分配”的含义。这种宪政主义秩序只涉及一组财产权，根据这种财产权，每个人真正“拥有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个人对别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一部分，也拥有平等的份额。不能利用政府把富人的收入转移

给穷人——出于赏赐性的利他主义，出于仇富心理，或出于任何形式的“侠义心肠”。这种安排不过是使个人的基本财产权得以明晰和得到落实的制度结构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目前的制度安排没有多大差别。公民利用现有的国家权力，确实对其他个人的生产率提出要求——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体系加以合法化和贯彻的要求。这里所建议的体制与现行体制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在宪政主义的安排下，个人在国家的保护下相互提出的要求不是随机性的，不会随着选举命运的变化而变化。公民在这种宪政主义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安排下拥有的权利，与他们能够正确地解释为拥有的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差别。在这一点上，分配公正的概念和（第七章中所考察的）形式公正的概念<sup>146</sup>重叠在了一起。由于分配公正的考虑不仅适用于结果，也适用于规则，由于这种考虑是在宪政主义的共识下得到认可和采用，因此在规则下产生的结果满足了分配公正的要求，无论这些结果在任何既定时刻可能表现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特征。

第四，一旦认识到分配公正的标准适用于规则的选择，而不是对各种可以设想的分配结果的想象中的选择，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推断，最有利于分配公正的规则就是“转移”收入的规则。经济学家在探讨再分配政策的问题时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偏好，即把现金转移作为保证可欲的分配的最有效方式。但是，一旦讨论的领域从可欲的分配转向可以产生可欲的分配的制度结构，这种做法可能就变成错误的了。

为实现更加平等的结果，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规则变革。例如在篮球运动中，为了消除高个子球员的天然优势，我们可以改变规则，比如把篮筐高度提高5英尺，或对高个子球员做出某种明确的限制（如对投篮得分进行计时，使其与得分手的高度成反比）。当然，从任何可以接受的意义上说，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多么公平。同样的道理，社会事务中规则的改变，也不必非要

通过政治过程直接进行再分配以保证更加公平的结果。按照我们对简单多数规则下的转移支付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分配公正。

## 七、结 论

这一章的中心目标是从宪政主义的角度考察分配公正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看法：政治过程的“仁慈的专制者”模型，就像在另一些规范的社会分析中一样，完全不适合讨论分配公正问题。我们不能把政府描述为在不同的分配方案中进行“选择”，这样做是不恰当的。相反，分配是产生于自主的行动<sup>147</sup>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们都在既定的规则下做出个人的选择。对不同分配方案的评价仅仅被视为最初的一步，是一种抽象的规范性理论思考，对于跟政策有关的事务，它本身不能揭示任何东西。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改变规则的方式，在这种规则下，个人之间的互动改变着分配结果的格局。我们把这种分析称为“对制度归宿后果的分析”。

这一章的分析性核心，恰恰就是对极其简单的多数规则模型的制度后果归宿的分析。我们提出了有关税收和转移支付所引起的额外负担的种种假设，考察了对征税和转移支付方式施加不同限制给分配造成的影响。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多数规则充其量也只是追求分配公正的一种十分不完善的途径。多数规则或是导致循环（即分配的不确定性），或是在受到适当限制时导致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方式，它对规范的相关变化（比如说最贫穷者的收入变化）只能做出相反的反应。

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于从选举期内的多数主义的政治管辖权中产生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预算，提高其确定性，使其成为一个明确的宪政主义的事务是可能的。这当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

把某种转移支付措施纳入基本游戏规则的政治决策是不能事先假设的。对不同的规则体系的选择，很可能关系到对收入分配的预期影响，导致更加平等的分配格局的规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得到偏爱。但是，选定的规则不必为更成功的参与者“制造障碍”。在立宪的层面上，可以有多种选择，为取得更加平等的结果而选择的手段，未必非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转移支付。

不错，这里的分析可能不够明确。不过我们相信，它确实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有关分配公正的传统讨论与分配政治学的现实世界实在相距太远。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政治约束被完全忽视了，分配公正在制度上的可行性被当作无关痛痒的雕虫小技弃之不顾。这种做法或许会被道德哲学家所接受，但是对于社会分析家来说则是完全不适当的。我们这里的目的是揭示这种不当，并指出填补这一空白的研究方法。

就这里的目的而言，似乎很清楚，相信多数主义能够产生公平的分配格局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对多数主义的运行做出各种具体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好处都会化为乌有。只有当未来的政治联盟格局有着内在的不可预测性时，才会出现预期的平等，在“无规则的政治”世界里，还能用于分配的东西所剩无几。

#### 注释：

[1] 这里的假设是，所有这一切在以下经济体中是可能的，在这些经济体中，公共部门抽取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总产品，而且集体措施的未加衡量的效应渗透贯穿整个经济并且以不可胜数的途径影响收入分配。

[2]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Dan Usher, *The Economic Prerequisite to Democra-*

- cy (厄舍尔:《民主的经济前提》),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 [3] 关于多数规则对再分配的某些影响的非常一般性的解释,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anchise in the Welfare State" (布坎南: "福利国家中特许权的政治经济学"), 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 [4] 也可以把这些“人”设想为规模均等的完全同质的群体。
- [5] 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论述的那样, 这一假设绝对不是没有例外。参见 Geoffrey Brennan & James M. Buchanan, "The Logic of the Levers" (布伦南和布坎南: "征税者的逻辑")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Fairfax, Va., 1983, mimeographed. 不过, 这一假设确实遵循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常规做法, 而且在这里是高度权宜性的。
- [6] 在第四章中, 我们曾尝试证明这种假设是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
- [7] 这种假设只是一种“虚构”。市场秩序需要由一些制度来保护产权和强制履行契约, 这些制度需要获得一定的资源以履行职责。即使没有转移支付, 税收也不会是零。不过, 在转移支付为零的情况下把税收假设为零, 有助于分析问题。
- [8] 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论述, 可参见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 Gordon Tullock,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布坎南等编:《建立一种寻租社会的理论》),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0.
- [9]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 见 Geoffrey Brennan & James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布伦南和布坎南:《征税权》),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 3.
- [10]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通货膨胀使征税当局有可能占有资产本身的一部分真实价值(通过让净税的真实回报率低于零)。我们这里假定, 货币当局受着宪法的限制, 不能为了再分配的目的制造通货膨胀, 或至少是独立于单一期间的政治压力。参见 Brennan & James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布伦南和布坎南:《征税权》),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s. 5 and 6.
- [11] 例如参见前揭, chaps. 3 and 4.

## 在民主制度中能否实现 宪法革命

### 一、引言

本书是为了进行说服而对一篇论文的扩展。我们试图对用规则约束人们的政治行为提供一个逻辑基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些人是当前或潜在的政治任务的参与者。我们希望，我们关于接受一种“宪政主义态度”的必要性的论证，无论是其中的抽象分析，还是这种分析在实践中的应用，是有说服力的。这种态度被普遍接受，是进行真正的宪政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对政治秩序基本规则的变革所面对的重要障碍，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在这一章，我们将只讨论和分析这些障碍。

我们认为，对于本章标题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在这本书以及其他的许多文章中的讨论，就变成了纯粹美学动机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坚持一种信念，即组成一个政体的人们能够改变他们在生活中所依靠和遵循的规则。在我们看来，任何其他的信念都会让人感到绝望。不过，对变革之可能性的这种信念，必须与对摆脱我们面对的困境的困难所做的建设性分析区分开来。如果对这些困难所做的分析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那

么这种有关变革之可能性的信念，会受到严重动摇。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提供一套方案，使真正的宪政变革能够通过我们都认识的男男女女的活动而出现。倘若人人都是圣人或天使，我们面对的困境根本不会出现。

我们也要强调本章标题中的“民主制度中”这一短语的重要性。<sup>150</sup>我们评估的对象，是“在民主制度中”实现宪法变革的前景，这不但意味着我们把注意力局限于民主政体，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这种宪政变革必须是“民主的”变革，也就是说，它必须来自全体选民都可能参与的政治机制，而不是来自共同体内部或外部的某个“有神授特权的”人的指令。我们在这里提到“神授特权”，是因为在建立社会秩序基本规则的问题上，要想合理地对人们做出区分，就只能参照某种外在的超个人主义的标准。

对我们的分析做出这些限制，使我们不必考虑任何非民主的革命，无论它是宪政革命还是其他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总是有可能发生，即使是在长期习惯于民主统治的国家。某个群体——军事集团、一党制的领导层、掌权的委员会、精英主义机构——夺取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统治集体以外的人。为这种宪政一制度变革建立模型比较容易，因为这等于说充当上帝进行游戏很容易。学术界的科学家和学者如果想象自己掌握了革命的权力，他有可能情不自禁地要担当这种角色。在这个梦幻世界里，科学家和学者能够提出他们理想化的宪政变革的建议，同时仍然披着继续与同胞对话的参与者的外衣。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充当上帝角色遇到的问题困难得多。我们关注的是确保政治博弈基本规则的变革得到普遍同意的前景，甚至包括那些在现行制度下处于相对优势的個人和集团。换言之，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前景：反映在现代政治中的普遍的社会困境，能否通过非强制性和自愿的方案得到解决。可靠的诊断



显示这种困境确实存在，而且我们在本书中也始终把这种结论作为前提。<sup>[1]</sup>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所有可能的宪政世界中最完美的一个世界里，我们这里探索的就是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 二、帕累托占优的变革与维克塞尔的一致同意

首先，我们将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具体讲就是利用有关变革或变动的正当性的帕累托标准，提供一个迂回性的总结。帕累托曾经提出一种分类法，其中所有可能的社会“处境”、“地位”或“状态”都属于两个相互排斥的组别中的一个。第一个组别包括所有非最优的或低效率的状态；第二个组别包括所有最优的或有效率的状态。后一组别是由全部非超优状态构成，而超优状态被定义为属于这个社会所有的人。<sup>[2]</sup>除非有至少一个社会成员受到损害，否则不可能从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而非最优状态是指，从这种状态转变为其他状态至少能使一个人获益，而且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种纯粹人为规定的分类法使我们可以说，从形式上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组别中肯定至少存在一种能够通过改变非最优组别中的任何一种状态而取得的状态，这是一种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改变。我们把这种改变称为“帕累托占优”。

在这种纯粹形式化的层面上，我们不必谈论“社会状态”、“地位”或“处境”的确切含义。在正统的现代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状态”几乎完全是从各种权利或物品在人们中间的归属（分布或分配）这个角度来定义的。无须说，这种帕累托标准意义上的结果或最终状态，对于我们本书以及其他著述中的目的是不恰当的，但这最后的一章显然不是对这种最终结果方法论展开深入批评的地方。在这里的讨论中，帕累托标准适用于使人们的行动产生各种结果格局的规则或制度安排。

于是，声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困境，也就等于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博弈的现行规则归类为非最优或无效率的规则。此外，假如我们坚持协议必须是非强制性的自愿协议，我们便把“效率”或“最优”限制在了帕累托的意义上。这反过来又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对现存困境的诊断是正确的，那就肯定存在着向帕累托占优转变的可能。如果规则为非最优的，那就一定有某种能使人人受益的改革。<sup>152</sup>

如果我们把帕累托的分类法换成维克塞尔的语言，则我们可以说，如果存在着真正的困境，那么从理论上说肯定能够进行某种得到共同体全体成员同意的变革。提议对现行规则进行变革，至少从理论上有可能得到“一致同意”。批评家也许会马上指出，“一致同意”散发着荒诞乌托邦的味道，起码从实际落实的角度看是如此。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批评等于把讨论推到了错误的道路上。维克塞尔-帕累托标准是一个标尺，有关建设性的宪政改革的分析和讨论必须以它作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它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并没有受到这些批评的挑战。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遵守自己的决定，只限于分析内部变化、分析政治安排的“民主”变革的前景，那么在对各种方案的评价中不存在其他标准。

### 三、分配限制和对规则的展望

以任何明确的现状作为起点的帕累托-维克塞尔式变革，其范围都受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限制。只要我们转向更为正统的讨论背景，把现状定义为有价值的物品在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归属状态，就可以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提议中的变革涉及纯粹的分配变化，那么这种变革就不能被归类为帕累托占优，甚至从理论上也不可能，假如“物品”被定义为包括人们赋予其价值的全部事物的话。（当然，如果从可以进行物理测量的商品这一

角度来定义分配，帕累托占优的变革还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想到的是某种价值量，那么初始分配的任何变化肯定会使至少一个人的价值有所减少，因此也就无法保证能够得到他的同意。也就是说，假如提议中的变革涉及“拿走”某人或某些人的有价值的物品，把它“送给”另一些人，那么这种变革根本不可能被这一过程中受损害的一方自愿接受。

这一基本要点的直接含义是，这里所讨论的宪政革命，如果  
 153 把它理解为对有着普遍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分配或有关这些物品和服务的权利分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那么在民主制度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革命。

分配因素对宪政变革范围的这种限制，乍一看似乎相当严重。然而这种印象是错误的，所以会形成这种印象，很可能是因为在把原始处境定义为一种物品的分配的做法中，完全缺少现实主义的眼光。切不可忘记，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可能的变革造成的特定的最终状态或结果，即使这种变革有可能发生。假如用有价值的物品、服务和权利的归属来描述个人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相对处境，那么任何变革都必然有着再分配的特点。(没有谁会指望玩扑克牌的人在游戏结束后会打扫纸屑。) 我们所关注的是对社会秩序的规则或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这些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人们(游戏者)在里边扮演着各式各样的复杂角色，从他们的互动中产生了分配结果的格局。改变规则对处在任何时刻的任何一个人或团体所造成的确切的分配影响，即或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预见的。只从人们的行为规则(各种法律和制度)角度界定的原初状态，与从有价值的物品和权利的特定分配状况来描述的原初状态，有着根本的不同。(玩扑克牌的人可以一致同意修改未来的游戏规则，不必考虑以往的游戏所遵循的规则。)

我们不妨简短地说点儿离题话。数理经济学家把所有的分析

强行塞进可以进行数学演算的形式，就最终状态和规则之间的区分而言，这种习气对思想的明晰性为害甚烈。从数学上说，用矢量语言定义物品的分配相对容易。可是，假如存在的是一套规则，它约束而不是决定着个人的选择，它们又导致了分配结果的格局，那还怎么能用数学去描述原初状态呢？最终状态可以接受数学操作，过程则否。

就其对分配的影响而言，规则的变革是前瞻性的，而可以观察到的分配的变化本身则必然是回顾性的，需要参照引起这些结果的人的选择行为。能够要求一致同意的规则的变革，充其量只能是改变人们对未来分配格局的预期。规则的变革不能改变可观  
察到的分配本身，当然，除非是以追溯既往的方式实施这种变革。 154

规范的税收理论为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例子。开征累进制所得税的集体决策，是对财政规则的变革。尽管可以预见其分配结果，但是这一决策从理论上说可以得到共同体内所有人的同意，在得到同意与实际征税之间有时间差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个人能够知道，如果他选择挣收入，这笔收入就要按累进制税率纳税。再把这一决策与开征财产税的集体决策做一比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经积累起财产的人本来可以在其他规则下提前做出选择。这种财政规则的变革违反了所有的“公平”标准，绝对不能声称符合帕累托占优，即使它满足了纯理论的标准。

符合帕累托占优的规则变革都具有前瞻性，这一认识对设计改革方案有重要的启示。改变规则的方案显然涉及同意和落实之间的时间差，就此而言，受其潜在影响的人准确预见个人地位受到影响的能力必然下降。前瞻性规则把不确定性引入决策者的计算之中，这种不确定性随着时间差的长度而增加。

如果考虑到规则变革的持久性和长久性，这一时间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必须对规则做出选择的人，在这样做时知道或预期选

择一经做出，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有效，但是他们没有多少能力预测特定规则会对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相对处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方面是修改宪法的决策规则（修宪程序），另一方面是在既定宪法规则下做出选择的决策规则，对这两者加以区分的逻辑基础，就是认识到这种时间因素的差别。

如果人们知道或预期改变规则的方案是短期的，那么即使得到实施，它对分配的影响也更容易预测。因此，对短期的变革更不易获得人们的同意。其实，“规则”的含义就有着准持久性的内涵；如果在每一轮游戏中规则都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游戏无异于没有任何规则的游戏。<sup>[3]</sup>

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布坎南和塔洛克把宪法规则的前瞻性和持久性作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个人可以在自己短期的、确定的私人利益与长远的、不确定的私人利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样后者就可以变成“公共利益”。

这种建构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sup>[4]</sup>在罗尔斯的架构内，个人有着选择公平原则的道德义务，仿佛他们是处在无知之幕中。在一个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这样描述的处境被认为反映着经验上普遍存在的公正观。也就是说，人们“应当”尝试站在无知之幕的立场上，此外，当他们严肃思考和讨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规则时，他们确实像是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与罗尔斯的推理相比，布坎南和塔洛克的推理不对个人提出太多的要求，即至少在限定的条件下让他们受选择背景所迫而采取一种等于是处在无知之幕中的立场。由于人们的自身处境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必须采纳类似于罗尔斯描述的公平律令的标准。这种不确定性的作用在于它大大淡化了真正的立宪选择中纯粹的分配因素。

#### 四、既得权利与分配嫉妒

为了就基本的宪法变革取得一致意见而有待克服的第二个障碍，与第三节讨论的分配问题有间接的关系，并且从一个方面看，它的存在正是由于无法做到对分配的不确定性进行必要的限制。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由于人们没有能力采纳罗尔斯向他们鼓吹的道德立场，或是不可能设计一种制度环境，足以使他们在严格的自利基础上理性地采取这种立场，所以人们既不会也不可能做出立宪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提议中的规则变革的分配含义都是可预见的，包括对明确的个人和群体的不同影响的预见。仅仅这一个事实，似乎从一开始就使改革遇到了麻烦。那么，对这一章的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呢？<sup>156</sup>

可能达成的一致同意所而对这个障碍，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严重。任何变革方案对分配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这将妨碍简单的变革方案得到普遍同意。但是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利用帕累托-维克塞尔的福利分析做出的迂回论证。如果原有的规则体系确实是非最优的或无效率的，那么肯定存在着就某种结构变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达成这样的协议，即便只是为了理论评估的目的，也需要做出一种很复杂的安排，其中包含着各种妥协、单方面报酬、补偿、贿赂、交换、利弊权衡等等——这种安排的目的，完全在于消除建议中的变革对分配造成的可预见的相互对立的影响。如果特定的人，作为个人或群体成员，预见到实行简单的规则变革会给他们造成分配上的损害，那么变革的提议者和设计者就必须补充上某种“一揽子交易”的要素以改变这种结果。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一种复杂的立宪“交易”中的各种

要素，以便保证每个参与者都能得到净收益。也许有很多这样的一揽子方案能够得到普遍同意，如果制度—宪法结构的变化能够取得重要的整体收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发现这种互利方案，最好是把它作为复杂的交易命题加以考虑，是政治经济学专家责无旁贷的任务。<sup>[5]</sup>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结构变革的直接受益者，是不是愿意为了保证变革得到普遍同意而支付补偿。

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不同的表述。政治共同体的各方或许不愿接受现行规则下产生的权利分配结果，很多人可能不赞成把现有的权利分配格局作为真正的宪法改革的适当起点。也就是说，只有事先就“这儿”以及它所反映的现存权利分配达成一致，才有可能找到从“这儿”通向“那儿”的道路。

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为例（这纯粹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对这种环境中的不同制度安排的比较效率分析）。我们假定，该共同体的所有人一致认为，土地改革将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这里的效率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美元数量进行客观计算。由这一事实似乎可以推断，能够制定出人人都会接受的某种复杂的一揽子交易的改革方案。这方案必须包含对现有的大土地所有者给予足够的补偿，以便让他们同意对所有权格局的变革。然而，为了给这种补偿筹措资金，未来的土地所有者和/或纳税人一般说来，必须让其购买力，即他们的预期净收益，做出一定的牺牲。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这种结果似乎不如简单地“取走”地产造成的结果更令人满意。尽管认识到土地改革的净收益，属于净收益群体的人，仍然有可能以财产现状“不公正”为由，不愿意为现在的地主提供资金补偿。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有可能使宪法变革无法得到一致同意，即使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革能够带来重大的总体效率收益。

对原有的财产或权利格局的这种态度的扩散，当然部分地取决于个人对成功实施这种变革的不同路径的前景评估。尊重现有

分配格局，从而愿意支付补偿以取得一致同意，关键在于能否改变这种权利和主张的所谓“不公正”状态，而不必征得这些权利人的自愿同意。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联盟运用权力公然没收私人资产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sup>158</sup>

大概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许多当时尚不是有能力采取没收措施的政治联盟成员，但预期会成为其成员的人来说，政治“取走”方式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有可能仍然为正值，而且高于从真正的宪法改革中产生的收益。与制度上的强制做法相比，通过采用适宜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财产权的转移或许效果更好，其实，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可能在“政治财产权”最不确定的环境中表现得最为极端。

在我们分析的土地改革案例中，可能有许多人认为现有财产“不公平”，因而理所当然地赞成实行公开没收（即赞成我们在本章提到的非民主的宪政变革），不过与此同时，这些人对于他们自己在未来政府或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尽管存在着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可能还是不愿意支持对现有财产进行政治“赎买”的方案。原有状态下的名义上的地产所有者，即使他们处在争执的另一方，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些名义上的财产所有者意识到自己无力抗拒对立的反对派联盟，他们有可能自愿同意结构性变革，包括用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接受支付给他们的补偿。同样，如果这些所有者坚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结局，他们所要求的补偿就超过政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提供的资金数量，如果估计到后一群体的成员认为他们自己拥有进行威胁的潜力，事情就更会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僵局，类似于当可交易商品的所有权没有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保护时进行市场交换所产生的问题。<sup>[6]</sup>

土地改革只应被当作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可供选择，比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的奴隶制。这里的核心问题<sup>159</sup>



是，在一套宪法规则下政治权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妨碍甚至彻底阻止对这些规则实行的变革，即使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革可以改进福利。在这种背景下，暴力革命或内战形式的非民主变革，成为一致同意的变革的替代方案。

这一节分析的真正的宪法变革所遇到的障碍，其重要性因对现行政治体制、即现有规则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理解而有所不同。如果这种体制几乎不受尊重，部分地是由于它不能发挥对政府和私人侵犯公认受到保护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的功能，那么采取直接没收而不是帕累托占优或协商一致的变革，在大多数公民看来也许有着更大的当前价值。多少有些反讽意味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有效，使其公民长期持有“宪政主义观念”，那么这个国家在实行真正的宪法革命时也要容易得多。用哈耶克的话说，如果人们广泛认同“法”与“立法”的区分，<sup>[7]</sup>或“立宪阶段”的选择和“立宪后阶段”的“期内”选择——的区分，或“改变规则”与“按既定规则游戏”之间的区分，他们就会更愿意寻求另一种更为全面的改变规则的决策程序，它不同于在现行安排下的政治行动过程。相反，在人们认为政府实际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政治背景下，要想取得根本性宪法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取得同样的结果，一个现存的或潜在的不受限制的多数联盟，何必要用一致同意的方式进行宪法变革呢？

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或者有着有效的分权特点的政治结构，<sup>160</sup>与英国或任何议会制民主——其政治权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立法机构中——相比，大概更易于对自己的政治结构进行变革，

## 五、法制变革和搭便车者

第三节和第四节讨论的宪法变革的障碍有着重要意义。我们

不应低估任何结构性变革对分配的影响及其对可能的一致同意的反作用，或政治现状的不确定性的作用。不过也可以认为，与这一节所要讨论的障碍相比，这些变革的障碍并不那么重要。从标准的可预见性的角度说，这种障碍更难以克服。

我们这里指的是正规的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性”问题，以及这一特征对行为的影响，它经常被人们概括为“搭便车”。按最一般的表达形式，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生产“公共利益”？如何避免“公害”？如何为集体行动提供个人私利以外的动机？

如果是为数不多的博弈参与者考虑是否能够修改规定了博弈方式的博弈规则，那么就此进行理论分析或建立模型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更为巨大、更具普遍性、至少有数百万参与者的社会政治“博弈”，与以上博弈有何相似之处？如果预期收益的获得者是公众，即政治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没有人可以对预期的“社会”收益另外提出明确的额外要求，那么还有谁会自愿承担起为基本规则的变革设计临时方案的任务？专利法保护——尽管有一定限制——发明人专有的垄断性特权，并为所有可能的发明人的创造性努力提供激励，是否存在一种相当于这种专利法的宪法措施？对企业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经济，激励着人们努力找到在广义的市场内部和市场之间组织生产、配置资源的更有价值的方式，是否存在着一种与这种企业利润相当的政治—宪法收益？

即使存在着进行帕累托占优变革的可能性，能够通过自觉的集体选择过程对一般规则进行变革吗？假如不通过自觉的选择，<sup>161</sup>能够使基本规则发生变化吗？我们是不是只能局限于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一个？我们是否必须承认，基本制度的变革只能由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团体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即我们没有在这一章讨论的另一种“改革”路径来实现？或者，既然做不到一致同意的宪法变革，又要避免非民主的“改革”，我们是不是必须回到

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和任其发生的社会文化演化过程，只能抱着一线希望，看看这种改变是否能把我们带到而非让我们脱离从理论上可以评价为帕累托最优的境界？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似乎很有可能要么陷入绝望，要么用玩弄数学游戏来完全回避相关的思考。一种声称具备一定预见能力的经济行为模型，必须依据被概括为“经济人”的人性的共性，或客观地加以界定的经济自利。这种行为模型一直为经济学家提供着良好的服务；从这种模型派生出来的各种形态，除了我们知道并能够予以解释的市场关系中的许多人类行为外，还解释了我们所知道的政治—政府活动领域中的人类行为的许多现象。这种行为模型提供着有意义的预测；能够推导出一些有关政党、联盟、委员会、压力集团、政府和立法机构的组成与功能的可以检验的假说。这些假说涉及官僚如何行动，预算如何编制，法规如何实施——以及通过采用关键的“经济人”预设而得出的其他一些假说。但是，这些假设归根结底取决于这种自利动机假设的解释能力。专业经济学家在观察政治—政府过程时，必须认为它的动力与驱动市场过程的动力是一样的，即使他们的分析中包含着如下认识：政治选择中的自利行为，并不像市场选择的自利行为那样容易建立简单的模型。

不过，“实证的公共选择”基本分析方法，显然不能很容易地引申用于解释政治秩序基本规则的变革，从范围上说后者必然具有“公共性”。在实证的公共选择模型中，个人行为者不会做出与自身利益相反的事情，尽管这种自身利益不像简单化的演算  
162 所显示的那样容易界定。如果用于制度分析、设计、论证、对话、讨论和说服的“投入”在个人看来成本很高，那么正统模型中的个人就会不进行这种投入，而是转向那些可以更直接地满足自己目的的活动。人们为什么要做“好事”？严格地守在自己的学科界线以内的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无法

为了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去操纵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

## 六、规范的作用

经济学家如果离开这种虽然强大却过于简单的基于自利动机的人类行为模型，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同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也不敢自称属于例外。但是，如果人们从反映在一套非最优规则中的现存社会困境的角度，对现代民主的境况进行诊断，他必然会陷入绝望，要么变成一个革命者，要么超越非同义反复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模型。为了恢复对变革社会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的希望，我们必须引入一些与自利假设相悖的要素。

如果人们不是依据他们的有着客观界定和标准的经济自我利益来行事，那么他们的行动根据是什么呢？当固执的实证经济学家遇到挑战，要求他们给出具有预见性内容的替代模型时，他们就对另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哲学中的同行发动有效的批评。经济学家装备精良，能够分辨事物的真相。当非经济学家假设人们愿意“行善”时，他们迅速探测出它没有预见性内容。甚至在分析的层面上，要想让这种假设有效，必须做出附带的限制。当人们“行善”时，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个人对“善”的理解大为不同，那么每个人的“行善”努力，也不过是随机性偏离以自利假设为基础的行为模型。

要想让另一些假设具有预见力，就必须把它们表达方式修改成下面这种样子：“人们愿意行善或行事公正，对于何为善或何为公正，他们有着相同的看法。”规范在至少相当多的人中间 163 的普适性，是严格的个人主义模型之外的任何具有可行性的选择或行为理论的必要特征。<sup>[8]</sup>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可以期待人们希望对社会秩序的普遍

规则进行变革、设计这种变革、为它提供辩护和支持呢？因为根据假设，这种行为并不符合明确的个人利益。为了对此做出某种理论解释，必须求助于某种作为共同道德规范之体现的“普遍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也就是说，必须认为，对于有利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人们会做出积极的私人评价，认为它的价值高于他们自己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sup>[9]</sup>进一步说，这种得到私人积极评价的“公共利益”，必须是一种在互动的个人的自由选择中形成的状态，而不是来自上帝或卡尔·马克思的某种先验观念。

然而，假如人们确实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观念给予积极的评价，经济学批评家就要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由这些人组成的共同体，怎么会陷入已经得到确诊的社会困境呢？这些人组成的共同体，为何还要改变游戏规则，或为何还需要任何规则呢？恰当的答案同样是直截了当的：假设人们对共享的“公共利益”——其定义如上——给予积极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这种评价与他们对促进个人经济利益的评价有关。经济学家的解释性模型在这里重申自己的效力，它认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任何个人的选择计算中，必然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可以认为，行为中的“公共关切”的程度，取决于制度安排中发生的相对成本。

- 164 在我们看来，在这里的论证中必须区分出属于不同范畴的两种选择：一是现行规则集下的选择，一是对不同的规则集的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立宪后时期或规则有效期内的背景下，选择能够促进共享的“公共利益”的行为过程，与这种行为预期产生的“公共利益”增量相比，其相对成本可能极高。相反，在后一种选择中，促进“公共利益”的成本可能大为降低，因为在既定规则下按狭隘而确定的个人利益行事的同一个人，在做出真正的立宪选择时，有可能按照共同准则的要求

行事。

这种范畴上的区分源于普遍规则的含义，这种普遍性是指它们适用于政治体中的全体成员。这是福利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理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并且一直得到广泛的认可，尤其是在鲍默尔在《福利经济学和国家理论》一书对它做了强调之后。<sup>[10]</sup>但是在另一些精深的讨论中这一原则被忽略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关于公共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讨论。许多反对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人指出，人们应当有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向穷人进行慈善转移。这些批评者接着推断，那些支持政府转移支付的观点，肯定是来自一种对不愿意进行慈善转移的人强行征税的欲望。尽管许多类似的观点中有可能存在着这种动机，但是这些批评者其实忽略了这里做出的区分，即在把人们的行为汇集在一起的集体决策的背景下，他们有可能自愿同意包含着在私人制度环境中不必承担的成本的转移支付方案。个人如果知道与他处境相似的另一些人也要付出 100 美元的成本时，他有可能自愿同意涉及 100 美元个人成本的税收转移支付方案。但是，如果不存在政治方案，这个人可 165 能只向私人制定的方案提供 50 美元甚至更少。

这种规则变革的性质保证了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有相同的境遇，至少从规则这个概念的某种意义上是如此。（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遵守同样的规则，不管它们是现行规则还是变革后出现的规则。）因而在考虑规则的变革时，在能够称为“私人”利益和能够称为“公共”利益的因素之间，并不存在很多冲突。几乎一目了然的是，一个人不可能像在纯粹私人的市场选择或在普通的多数决策体制中的政治选择那样，用他自己的私人收益来抵消公共收益。在后两种决策背景下，导致“公共损失”或不能产生“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可以严格地以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作为动机。而在真正的立宪选择背景下，这种机会，至少直接可见的机会，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在立宪选择中出现的搭便车困境，完全不同于刚才谈到的选择背景中的困境。立宪选择中的搭便车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潜在地说不存在个人化的利益，而不是指存在着任何直接对立的、专有的或私人的利益，这种专有性本身保证着利益区分。正如我们指出的，在任何立宪选择中，仍然有可能存在着这种明确的私人利益；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宪法改革的方案，它能够把人们置于厚重的不确定性幕布之中。然而，与非立宪背景相比，共有的道德准则在这种背景下“有事可干”的机会甚少。

## 七、向公民信仰迈进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在民主的社会秩序中进行立宪变革的三个主要障碍。我们力求证明，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当然，我们没有低估西方民主政治面对的困难，我们也不想过分乐观。我们166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对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进行变革，而且要在博弈仍按老规则继续进行的同时进行这种变革。这当然是一项很高的要求，我们切不可抱有幻想，不做出自觉的创新努力，立宪革命就会以革命的方式自动发生。<sup>[11]</sup>

我们在这本书和其他著述中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以学术界，以社会科学、法学和哲学界的同行作为读者对象。我们必须以这个圈子作为起点，假如我们赞成凯恩斯那句有关学术混子的影响力的名言，就更应当如此。以下想法未免过于天真：那些实干的政客或个人，在做出政治表述之前或同时，即便没有学术界提供的一套系统的观念，亦可成为宪政主义的政治家。

第一步就是对诊断结果取得一定程度的学术共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对政治博弈的规则进行变革，目前存在的民主社会

将会自我毁灭，也许它来得缓慢，但结果肯定如此。具体到美国，似乎有一定的根据抱有希望：这种共识正在形成之中，尤其是在财政和货币规则方面，后者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一直是众多辩论的对象。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形成财政和货币纪律，需要一些日常政治以外的因素；需要一种体制使政治体内所有参与者的公认的长远利益得到保障。对替代性的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探索 and 讨论已经开始。

在广义上说，本书表达了一种希望，即新的“公民信仰”正处在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之中。这种新的公民信仰将部分地回到 18 世纪对政治和政府的怀疑主义，使我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则上，而不是集中在为了政治对公民生活不断扩张的干预进行辩护的创新上。作为社会哲学家，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塑造这种公民信仰，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规则，调整我们对规则的思维方式，其最终目的是限制政府能够造成的伤害，同时为政府的有益活动留出空间。我们恳求我们的学界同行，停止为这个那个政府或当权的政客提供建议。出色的比赛既取决于出色的运动员，更取决于完善的规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幸运的是，如果我们首先理解了规则的理由，那么我们就一套规则取得一致，总是要比我们在谁是我们喜欢的运动员上取得一致更容易一些。

#### 注释：

- [1] 具有更多诊断性质的较早的相关分析，参见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布坎南：《自由的界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另参见 Gordon Tullock, *The Social Dilemma* (塔洛克：《社会困



- 境》), Blacksburg, Va. : University Publication, 1974.
- [2] 对帕累托分类法的大概最简明扼要的介绍, 见 Ragnar Frisch, "On Welfare Theory and Pareto Regions" (弗瑞舍: "论福利理论和帕累托分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9. London: Macmillan, 1959, pp. 39—92.
- [3] 关于时间差在立宪计算中的重要性的细致而全面的研究, 可参见 Antonio Barbosa, "The Co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Fiscal Process: An Inquiry into Some Logical Foundations" (巴博萨: "财政过程的宪政主义分析: 对某些逻辑基础的研究"). Ph. D. dis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1975.
- [4] 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罗尔斯: 《正义论》),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5] 见 James M. Buchanan, "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布坎南: "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October 1959), pp. 124—138; reprinted in James M. Buchanan,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aa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pp. 105—124.
- [6]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布坎南: 《自由的界限》),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chap. 2.
- [7] 见 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 3 v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1979.
- [8] 我们感谢 David Levy 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参见其论文 "Towards a Neo-Aristotelian Theory of Politics: A Positive Account of Fairness" (利维: "建立一种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 对公平的实证解释"),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December 1981, mimeographed.
- [9] Howard Margolis 曾经试图把这一模型公式化。他在这样做时遇到的困难, 显示了这一工作的艰巨性。见其所著 *Selfishness, Altruism and Rationality* (马格利斯: 《自私、利他主义和理性》),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0] William J Baumol,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鲍默

尔：《福利经济学和国家理论》）。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11] 我们认为，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基本的制度变革，大体上会自发地显示出有利于结构效率的取向，他们这种观点已经造成并仍在造成严重的损害。

## 索 引

(此为两部书《征税权》和《规则的理由》的索引,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规”指《规则的理由》;未注明者指《征税权》的边码)

- 阿克顿 Lord Acton 规 72  
阿罗 Kenneth J Arrow 规 85  
埃尔斯特 Jon Elster 规 82  
安德鲁斯 W. D. Andrews 94  
奥尔登 W. A. Orton 83  
巴博萨 Antonio Pinto Barbosa  
鲍默尔 W. J. Baumol 57 规 164  
保护性国家 protective state 规 26  
贝克尔 Gary Becker 规 68, 77, 79n  
贝利 Martion Bailey 125, 126, 127, 129, 132  
庇古 A. C. Pigou 14; 规 93  
格格森 A. Bergson 14  
波哈农 Cecil Bohanon xiii  
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规 47  
拨款理论 theory of grants 181—3  
不成文规则 unwritten rules 规 13

不可能定理 impossibility theorem 规 85

布莱德福特 D. F. Bradford 57

布伦南 Geoffrey Brennan 规 23n, 53n, 54n, 62n, 132n, 136n

财政约束和非财政约束的可替代性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fiscal and nonfiscal constraints 163—7

初始位置 original position 规 36

次优和商品税 second-best and commodity taxes

搭便车者 free-rider 7, 19; 规 160

丁伯根 Jan Tinbergen 14

多数规则 majority rule

和财政约束 and fiscal constraint 37

和期内的调整 and in-period tax adjustments 190

和周期 and cycle 20—1

和政党竞争 and party competition 21

普遍税制下的 under general taxes 157—61

作为约束手段的 as constraint 7, 20

作用 operation 20—1

额外负担 excess burden

多数团体的 on majority coalition 159

和需求弹性 and demand elasticity 62

和同等的最大化税额 and equal maximum revenue 56

和税额的最大化 and maximization of revenue 193

和税率 and rates 44

和最优征税 and optimal taxation 57

平等的最大税额下平等的 equal under equal maximum revenue 61

税收的 of taxes 35

完全征税歧视下的 under perfect tax discrimination 70

法治 rule of law 156—61

和税 and taxes 191

非契约的宪政 noncontrac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规 24—25

菲尔普斯 E. S. Phelps 192

菲利普斯 A. W. Phillips 规 102

菲利普斯曲线 Phillips curve 规 91

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94

费雪 Irving Fisher 94

分配公正 distributional justice 规 126—48

弗吉尼亚学校 Virginia school 4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129, 130, 132

弗瑞舍 Ragnar Frisch 规 151n

符合标准的多数 qualified majority 202

福利经济学 welfare economics 规 16—17

恶性通货膨胀 hyperinflation 126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规 23—24

公共开支 public spending

范围 domain of 161—3

和管制 and regulation 166

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24, 27, 162

规模 176—9

和税额要求 and revenue requirements 63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 of 162

公共产品的排他性 excludability in public goods 177—8

公共性 publicness 规 32—33, 41, 160

公共选择 public choice 29

政府模型 model of government 14

理论 theory 5

- 公路税 taxation of highway 144
- 公正 35, 108—109, 111—116, 126—148
- 公平, 公正的标准 fairness, criteria of justice 3
- 公债 public debt 103—7
  - 对外的 external 106
  - 和超常支出 and extraordinary outlay 104
  - 限制 limits on 104
  - 和征税权 and taxing power 104
- 公正的补偿 just compensation 164
- 共同财产 common property 16
- 供给学派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 94
- 官僚机构 bureaucracy
  - 权力 power 23—4
  - 理论 137
- 官员的腐败 corruption in public officials 6
- 管制和预算规模 regulation and budget size 166
- 规则 rules
  - 变革的成本 costs of change in 14
  - 不成文的 unwritten 13
  - 的可实施性 enforceability of 7
  - 的可预见性 predictability in 10—11
  - 的时间因素 temporal aspects of 76—91
  - 的选择 choice of 11—13, 33—34
  - 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19—21
  - 规则的演化 evolution of rules 13, 16—17, 24, 160—161
  - 和分配冲突 and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15
  - 和公正 and justice 108—24
  - 和默会的同意 and tacit consent 115—116

- 和贸易 and trade 30
- 和宪法变革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153—54
- 和信息 and information 10—11
- 和虚拟同意 and hypothetical consent 115
- 和预期 and expectations 110—11, 115—16
- 和自然权利 and natural rights 20
- 交通 of road 7—15
- 社会秩序的 of social order 4
- 市场 market of 16—18
- 游戏 of games 8—11
- 政治秩序的 of political order 18—19
- 中的公平 fairness in 21
- 作为宪法的 as constitution 9
- 作为约束的 as constraints 20
- 作为习惯的 as conventions 12—13
- 作为制度的 as institutions 18—19
- 作为过程的 as process 16
- 作为承诺的 as promises 111—113
- 规则, 作为宪法 rule as “constitution” 3
- 国防 defense
  - 和资本税 and capital taxes 151
  - 和中央政府 and central government 175
- 国际经济与征税权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axing power 168
- 过程, 作为约束手段的 process, as constraint 155
- 哈伯格 Arnold Harberger 57, 80, 81; 66n
- 哈格 D. Hague 57
- 哈耶克 F. A. Hayek 156, 157, 161, 191, 192, 195, 202
- 海尔斯海姆 Lord Hailsham

海纳 Jon Heiner

汉森 Hansen

理性的无知 rational ignorance 19—20

横向平等 horizontal equity 35—6, 46, 56, 195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control 9

货币 money

和自由市场 and free market 110

和名义价值 and nominal value 117

和真实价值 and real value 112

交易服务 transactions services 112

竞争性 competitive 110

货币印制 money creation

作为垄断权的 as monopoly franchise 109

作为税源的 as revenue source 111

最优的 optimal 120

获取权 the power of taking 8, 164—5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4, 10

霍布斯式丛林 Hobbesian jungle 规 5, 11

霍布斯主义契约 Hobbesian contract 规 31

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 Hobbesian anarchy 4, 10

交换价值 exchange value 规 28—29

交易成本 transactions costs 7

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168

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规 40—41, 53—57, 161

举债 debt, 见“公债”

等收入比较 equi-revenue comparison

和商品税 and commodity taxation 56—7

和税制改革 and tax reform 193



- 与最大化税额模型的比较 with maximum revenue model 56
- 征税理论 for tax theory 34—5
- 卡尔多 N. Kaldor 94
- 卡冈 Phillip Cagan 126
- 卡特 Richard Carter xiii
- 开支的时间安排 timing of expenditure 84
- 凯恩斯 J. M. Keynes 109
- 凯恩斯经济学和财政宪法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fiscal constitution 203
- 科尔曼 Jules Coleman 规 28—29
- 科勒特 W. Corlett 57
- 拉弗 Arthur Laffer 规 95
- 拉弗曲线 Laffer curve 95
- 勒纳 Abba Lerner 57
- 劳动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17—18
- 递减制税率结构 degression in tax rate structure 43
- 累进制税 progression in taxation 35, 43, 44, 195
  - 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and equality before law 157
  - 和法治 and rule of law 191
- 税收潜力 revenue potential 47
- 累退制税率 regression in tax rates
  - 和歧视 and discrimination 71
- 李嘉图 D. Ricardo 85
- 李嘉图均衡定理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85
- 立宪选择 constitutional choice xii, 3, 7, 9—11, 13, 19, 26, 30, 37, 57, 61, 171
- 利他主义 altruism 规 68—69
- 利维 David Levy 规 163n

利维坦 Leviathan

不受约束的 unconstrained 33

和合理的资本税 and rational capital taxes 89

和时间偏好 and time preference 98—9

和税收的用途 and use of revenues 136

或然性的 probabilistic 90—1, 124—5

模型和税制改革 model and tax reform 188

维克塞尔的模型 model in Wicksellian context 155

现实的和偶然的 as actuality and contingency 15—16, 84

作为政府模型的 as model of government 26—30, 37

作为巨兽的 as monolith 28—29

作为追求收入最大化者的 as revenue-maximizer 26—30

联邦主义和财政宪法 federalism and fiscal constitution 173—81

流动性、成本和财政剩余 mobility, costs and fiscal surplus 179

垄断 monopoly 规 33, 64—67, 137

歧视性 discriminatory 67

市场和征税的 in market and in taxation 74

政府模型 model of government 16—26, 42

征税的类比 tax analogy to 41, 42, 199

罗伯逊 Dennis H. Robertson 16

罗尔斯 John Rawls xii, 3, 19, 32, 188; 规 35, 36, 115n, 155

罗尔斯式的再分配 Rawlsian redistribution 163

罗利 Charles Rowley xiii

罗斯 Betty Ross xiv

马克思 Karl Marx 规 163

马斯格雷夫 R. A. Musgrave 14

马歇尔 John Marchall v

麦迪逊 James Madison 55

孟德斯鸠 C. Montesquieu v

米勒 James C. Miller 17

民主 democracy 规 48—50, 145—69;

代议制的 representative 18

和选举过程 and electoral process 5—6

穆勒 J. S. Mill 1, 13, 94

模型和立宪选择 mode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

默会的同意 tacit consent 规 115—116

纳税反叛 tax revolt xi, 11, 25, 189, 194

尼勒 David Nellor xiii

尼斯卡南 William Niskanen 137

诺齐克 Robert Nozick 规 129

欧林斯金会 Olin Foundation xiii

帕累托 V. Pareto 21

帕累托占优 Pareto superiority 规 151—152, 154

帕累托效率 Paretian efficiency 规 22

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ality 21, 31; 规 22, 33

普通法 common law 165

普遍均衡的商品税分析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commodity tax analysis 80—2

广括性 comprehensiveness

税基的 in tax base 36, 39, 48

所得税的 in income tax 194

普适性 generality

规则的 in rules 156—61; 规 34—35

开支的 in spending 161

征税的 in taxation 36

作为财政约束 as fiscal constraint 162

- 作为财政约束 as fiscal constraint 157—62
- 歧视 discrimination
  - 开支中的 in spending 161
  - 完全的 perfect 67
  - 征税价格中的 in tax prices 31, 72, 157
  - 征税结构中的 in tax structure 69—78
  - 征税和额外负担中的 in taxes and excess burden 71
- 契约 contract 23—37
- 契约主义 contractarianism 23—37
- 迁移和财政约束 migration and fiscal constraints 171—3
- 强制, 作为统治手段的 coercion as means of governing 7, 163—7
- 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19; 5—8
  - 和税制竞争 and tax competition 171
- 全国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xiii
- 全民公决 referenda 17
- 全体一致 unanimity
  - 财政选择中的 in fiscal choice 154
  - 作为水准基点的 as benchmark 6
- 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16
- 仁慈的专制者 benevolent despot 10
  - 作为政府模型 as model of government 189
- 萨缪尔森 P. A. Samuelson 14, 27; 54
- 萨缪尔森式公共产品 Samuelsonian public goods
- 《13号提案》 Proposition 13 xi, 25, 189, 196—8
- 社会福利函数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14
- 社会贴现率 social discount rate 93—94
- 社会福利 social welfare 20, 27
- 时间 time 76—91

- 和税 and taxes 94—101
- 时间偏好 time preference
  - 利维坦的 of Leviathan 98—9
  - 纳税人的 of taxpayer 102—3
- 收入对税基的需求弹性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tax base 141
- 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模型 revenue maximization, model of leviathan 26—30, 37—9
- 生命周期与储蓄 life-cycle and saving 83
- 双头垄断理论 duopoly theory 22
- 税 (额) revenue
  - 处置与水平 disposition versus level 135
  - 来自印制货币的 from money creation 115—21
- 税种 taxes 94—101
- 税的输出 exportation of taxes 169
- 税额分享 revenue sharing 183
- 税额和公共产品的需求 revenue and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63
- 税额限制 revenue limits 200—1
- 税率 tax rates
  - 公布的效果 announcement effects 87—92
  - 纳税人的统一税率 uniform over persons 68—9
  - 统一的商品税率 uniform over commodities 65—8
  - 限制 limits of 196—8
- 税制改革 tax reform
  - 和税额 and revenues 193
  - 民主制度中的 in democracy 191
  - 前景 prospects 192—205
- 税制宪法 tax constitution 36
  - 国际经济的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71—3

- 联邦州的 in federal state 183—4
- 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 规 49n
- 斯密 Adam Smith 16, 29, 135, 187; 规 4, 16, 17, 60
- 弹性 elasticity
  - 和征税输出 and tax exportation 169—170
  - 收入 income 141
  - 税基的需求弹性 of demand for tax base 43, 50
  - 需求弹性和额外负担 of demand and excess burden 62
  - 真实余额的需求弹性 of demand for real balance 119
- 汤普森 Earl Thompson 150
- 汤普森 Perronet Thompson 153
- 唐斯 Anthony Downs 19, 21, 22, 31
- 塔威尔 Edward Tower 126
- 特雷诺 Donna Trenor xiii
- 蒂伯特 Charles Tiebout 172
- 通货膨胀 inflation 规 101—4
  - 和所得税 and income taxes 130—1
  - 和预期 and expectations 121
  - 收入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 revenue-maximum rate of 119—20
  - 作为资本税 as capital tax 97
  - 作为利维坦的战略 as strategy for leviathan 127
  - 作为货币余额税 as tax on money blance 113—21
- 通货膨胀预期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 121—5
- 统一制 uniformity
  - 开支中的 in spending 161
  - 纳税人税率的 in tax rates over persons 46, 68—9
  - 商品税率的 in tax rates over commodities 65—8
  - 商品税的 in taxes on commodities 56

- 税种的 in taxes 156
- 透气孔 loopholes 199—200
- 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规 7, 15n, 23n, 73n, 134n, 150n, 155
- 托里森 Robert Tollison xiii
- 瓦格纳 Richard E. Wagner 规 62n
- 外部性 externality
  - 纳税反应的 in tax response 46
  - 辖区之间的 among jurisdictions 176
- 维克塞尔 Knut Wicksell xii, 6, 37, 154, 155; 规 48, 151—52
- 维克斯特德 P. H. Wicksteed 规 41
- 乌依姆库克 George Uhimchuk xiii
- 无政府状态 anarchy 规 30
- 无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3, 11, 13, 31; 规 33—36, 155
- 习惯, 作为规则的 conventions as rules 规 12—13
- 宪法 (宪政) constitution
  - 财政 fiscal 153—204
  - 定义 definition 2—4
  - 范围 domain 18—20
  - 货币 monetary 111, 128—34
  - 联邦制的 federal 171—83
  - 逻辑基础 logical basis 4—5
  - 作为规则的 as rules 3, 5—6; 规 9
- 宪政变革 constitutional change 规 33, 41, 153—154, 160—162
- 宪政改革 constitutional reform 规 14
- 宪政改革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规 149—65
- 宪法经济学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规 4—5
- 宪政主义 constitutionalism 规 24—25
- 限制 limits

- 比率的 in ratios 200—1
- 对程序的 on procedures 202—3
- 对获取权的 on taking power 164
- 对税基的 on tax bases 198—200
- 对税款用途的 on use of revenues 136
- 对税率的 on tax rates 196—8
- 对税种的 on taxes 192—6
- 对征税界线的 on tax limits 166
- 宪法 constitutional 9
- 对总支出和总税额的 on total outlay and revenue 200—201
- 消费剩余 consumers' surplus 41, 72
- 效率 efficiency
  - 开支的 in outlay 38
  - 税收的和立宪主义观点的 in taxes and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36
- 谢林 Thomas Schelling 82
- 信息 information
  - 和规则 and rules 10—11
  - 作为公共产品的 as public goods 19—20
- 休谟 David Hume 68
- 选择 choice
  - 对约束手段的 among constraints 206—7
  - 立宪 constitutional 3, 30—3, 57—8, 188
- 寻租 rent-seeking 33; 134
- 一致同意 unanimity 26, 31—33, 151—152
- 预算规模和管制 budget size and regulation 166
- 预算平衡, 作为程序约束的 Budget balance as procedural constraint 154—5, 202—3



元规则 meta-rules 规 117

约翰逊 Harry Johnson 123

约束 constraints

程序的 procedural 154—6

对程度的 on procedures 202—3

对过程的 on process 155

对比率的 on ratios 200—1

对获取权的 on taking power 164—6

对税基的 on tax bases 39—44, 198—200

对税率的 on tax rats 39—44

对财产税的 on taxation of wealth 92

对总支出和税额的 on total outlay and revenue 200—1

选民的 electoral 5—6, 8, 17—26, 32

作为规则的 constraints as rules 20

作为偶然现象 as contingencies 84

约束手段的相互信赖性 interdependence among constraints 154

征兵 military draft 164

征兵 conscription 164

征税 taxation

财产税 property 196—8

道路使用税 of road-users 144

对外国人征税 of foreigners 169

广税基的 broad-based 57, 196

立宪主义观点的 in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190—2

利息所得税 of interest income 94

税单 payroll 49

所得税 income 39, 49, 85, 96—8, 130—1

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余额税 of money balances in inflation 113—21

- 消费支出税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 80—2, 93—5
- 性质 nature of 2
- 增值税 value-added 49, 196
- 资本税 of capital 86—98, 150, 197
- 总额付税 lump-sum 34—5, 57
- 最优 optimal 14, 57, 67
- 征税比例 proportionality in taxation 35, 43, 44, 195
  - 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57
  - 和法治 and rule of law 191
- 征税的发生 incidence of taxation 1
- 征税限制和税制改革 tax limits and tax reform 48—9, 192—6
- 征税原则 principles of taxation 1, 34
- 征税规则 tax rules
  - 开放经济中的 in open economy 171—3
  - 作为宪法规则 as constitutional rules 191
- 征用权 eminent domain 164
- 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164
- 正统观点 orthodoxy
  - 财政学的 fiscal xi
  -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 in the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174—5
  - 对作为征税方式的通货膨胀之分析中的 in analysis of inflation as a tax 125—8
  - 商品税理论的 in commodity tax theory 56
  - 税制改革建议的 in tax reform advocacy 193
  - 税制理论的 in tax theory 12
  - 所得税和资本税理论的 in income and capital tax theory 84—7
- 政党竞争和剩余 party competition and surplus 21—2
- 政府 government

的成本 growth of 24

有限 limited 10

作为垄断机构的 as monopoly 10

作为人工制品的 as artifact 1

作为自愿交易的 as voluntary exchange 4

政府间的竞争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 186

政治的范围 domain of politics 5, 153—60

政治过程的模型 model of political process 1, 4, 26—30, 208—9

政治 politics

和分配公正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126—48

作为交换的 as exchange 29—31, 41—42

和搭便车 and free rider 33, 41

和公共物品 and public good 46

和公共性 and publicness 32—33, 41

作为规则的 as rules 18—19

和科学 and science 27—31, 43—46

和转移支付 and transfers 127, 129

作为过程 as process 51

政治交换模型 exchange model of politics

政治模型 model of politics 1

经济的 economic 13

利维坦的 Leviathan 26—30

仁慈专制者的 benevolent despot

需求驱动的 demand driven 14—5

自愿交易的 voluntary exchange 4, 7

政治选择 political choice

中间选民 median voter 86

专款专用 earmarking 136, 150—2

转移支付 transfers 127, 129, 145

资本 capital

生产与节约 creation and saving 83

消费以避免纳税 consumption to avoid taxes 92

资本价值, 作为税源的 capital value as revenue source 83

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 25, 27

最大化和交换价值 maximization and exchange value 规 28—29

最小国家 minimal state 26, 129

最小最大战略 minimax strategy xiii

和宪法改革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

最优 optimality

货币规则的 in money rules 131—2

联邦制结构的 in federal structure 179—81

最优关税 optimal tariff 169

租金, 地方的, 和财政剩余 rents, locational, and fiscal surplus  
172—3